

广东旅游出版社

权延赤作品自选集

权延赤 著

微行

——杨成武在1967

广东旅游出版社
叔延赤作品自选集

叔延赤 著

微行

——杨成武在19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行:杨成武在 1967/权延赤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7.4

ISBN 7-80521-756-4

I. 微… II. 权…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159 号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码 510600)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 8.75 印张 20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册

定价:1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杨成武上将与毛泽东主席在武汉。

F 200/26



杨成武（左二）陪同聂荣臻元帅（右二）接见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右一）。

微行
杨成武在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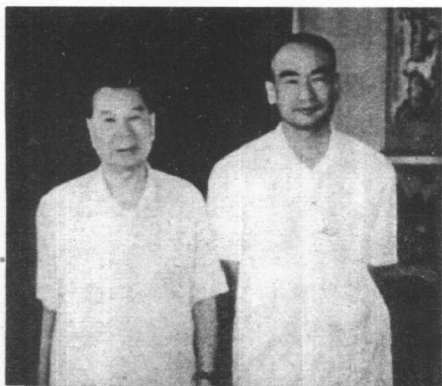
杨成武上将回忆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经历。



本书作者权延赤在采访杨成武上将。

微行
杨成武在1967





本书作者权延赤与
杨成武上将合影。



杨成武陪同周总理
视察导弹部队。



本书作者
权延赤在采访
杨成武上将。

杨成武在 1967
微行





196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杨成武与邓小平、刘少奇等在一起。



1965年杨成武（左三）陪同贺龙等接见全军气象工作会议代表。
左起：梁必业、彭绍辉、杨成武、贺龙、李天佑、王新亭、李雪三。

微行

杨成武在1967





微行
杨成武在 1967

杨成武上将与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6年杨成武上将苏联军事歌舞团团长亲切交谈。



1966年杨成武上将陪同毛泽东主席与百万群众见面时的情景。

微行
杨成武在1967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在“文革”中合影。



除台湾省外全国各地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称全国江山一片红。



毛泽东在金水桥上同百万群众见面。

微行
杨成武在 1967





杨成武上将回忆右腿负伤时的情景。



杨成武（右二）陪同聂荣臻元帅（左一）接见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右一）。

微行
杨成武在 1967



目 录

序曲	“主席一身系天下安危” ·····	(1)
第一章	到武汉保陈再道 ·····	(11)
	一 “武老谭”·····	(11)
	二 碰头会·····	(22)
	三 受命于危难·····	(31)
	四 随时向总理报告·····	(41)
第二章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	(47)
	一 微行·····	(49)
	二 梅岭·····	(59)
	三 惊梦·····	(78)
第三章	毛泽东被迫离武汉 ·····	(85)
	一 “王力是人还是鬼?”·····	(86)
	二 “兵变”·····	(92)
	三 淡化事件·····	(117)

第四章	毛泽东敲山震虎 ·····	(134)
	一 北京很热闹·····	(137)
	二 许世友跪倒在地·····	(155)
	三 “王八七”要消睡·····	(166)
第五章	“不能再搞下去了！” ·····	(191)
	一 “我垮台了你们要吃亏”·····	(193)
	二 从杭州到南昌·····	(200)
	三 长沙——武汉——郑州·····	(212)
第六章	政治交易的牺牲品 ·····	(227)
	一 “大树特树”·····	(228)
	二 两个女人·····	(240)
	三 政治交易·····	(250)

序曲：“主席一身系天下安危”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过五百年到一千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毛泽东身穿睡衣，吸燃一支香烟。每当他内心生出那种超越时空的悲壮苍凉之感时，宇宙里这颗星球便只能称为“小小寰球”，便会有了那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壮怀激烈。

“四川动刀，湖南抢枪，赣州打一仗，死二百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三派！”毛泽东将情况简报扔置一边，掀起眼帘，望着坐在茶几另一边的杨成武：“这样乱下去，明年能收尾吗？会不会失控？”

“群众起来了，派性大了，困难怕不少。”杨成武略一犹豫，又恢复了军人所特有的坚定、干脆语气回答：“有主席领导，工作做细，局势一定会控制住的。”

毛泽东的目光留在杨成武脸上，久久不动。红军将领中，容貌英俊没有超过杨成武的。一次酒会上，有人称许世友

是共产党的“黑旋风”，称杨成武是“锦马超”。还有那位被蒋介石暗杀掉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他称杨成武什么？对，“白袍小将”，还写了文章。他说共产党一定能得天下；毛泽东麾下的将领，不但“五湖四海”，而且“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名将都能在他麾下找到相似者。

“嗯”，毛泽东终于收回目光，诙谐一笑：“天塌下来，有成武顶着。”

笑容稍纵即逝，毛泽东起身，踱出休息室，沿着游泳池漫步。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七月初，酷热的夏天。陪伴他的已经不是“罗长子”。过去他总是讲，“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罗瑞卿倒台已有十九个月了。

他不同意打倒罗瑞卿，但又不得不同意打倒罗瑞卿。

那是在上海锦江饭店，毛泽东与林彪有过一次艰难的谈话。林彪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毛泽东说：“他反对你，但还没有反对我。他只是反对我游长江，也是一番好意。”林彪说：“他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反对毛主席。”毛泽东退一步：“可以先挂起来么。十年不行，二十年，挂一万年行不行？”林彪肃颜不语，那态度明确坚定：“我与他，两者只能选一个。”

于是，毛泽东叹口气，别无选择……

不过，从那一天起，毛泽东对林彪已经生出最初的警惕。正像他给江青的信，称林彪是“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正像胡耀邦同志一九七八年在中组部讲话中所说：“毛泽东其实并不喜欢林彪……”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毛泽东沿池边踱步，嘴里念念有词。这是哲学，也是实践。他在湖南讲，在北京讲，在杭州讲，在上海讲，在庐山也讲过。他的一生是“运动”的一生；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然而，近年来，无论哲学还是实践，他发现都不存在“最”和“绝对”。生命在于运动，但运动员难有长寿者。

于是，他又讲了这样的话：“生命在于平衡。”

人要讲平衡，经济要讲平衡，政治更要讲平衡。讲平衡就不能没有付出。有得必有失，有收必有支；“收支平衡”，这才是生命所在的运动。

所以，古来追求“公平”，实则不存在绝对的公平，特别是政治上，更多的还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有人说这是“帝王术”，帝王术也有其合理性。

毛泽东思考着踱步一圈，踱回杨成武站立的地方。一瞥之间，心有所动：罗瑞卿曾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可也没保住；罗瑞卿之后是杨成武，杨成武来自自己身边当然又成了各种矛盾的交汇点……他的命运会怎样？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杨成武问。

“唔，成武呐，历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都不少。不过呢，共产党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毛泽东的目光对着杨成武的两眼闪烁，很快又移开了。他觉得杨成武的两眼虽然英武明锐，但缺了些……城府。他顿了顿，还是把话讲完。“现在有一些我们受处分的同志，有的是三年四年翻案，有的十年八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没翻案，没人提了……唉，共产党也不过是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

杨成武听得认真，但真正理解却是以后的事了。

“《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但读《聊斋》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名儒讲学，老僧谈禅，聊斋文笔独有千古，更难得议论纯正，准理酌情，佳处难尽言……”

毛泽东讲话分对象。杨成武文韬武略，不属匹夫之勇，可

与论文。所以毛泽东不作泛泛语，出口可博大深邃，机变万千。

“人有不得不为之，不得已而为之；形也、势也，形势所迫也。《聊斋》卷十二《车夫》篇：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报力时，一狼来啣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斃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爨，亦黠而可笑也。”

杨成武不乏铺心文思，此刻却难以追踪那思想的电石火花，更不要说识破言词之妙，窥透用意之微。这一切只能留待下来慢慢体味琢磨。而时下，只剩一种朦胧的美。这正是毛泽东作议论时的魅力所在：初闻之仿佛入魔，反复熟思才得其性情之正，领其神气之壮，服其议论之公。所以，听毛泽东谈古论今，常有“一语魂飞，心灵冉冉”之感，无不叹曰：三生有幸。

“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多数都是军事家。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又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可它比《资治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也没有《资治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才是部大的‘相砍书’哩！”

毛泽东在多种不同场合讲过这类相同话。他将《通鉴》放在《左传》、《聊斋》之上，称为“大”书。

现在，他将手轻轻一拂，止住议论，凝望碧透澄清的池水片刻，喃出一声：“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

从“相砍书”到“武汉水”，海阔天空，神驰万里，即便读者在此反复阅思，怕也无人能追上这位巨人的思想和意念的飞跃。

杨成武却跟上了。他知道毛泽东要去武汉游泳，而且这次

南游。与那部大的“相砍书”不无关系……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毛泽东半躺半坐在五尺宽的木板床上，背靠床头，眼望坐在床前软椅上的女护士；那部《资治通鉴》放于床侧，伸手可及。

“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非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哦……”毛泽东像抚摸儿女一样抚摸那部《资治通鉴》，继而吸燃一支香烟，“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这位“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在十几年后回忆当年的谈话，仍然那么近切传神：

“《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不读《资治通鉴》，难明中国政治的特色，难知千年兴衰之奥妙，难解我们民族文化的神妙。

所以，这部大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一生。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天已近午；太阳在熔化一般泛白的天空上燃烧，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苦重而蒸郁的空气里。刷满大街小巷的大字报被阳光炙灼着咯咯作响，卷起四角，甚至整张地变成弓形，像一群佝偻老人，在聆听布满全城的高音喇叭的“争鸣”。

中南海那一围墙隔断了尘世的喧嚣，显出几分脱俗的清幽。警卫森严的“游泳池”，一派肃然的静谧。毛泽东躺在那张硬板床上已经一夜又一上午，却始终不曾闭眼，即便偶尔翻身换换姿势，双手也不释那卷《资治通鉴》。

这部大书，从头至尾认真读一遍，参悟其中道理，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呐！读罢一十七遍，这一生也快过完了。书已经被他读“破”，许多书页都是用透明胶纸粘住破损之处，并且留下不同时期不同粗细颜色的阅后批注。

现在，毛泽东反复阅读并且久久凝思的是第七卷及第十一卷上的两段文字。

“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恶鬼避，真人至。愿上所居官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

这段文言文很好懂，换成白话来讲，就是燕国人卢生对始皇说：“有一种方法，这就是皇帝不时地暗中秘密出行，借此躲避恶鬼。避开了恶鬼，神仙真人便会来到。所以希望您所居住的地方不要让人随便知道，然后不死之药大概才可以得到。”秦始皇说：“我敬慕真人！”

这段看似简单的文字，在毛泽东眼中和心里，却深感“学问大得很呐”。他在北戴河，在杭州都曾公开讲过：“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他的读史和他的革命实践一样，是将马克思列宁所提供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历史及今日的实际相结

合，于是便有了他一贯的观点：“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比如《愚公移山》这篇近乎荒唐的寓言，在毛泽东眼中却有了革命者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新意；而愚公所感动的“上帝”，在毛泽东眼中已不是天上那位玉皇大帝，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亿万人民大众。

眼前，毛泽东反复阅视凝思卢生这段建议，是否想到了从秦始皇到乾隆皇帝这些古代大有作为的“人主”在神州大地上的一次次“微行”？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的全部思考。但是，“毛泽东走遍祖国大地”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特别是每逢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都有神秘而重要的“微行”，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和解决林彪集团这样的“关键时刻”；大河上下，大江南北，都留下他“微行”或曰“视察”的足迹和声音。

他不信鬼，他心目中的“恶鬼”只是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或某个具体的政治对手或某些阴谋活动的捣鬼之术。

他不信神，他心目中的“真人”只是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乃至整个民心、民意。

他不信长生不老，他心目中的“不死之药”乃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千秋不变的良谋善策，保证“江山永不变色”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至于“所居宫毋令人知”，他在必要时都是注意并警惕的，这与他的阶级斗争观念相一致。倘无此警惕，四年后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有可能使暗杀成功……

《聊斋》讲了那么多鬼，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鬼又是谁？天下大乱好得很，不乱不出鬼、不乱捉不住鬼。

毛泽东略一翻身，侧卧变成仰卧。他的手指头本已夹了厚

厚书页，顺势一拨，便将“历史”翻过几卷；翻过了秦二世，翻过了陈胜、吴广和西楚霸王。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遂械系信以归，因赦天下。”

为方便读者，不妨再译成白话文：

汉高帝六年冬季，十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阴谋造反。高帝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大家都说：“赶快发兵，把这小子活埋得了！”高帝默默不语。继而转问陈平是什么意思？……陈平说：“古时候天子有时巡视诸侯镇守的地方，会见各方诸侯。陛下只管出来视察，假装巡游云梦，在陈县会见诸侯。陈县在楚国的西部边界，韩信听说天子怀着友好会见诸侯的心意出游，必定是全国平安无事，就会到郊外迎接谒见陛下。拜见时，陛下就趁机捉住他，这不过是一个力士就能办到的事罢了。”汉高帝刘邦认为说得不错，便派出使者去通告诸侯到陈县聚会，说：“我将南游云梦。”高帝随即起程南行……（在陈县）用镣铐枷锁锁住韩信而归，接着大赦天下。”

现在谁是谋反的“韩信？”

林彪、吴法宪告发“贺龙搞二月兵变”，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又告发谭震林同几位老帅搞“二月逆流”。对此，毛泽东怒而不疑，心有底数：他们不会是“韩信”。

是青海的赵永夫开枪？是内蒙古军区的“骄兵悍将”捉了中央文革派出的人坚持不放？还是云南的赵健民搞名堂？……

毛泽东摇摇头，心有疑惑。天下大乱，鱼龙混杂，结论不忙下。何况，这些地方成不了大气候。

他的目光停在“吾将南游云梦”，久久不移。

江北为“云”，江南为“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江汉平原即古云梦泽所在，武汉雄踞长江汉水交汇处，久有“九省通衢”之说，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陈再道将兵数十万，为一路诸侯，成一方气候。

林彪说：“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说：“陈再道是‘武老谭’，是武汉的谭震林。”

毛泽东一次次自问：“陈再道会反对我吗？”

他不相信。但也不放心。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毛泽东再次慨叹，合上那部“大书”。坐起身看表，已近中午十二点。

卫士奔前来，帮忙替他穿衣。毛泽东任其摆布，自顾想自己的心事。笔者听多名“身边人”介绍，说“主席常沉浸在思考中，伸胳膊蹬腿全由我们摆布……”

视察大江南北的决心他已下定，并且多次放风。可惜，遭到一片反对。

周恩来说：“主席一身系天下安危……”

林彪说：“天下大乱，安全没有保证……”

江青更是一副“狼来了”的表情：“青海不是开枪了吗？内蒙抓了我的人，我讲话不放，康老讲话不放，中央文革下命令还是不放，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太危险了！”

毛泽东叹息：“没有一个‘陈平’，也没有一个读破《资治通鉴》。”

“吾将南游云梦”，但劝阻的话也不能不警惕。万一武汉出了乱子呢？“非子龙不可行也^①……”

“给成武挂个电话。”毛泽东坐到餐桌旁边，对秘书吩咐一声，“下午的碰头会他要参加。”

注① 《三国演义》第54回，刘备入吴结亲，诸葛亮说：“非子龙不可行也。”

第一章 到武汉保陈再道

中南海一角的西花厅，那棵枝叶繁茂的海棠树被烈日映得发光；偶尔吹来一阵风，树叶闪烁得像无数面小镜子。

周恩来摇动一把折扇，在办公室里踱步，一边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他停停步，目光逐一扫过秘书们的面孔，点点头，表示强调，然后将折扇用力摇两下，抬高声音：“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一位秘书手捂那部保密电话的话筒，小声报告：“总理，陈再道接通了。”

周恩来点点头，快速向电话机奔去……

一 “武老谭”

“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

作为一方“诸侯”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焦急等待北京的消息。他曾这样回忆那个苦热的夏天：

“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少变化；热气笼罩着武汉的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路上，就像走进了蒸笼里，立刻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

我无心观赏院内的景色，只觉得由树木汇成的绿色上面，又蒙上了一层苍白的颜色。路边，桂树的叶子曲卷着，樟树的叶子曲卷着，竹子的叶子曲卷着，杂草的叶子也曲卷着，仿佛这些草木的生命，也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考验。^①

不善言语的陈再道，就这么一切都是“曲卷着”度日。终于听到了北京的消息，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

“陈再道同志，我是周恩来……我正要谈这件事。你们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你们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再道松口气：“这下好了，主席来武汉，可以当面向他说明问题了……”

可是，马上又“有些喘不过气来”。两次到北京都没讲清，越搞越糟，这次在武汉就能讲清吗？

“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被称为“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的孟锦云，在九十年代初向笔者回忆了那位杰出政治家的侃侃大论：

^① 《人物》1989年4期27页。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彩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多。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也许正是《资治通鉴》这部大书所揭示的深层道理？“文化革命”终于无可避免地被“武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武汉的例子很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潮，被称为“一月风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满意地给予支持，用他那高亢的声音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同上海的“秀才”不同的是，毛泽东深知“关键时刻的政治，靠军事实力说话。”所以，夺权风暴一起，他便及时召来那些手握重兵的各路“诸侯”进京参加军委碰头会，并在一月二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实事求是讲，各路“诸侯”无不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但命运注定他们是无法跟上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在思想和理论上就已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困境中。

他一贯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又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

军队是该维护党的领导还是该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

他一贯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他又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那么——

军队是该帮助迅速解放一大批干部还是该支持造反的人们去“把那儿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他一贯讲“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把群众分为左、中、右三派，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支持“群众”还是支持“派”？

他一贯要求军队“宣传教育群众”，他又说“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加强纪律性”还是该给无政府主义一席之地？

导师和统帅在思想理论上出现这种混乱和矛盾，源于他对自己亲自缔造领导的党和国家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失望，源于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源于共产主义运动所处困境。他急于找到一条出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发

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

多少年后，当邓小平探索出这样一条“改革开放”之路时，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探索是失败了。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初衷？

中南海，118室。这个编号是毛泽东起居办公之处。

杨成武隔茶几坐于毛泽东身旁。茶几上有两个茶杯，一盒“熊猫”烟。

“军委碰头会怎么样了？”像每次见面一样，由毛泽东首先问话。

“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都拥护？”毛泽东微笑摇头，“我看有人就不拥护。”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拥护。”

“你太天真了。”毛泽东继续摇头，“外国有人不拥护，中国也有人不拥护。北京就有。”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都拥护。都希望继续革命，再立新功。”

“嗯，”毛泽东这一次首肯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主要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地点点头：“反对官僚主义、讲群众路线、民主作风、集体领导。所以呢，要再来一次延安整风。”

杨成武肃静聆听。他知道，此刻无须他多言。人都需要诉说，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的队伍分散了。全国各地。不像过去延安时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风，很好。现在由上到下困难。我们搞了社教，由上到下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展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就是由我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吮吮

下唇，吸一口烟，“延安整风搞了二三年，这次是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

杨成武感到一种心灵震颤，那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位领袖、巨人的内心世界，直接感受着这位巨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所经历的痛苦的思考过程和结果。

世界上许多领袖人物都说，在对影响全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有一种“孤独感”；权力越集中，责任越大，进行决策时的“孤独感”越严重。哪怕经历了“集体研究”，最终突破的决策只能是“孤独”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孤独”就需要诉说。向信任的人、亲近的人诉说。

“天下大乱，你输我赢……”毛泽东将战争年代的童谣随手拈来，接着说，“地方党政组织瘫痪，各派群众组织为‘夺权’纷争，甚至动刀枪……靠什么稳定？”

他望望杨成武，嘴唇轻启，迸出两个字：“军队。”

“军队不能乱。”毛泽东陡地提高声音，“关键时刻军队尤其要稳定。嗯，杨总长？”

“所以有军委八条命令。”杨成武开始讲话，“军队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取……”

这“八条命令”由毛泽东亲自签发：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掰下一根指头：“要排除一切干扰，不怕付出代价，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掰下第二根指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了。一定要稳定军队。”

坚定不移地实现目标和强硬牢固地控制局势，这是大政治家作出决策后的两条基本行动原则。为此，不怕付出代价，甚至是巨大代价。做不到这两条，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家。

然而，京西宾馆的“诸侯”们更多看到的是第二条，却忘记了第一条，也是首先的一条。

“中南诸侯”陈再道这样回忆京西宾馆的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进行之中，有一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还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有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又有“军委八条命令”，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普遍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表示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陈再道就以自己这种“理解”，“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位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出生入死，战功赫赫，被毛泽东誉为“真不简单”、“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的三星上将，一心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再立新功的一方“诸侯”是这样向中央报告“成绩”的：

三月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

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吉、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的这番“成绩”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发生在谭震林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之后，便难怪武汉的造反派称他是“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也就难怪三月下旬，他又被紧急召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重新端正思想”了。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不久的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是根据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所写的社论，经王力修改后发表。陈再道一看就知道是批判和警告他不要压制造反派。

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了“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陈再道的“成绩”变成了“罪行”。

四月十六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高声宣布：“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

冲！”

二十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可以想象，在那种时候惹恼了江青，那还了得？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我们不知有什么大祸即将临头。”

“莫非我们当了‘歪嘴和尚’，把‘佛爷’念的‘真经’传错了”？陈再道这样自问，“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心里委屈、窝火，又生就一个炮筒子脾气，便在会上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

这话讲得非常真诚了。“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表明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态度，也符合副统帅林彪所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要求。

可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这不是推责任，撂挑子，搞赌气吗？想给中央文革出难题还是闹示威？

江青雷霆震怒，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此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也果真一律不予答复。

至于副统帅林彪，根据他“以人划线”的一贯原则，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唯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

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陈再道心情郁郁返回武汉时，“坚决揪出武老谭”和“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已铺满全城。一度沮丧的“造反派”打了强心针一样亢奋起来，以新的势头四处冲杀，八方造反。陈再道被画成青面獠牙的“陈大麻子”，被“钉”在武汉市的最高建筑物上，并附上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然而，正像毛泽东所讲，天下万物万事莫不一分为二。对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一样，有群众反对，就有群众支持。那些表态支持的群众在五月十六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反对不加分析地把党政干部统统打倒。这批群众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一下子就把“造反派”孤立了起来。

陈再道在感情上无疑站在“百万雄师”一边。但从大局着眼，又必须保护那些造反的“闯将”。军区几经研究，采取了“支左”不支派，支持广大群众的态度。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大家都是干革命，不要再打内战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公告》还对军区的“支左”工作做了检讨，承认存在缺点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自我批评。

早已杀红了眼的各派群众组织哪里听得进《公告》？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百万雄师”认为是“太软

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

六月二十六日，宣布不管武汉军区事情的中央文革突然给武汉军区发来一份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电报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领导们紧张、不安，费尽心力做了大量工作，总算有二十来天没再发生大规模武斗。现在，总理来电话讲，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不用进京汇报了，毛主席要亲自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问题。陈再道亦喜亦忧。

喜者，毛主席要来。几十年的经验告诉陈再道，毛主席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忧者，严重对立杀红眼的两派，能马上放下刀枪握手言和吗？林彪、江青能放过自己吗？……

毛主席要视察南方，得到消息的不止一个陈再道。有多少“诸侯”同陈再道一样，亦喜亦忧。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进行调查，就地解决问题？他们所在地区以及他们本人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这次的视察……

二 碰头会

人民大会堂默默地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这座大跃进中诞生的巨型建筑，比故宫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高大魁伟的廊柱以及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立体面，组成一幅庄严绚丽的图画。

当大会堂投下的身影悄悄向东延伸，几乎覆盖了正门全部台阶时，一辆辆“红旗”轿车驶入这座巨型建筑的天井。走出轿车，陆续进入大会堂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全体成员。自从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政治局便停止了活动。政治局碰头会也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现在，中央文革大权在握，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下午。

三点整，毛泽东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他的照例只有林彪。

自从林彪被宣布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之后，迎接毛泽东便成为林彪的“专利”。每个公开活动的场合，林彪总是早到二三分钟，等待毛泽东到达，然后陪伴毛泽东一道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讲究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此名分无以证明“副统帅”“接班人”的事实。

林彪迎上一步，只迎一步便握住了手。据说“九大”林彪被正式定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后，林彪有了变化。每次毛泽东出现，他会迎上三步，握住毛泽东的手。多走两步是因为起步早，迈步快；他多走两步，毛泽东就可以少走两步。据说庐

山会议之后，林彪没当上国家主席便又有了变化。或者迎一步握住毛泽东的手，或者一步不迎，待毛泽东走到身边时才握握手，然后随毛泽东身后步入会场。他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小动作中泄露内心的情绪。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握手的瞬间，一生不苟言笑的林彪，从嘴角流出一丝笑纹，头一低，轻叫一声：“主席”。

“嗯。”毛泽东略一点头，便放手径直向前走去。他的心情并不很好，他也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心情。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讲：“有脾气好么，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知情人都说，这话多半是讲林彪呢。

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帅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一个就是林彪。主席休息时，敢闯主席卧室的也是他们俩。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闯到主席床边；林彪一脸肃杀之气闯入丰泽园，闯入菊香书屋，直到卧室门口才向我们喝令：“马上报主席，我有急事。”林彪比彭德怀略有分寸。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不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也没有顶撞的机会了。林彪又不同，他是当上接班人之后就再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当接班人之前，他总是正襟危坐于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场合又全力维护”。当上接班人后，林彪变了。当面再不顶撞，甚至谦卑地笑，只剩了公众场合喊万岁，终于变成了“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

所以，不少人说：毛主席不怕林彪当面顶撞，讨厌林彪当面笑。“有脾气好么，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

现在，毛泽东走在长廊的地毯上，四周围静悄悄，淡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色彩。也许他有些惆怅？过去有幅画照，叫“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也熟悉。那上有毛、刘、周、朱、陈、林、邓。自从林彪成为“最亲密的战友”，这幅画就泯灭了。

这一“最”，就没有别人了。

服务员远远打开会议室的门，毛泽东脚步不顿地走入会议室。

室内转圈摆满沙发，正在喝茶交谈的与会者已经全体起立；军人敬礼，文人鼓掌。毛泽东随意做个手势，去周恩来的身边坐下。林彪跟随其后，在他右边入座。

毛泽东刚坐稳身子便吸燃一支香烟；吸过一口烟便将目光扫过与会者；扫过一轮便伸出右手，用夹了香烟的左手去掰没有夹烟的右手指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略提高点声音，“文化大革命运动”。

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容不迫又突如其来地摆在集体面前，这就是首脑的魅力。会议室里静悄悄，只有记录时笔尖地纸上磨擦的沙沙声。有人开始交换目光，有人大概早得风声，显出莫测高深的淡漠。

圆头圆脑，皮肉松弛的陈伯达，嘴唇微张地望着毛泽东，像是正在“消化”这句话的全部内涵，镜片后两只眼眨了眨。当他眨过三次，发现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望住自己，眼皮便立刻停止了运动。

“陈书生气，”毛泽东指指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目光一转，掠过其他与会者，“要帮忙。”

陈伯达脸红了一红，不知这番话是福是祸，他从直觉上感

到毛泽东并不喜欢自己。多次说他“书呆子”，“你书读不少，越读越蠢”。陈伯达有时喜欢别人讲他书呆子，“书呆子”可成为保护伞，不会被怀疑为野心家。但有时又不喜欢听“书呆子”，这种评价不利于他的威信和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他就到处讲：“写文章其实并不是我的强项，我的能力主要还是表现在行政管理方面，这一点在延安马列学院时就已经得到证明……”

在延安，陈伯达曾负责马列学院的后勤生活管理，听到几句表扬，便一直希望不当秀才，当个有实权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终于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可是，毛泽东还是说他“书生气”、“书呆子”。

毛泽东已经朝沙发靠背仰去，两腿随便地伸展出去，用一种决心下定后的轻松语气，侧望坐在周恩来那边的杨成武，招呼道：“成武啊，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

杨成武点点头，又朝周恩来瞟一眼。南巡之事，总理有不同考虑。

“‘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毛泽东已对“云梦”一带的群众组织流出基本考虑，把手一拂，飞越千里地转到华北，“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他若有所思地略作停顿，将手中的香烟朝左角方向一点：“戚本禹代办公厅主任。”

林彪、周恩来始终望着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人也始终望着毛泽东，他们在寻找发言的时刻。只有康生，冷冷地坐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吸烟，淡漠的目光望着茶几上的某一点，城府深不可测。

毛泽东把香烟拧死在烟灰缸里，简捷一句：“十五号可以到武汉。游泳去。”

这个动作似乎是宣布讲话告一段落，会场静有三秒钟。不足一百字的谈话，经天纬地，包罗万千，够这些出类拔萃的头脑去高速运转一番。

周恩来轻咳一声，用商量的口气说：“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林彪点头，说：“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是啊，主席这个时候不宜离开北京。”

“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阶级敌人决不会自甘灭亡，要警惕他们垂死挣扎，搞什么阴谋活动。”

“现在天下大乱，许多地方领导权并不在我们手里，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中央文革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毛泽东南巡，七嘴八舌各逞己见。毛泽东又吸燃一支香烟，流露出听而不闻的神气。

周恩来略作思考，明知无效，还想最后一试：“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么。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我哪里都不去。”毛泽东再将大手一摆，“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他的神色表明“此议到这里结束”。再不看其他人，只望住杨成武，眼里漾出轻松诙谐的笑波：“非子龙不可行也，要杨成武同我去。”

林彪望望毛泽东，又望望杨成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他转向全

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声音不高，却充满一种军人的自信。

“风流不在谈锋胜。”毛泽东朝少言寡语的杨成武点点头，转向中央文革的秀才们说，“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秀才”们神态各异，都有些不自在。

“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毛泽东仍是望着杨成武，“山西还在乱？”

“刘格平和张日清还在闹。”

“要给六十九军及陈永贵等打个招呼，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毛泽东讲的“他”，是指刘格平。话虽是对杨成武讲，却也注意到了林彪有些冷落之态，便转而望住林彪：“像军队林彪同志也无办法，像××，××。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了不起，”毛泽东朝林彪点头：“你说的，这次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林彪陪着笑，陪着点头，旋即朝杨成武瞟去一眼。因为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那边去了。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调动哪怕一个连的部队也要经他同意。特别是华北地区一些部队的部署，都是毛泽东与他商量办的。比如山西的六十九军，河北的三十八军……

天下大乱，陕西造反派闹得厉害，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抽空同杨成武商量，从山

西调二十一军入陕维护社会秩序；山西大同的空缺，调河北保定的六十九军去填充。杨成武建议：保定没部队不行，地处京城旁边。东北形势相对山西、陕西要好些，驻通化的三十八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机动部队，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一直在通化待命，随时可以入朝。根据现在形势，可以调三十八军入关，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杨成武建议时，周恩来、林彪也在场。毛泽东征求他俩意见，周恩来和林彪都表示同意。于是毛泽东下令，调三十八军入关，驻防保定。

事后，林彪心里莫名地生出一丝不快。他主持军委工作，但这件事说明调动和指军部队的实权是在毛泽东、杨成武手中，他并不能指挥一切。

他不满意杨成武在建议前未向自己先请示。

他希望人民解放军成为“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军队。

他心情郁郁，若有所失地静观毛泽东同杨成武继续谈话：

“你们都是中将，不只看军龄，还要看政治水平。”毛泽东称杨成武等人为中将，其实他们是三星上将。因为“全军上下一片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取消了军衔，而在毛泽东眼中，三星上将都是些“娃娃”，他记不住那么多上、中、少将，也曾称过杨成武少将。他似乎又在说另一位秀才：“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也不行。要罢刘、刘、陈的官，不要中央罢，要红卫兵罢去，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看来，毛泽东是决心“自下而上”地搞这场运动，用红卫兵去解决问题。不过，他明白红卫兵只是前台闹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军事实力说话”。这毕竟是中国政治。

所以，毛泽东将秀才们冷一边，只对杨成武，对几名将军

讲话：

“张、洗、杨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毛泽东点出的几个姓，秀才有人不明，军人心里都清楚。毛泽东换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一句话一层意思，都与他将要去视察的地区有关，断断续续讲了这样几句话：

“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

“要四十七军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多来几个。”

“两派都来人，十个军区各来十个才一百个。”

“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毛泽东左手轻击沙发扶手，望着军人们的目光流出几分期待几分信任还有几分告诫：“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了。”

毛泽东谈这些话时，其间也不乏个别人插话汇报几句有关内容，林彪对这些插话不感兴趣也没听进，他只留意毛泽东讲的每句话。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关注的是军队，毛泽东大权不放的也是军队。

“为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现在控制湖南的人不能当民兵？”毛泽东不知是反问哪位汇报者，在林彪那里却敲响一鼓——“民兵”这个“第二武装”也不能放手。

“米脂人武部最好通报一下。”毛泽东又是直接交待给杨成武，这是林彪心里不愉快的事。米脂人武部“支左”曾受到表扬，后来见了报。

“内蒙训练的回去了吧？”毛泽东问。

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军人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观察员和联络员，又乘几十辆卡车进京“告

状”，甚至在军委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打了军区政委。这些军人被留下来学习，叫作“训练”。

“多数已经回去。”杨成武回答。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寄一半回家，那有这样好的。”毛泽东并非总是“务虚”，他也是个很“务实”的统帅。他不相信有多少军人愿意放弃“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的优厚待遇，学农民去拿工分。陕北不少地方一个工分不足一角钱。但是，他也不忘记“务虚”，总要用他所熟悉的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结束：“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杨成武一边听毛泽东讲，一边在纸本上快速记录。每次听主席讲话他都要做记录。“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是早有记录的话。

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的一种思考和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所说的只要打倒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者简单地说成“大权旁落”，要“夺回领导权”；或者加上一句“让群众经受锻炼”。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会永远存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领导的腐化蜕变？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防止以权谋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而非无法保证真正公正的“自己监督自己”？

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十年后，邓小平选择了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来解决这

个矛盾。“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选择的是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的方法。二个月前，他曾讲：“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他设想“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解决官僚、以权谋私等“修正主义”，解决“官”、“民”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悲剧性结果，毛泽东未曾料到。他想到的只是历史：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

毛泽东要留庙不要刘邦，所以支持“造反”……

三 受命于危难

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迎着夕阳的残照，放射出瑰丽的色彩，接着又迅速收敛，渐次暗淡下来。

杨成武走出人民大会堂，脚步庄重又有年轻人的弹力。

在璀璨的开国将星中，他是明光闪烁，引人注目的一颗。光辉来自战功，来自他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留下的篇章，也来自他那人生的脚步。

戎马一生，他的脚步始终踏着“年轻”的乐点。十四岁闹暴动，缴了民团的枪；十五岁任闽西红军武装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锋芒初露，打入“铜上杭”、“铁赣州”；十六岁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接着又投入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七岁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在赣南打得山岳摆簸，天地失色……到十九岁，他已经参加了全部五次反“围剿”战斗，成长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将领。

第四次反“围剿”，他的大腿被打穿；第五次反“围剿”，子弹又在他腿部钻个洞。然而，他的脚步始终年轻，迎来了戎

马生涯最辉煌的二十岁。

二十岁的杨成武多次挂“先锋印”，率“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先头部队，他率红四团连续夜行军，在信丰地区大战一天一夜，将几个师的敌兵傍五岭山脉依信丰河水构筑的碉堡群一一捣毁，把号称“铜墙铁壁”的第一道封锁线几乎全部踏平。接着乘胜冲突，在大庾与乌径之间，将湘粤军阀摆开的“一字长蛇阵”拦腰斩断，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漏夜奔袭，一鼓作气攻占九峰山；激战一天，掩护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二十万重兵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夺道州，逼湘江，开始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血战。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国民党四十万大军沿天然屏障湘江构筑一百多个碉堡所组成。不足八万的红军能否突破湘江，甩掉蒋介石的五路“追剿军”，确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杨成武率红四团首先在界首打响，将“武器精良”的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打得全线崩溃，狼突豕窜，为红军大部队和中央纵队抢渡湘江夺占了一个个阵地；尔后连夜急进，占领觉山，在国民党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中，抗击了何健十六个团的疯狂进攻。血与火的两天，这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神哭鬼泣，终于掩护主力渡过湘江，跨越湘桂公路，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是役，红军损失过半。

是役，杨成武腿部第三次被子弹洞穿。

老红军都说：没有湘江战役便不会有遵义会议。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终于选定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腿部三次负伤，未曾影响杨成武长征。在担架上躺了十多天，他又回到红四团，作为全军的先锋，突破乌江天险，在中

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并在民间留下一个“水马渡乌江”的美好传说。之后，夺娄山关，战桐梓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智取三县，强渡天险金沙江；越冕宁，沿当年石达开的行军路线来到大渡河畔，扎寨于漫山遍野布满太平军荒冢的营盘山。

七十年前，石达开为大渡河所阻，向将士慷慨陈词：“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噫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然而，石达开强渡失败，发出“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之悲叹，终于全军覆没，在营盘山留下无数枯骨荒冢。

中国工农红军“起兵以来”不足八年，三万大军比当年石达开的四万大军晚到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水更高，浪更险；石达开抵大渡河时，北岸尚无清军；红军抵达大渡河，蒋介石已经陈兵北岸，将红军围得铁桶一般。难怪他敢夸口：“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杨成武受命于危难，再次率红四团任先锋团，猛扑泸定桥；迎暴风骤雨，走峭崖陡壁，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其间翻十几座大山，架几十米木桥，打两场恶仗，夺几道险隘，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徒步作战行军的最高纪录，按时到达泸定桥边。全团不及休息，选出二十二名突击手，装备冲锋枪马刀，攀缘碗口粗的十三根铁索，迎着对岸两个团守敌的炮火弹雨冒死冲击，真如神兵天降。国民党兵何曾见过这样的英雄猛士，便失魂落魄地在桥头城门放起大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照红高峡云空却奈何不了红军勇士。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吼声震天，闯入火海，突上桥头堡，杀人泸定城，打得石破天惊，鬼哭神泣。杨成武亲率一个连紧随二十二名勇士，边打边

铺桥板，随后杀入泸定城，歼敌大半，夺占全城，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一条胜利之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万里征进，杨成武率领英雄的红四团像剑锋刀尖，第一个涉险翻越雪山，第一个冒死走过草地，长驱北上，直达腊子口。

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恶关隘。腊子山横空出世，一拔千仞；天工神斧将这石岭大山劈出一道深沟，两边绝壁峭立刀裁一般齐；腊子河从沟底汹涌而出，浪花激荡，卷起多少漩涡，自古无人徒涉。腊子口前沿，两壁之间一座木桥，桥东丈把高的悬崖上筑起一组碉堡群，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再次担当先锋团，正面冒死连续冲击，侧面攀缘九十度壁立的百米陡崖，一时间崖顶上浓烟烈火，钢铁呼啸；峡谷里刀光枪影，血肉横飞，被称为天险的腊子口，转眼间便被红四团攻占，并且一路追杀溃敌，奋余威杀入岷州城。

杨成武就是以这场战斗结束了他的二十岁，开始其二十一岁的战斗生活。他在二十岁时所打的诸多著名战役，都被搬上了舞台，搬上了银幕和屏幕，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势下，也没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这些光辉战绩。

二十一岁的杨成武参加了东征，随后出任红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打响第一枪的是杨成武所率的独立团。

杨成武指挥的黄土岭战斗，歼灭日本兵近千人，并击毙了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名日

军将领。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三天。“帝都降半旗致哀”。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的中国名将杨成武，是年刚满二十五岁。

杨成武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对地道战的战术、技术进行研究后，写出军事专著《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不可攻克的要塞，有力地推动了平原游击战争，堪为人民战争史上一大创举。

抗战八年，杨成武始终征战于烽火前线，不曾有一日去后方休息。刚满而立之年，又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张家口战役，保北大捷，正太战役连战连捷；战清风店，克石家庄，西出平绥线，挺进塞外；解放张家口，会师北平，又将红旗插上太原城……

当杨成武率领的二十兵团担负起保卫首都北京的重任，被誉为“首都兵团”时，这位年轻的司令员还不满三十五岁。

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朝鲜战火又起。当抗美援朝战争由运动战转向阵地战之际，年轻的司令员杨成武又受命于关键时刻，率十几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运动战打了五次战役，用时近一年；杨成武坚持阵地战，一战就是两年。其间粉碎了美国军队的“特混支队作战”、“坦克霹雳战”、“绞杀战”、“细菌战”，创造了日歼灭美军的最高纪录……

一九五五年，进入不惑之年的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在灿若群星的上将军里，他属最年轻之列。

白云悠悠，岁月悠悠。

十二年时光流逝，杨成武已经五十三岁。使人惊讶的是，他脚步依然年轻、富有弹性，他的脸上见不到一丝皱纹，一切都与十二年前无异。

其实无须惊讶。据说真正的男人，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上帝赋予他的黄金年华。若无大的忧郁和煎熬，这十年人不会显太大变化，也最难以貌判定年龄。

哨兵和警卫像钉子钉在岗位上，用军礼向这位总参谋长致意，目送他登上吉姆车；闪烁的目光里，始终诧异难消，疑惑不解。

铁流二万五千里，他能挂先锋印？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他可驰骋疆场？能杀得天开地裂，江山改色？

他不粗犷，不剽悍。文雅得像一介书生。他的身材不适合“魁梧”二字，可用“修短合度，胖瘦匀称”来形容。他有一张近乎秀气的脸孔；肤色白皙，隐隐透出晕红的光泽；前额有棱有角富于石雕的感觉；眉宇疏朗清廓，两眼深邃透彻，总是带着一种静谧无言的温厚和纯朴。他的鼻子线条简捷硬朗，焕发出男性的挺秀，可是嘴唇却鲜嫩得近乎孩童。从侧面看，那双唇相交的线条就充分显示出图案艺术中人所共知的“双弧曲折”；不过，他常有抿紧嘴角的时候，使唇线变成刚直的一道，并且牵动他那圆润的下巴，凝结成坚硬如石的方块。

吉姆车绝尘而去，留给哨兵和警卫的是一番感慨议论：世界就是矛盾，人就是不可貌相啊……

长安街一掠即过，拐弯丢在身后。

一掠之间，那景况已尽收眼底，再不会忘。虽然天已暮色，涌动的人潮仍然横溢；“蓝色”、“黑色”、“灰色”，更多的还是“米黄”和“国防绿”，成群结伙，无一例外地佩有红臂章，不知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公共汽车笨拙地扭动它那长长的身躯，躲闪而进，却无法寻找接近站牌，只好停在路中，被游串的小将们团团围住，争相往上拥挤。广场和

马路两边，这里一簇，那里一堆，人们争相探出手臂，抢夺几名男将女将散发的各种“战报”、“小报”和“号外”。拿到报纸的人，有的并不马上离开，和二三同伴匆匆扫过那字里行间，议论些什么。忽然，有人神经质地跳起，振臂一呼：“打倒刘邓陶！”……

杨成武收回目光，将身仰靠沙发，两腿伸出，松弛一下筋肉。一年来，他像许多老干部一样，精神一直处于紧张、亢奋又疑惑、忧郁之中。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杨成武想驱走它，因为这是刘少奇讲的，刘少奇现在究竟是什么问题他搞不清；但是驱不走，遇到具体问题，这声音又会顽固地荡漾起来。

他竭力想跟上形势，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只是力不从心，心不由己。他内心不相信批判刘少奇的那些话，更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

他对刘少奇是崇敬的，有感情的。

长征时，他率先头团一路冲杀，同时也担负过保护刘少奇、陈云，保护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康克清、刘群先、廖施光、杨浩珍八位大姐的责任。从贵州到云南一段路，他是从作战部队调出八匹战马，各配一名马夫去照顾八位大姐；在义兴县，缴获了许多饼干、罐头、面包和黄油，他没舍得吃一口，让给少奇、陈云以及八位大姐送去。出生入死一道杀出来的战友，怎么可能反党？

刘少奇对他是信任的。那是正太战役之后，刘少奇在邢塘找他谈话。他只带一名警卫员赶去，刘少奇远远迎出门来招呼：“辛苦了，你们这一仗打得好！今天战役告一段落，我请你来谈件事……”刘少奇拉了杨成武的手进屋，亲自为杨成武

沏茶，一边说，“你坐着，坐着。长征你保护我，照顾我，我给你沏杯茶还不该吗？长征你是英雄，泸定桥是你夺下来的，乌江是你突破的，雪山草地是你首先闯过来的，抗战八年你更打出了威风，晋察冀是模范么。现在解放战争，还要奋斗，继续努力。我和总司令给毛主席打电报，建议把杨成武提上来，到华北野战军当政委。毛主席已经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杨成武说：“服从组织分配，一定把仗打好。”刘少奇点点头，笑道：“嗯，你们聂老总还舍不得放你哩，我说不放也不行，这是全国大局的需要……”

进城后，刘少奇又找杨成武谈过话，只有朋友相交才会谈得那么坦诚交心：

“成武啊，咱们以后要多见见面。长征你打得好，还保护了我们，我们是忘不了的。到了华北工委我和总司令建议毛主席把你调野战军当政治委员，这些你都知道了。这次我就是想给你谈谈心。军队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一个人干，再英雄再好汉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你是个中学生，最多和我一样。从经济上搞，顶多当个富农；从业务上搞，顶多当个教书匠，当个小学教员。你不可能当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你不可能当这么多司令员。我呢？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地位。我们都是靠了党的领导，都是离不开共产党啊……”

刘少奇忘不了杨成武，杨成武怎么能忘记刘少奇？

刘少奇发自肺腑说他离不开共产党，他又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然而，像绝大多数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老革命老红军一样，无论杨成武有什么样的个人想法，决定他态度和行为的只

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态度，而不会是个人的想法。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历史事实一次次地证明，按毛泽东说的办，就是发展和胜利；不按毛泽东说的办，就会遭受失败和挫折。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毛泽东的声音，在耳畔高亢地回荡震响。于是，那涌动的人流便不再那么令人厌烦忧虑。悠忽间，一幅近似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杨成武面前，仿佛被人施过魔法一般，竟那么真切清晰：

狭窄的街市也是人潮涌动，有穿长衫的先生，穿短衣的学生，穿汗衫的工人、学徒，穿布褂或赤膊的农民，也有穿旗袍或大襟褂的女人，一队队穿灰军装戴八角帽的红军穿行其间。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有人开路，有人敲锣，几名赤卫队员用木梯抬了一具尸体游行。是军阀郭凤鸣的尸体。

这是闽西的长汀，杨成武读书的城市。老师张赤男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样？”杨成武和几位同学说：“好啊，走！”

在闽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形势下，杨成武就这么简单干脆果决地投身了革命。缴了古城民团的枪，又缴了四都民团的枪；开仓分粮，烧毁地契，公审和枪决地主豪绅。成武从一开始就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是，军阀郭凤鸣带主力部队赶来围剿了，他们不得不钻山沟，入密林，搭草寮，吃野菜。多少难眠之夜，大家透过树叶的点点缝缝，仰望星空，听张赤男讲列宁，讲毛泽东和朱德，讲井冈山……

晴天一声霹雳，毛泽东率红四军攻克长汀，击毙了军阀郭凤鸣！几乎就从那天起，毛泽东这个名字在杨成武心中便与希

望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张赤男带领他们赶到长汀，并请毛泽东来与他的游击队员们见面。这是杨成武第一次见毛泽东。在十四岁的杨成武眼里，毛泽东的个子好高哟，两眼光亮照人，那手又粗又大，相比杨成武尚未长成的小手，一握就全攥入手心里去了。

“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杨成武。”

“哪个地方人？”

“我是城里的，七中的学生。”

“投笔从戎，好啊，缴过枪没有？”

“缴过民团的枪。”

毛泽东手下用了用力，杨成武几乎被握疼了。

“好，好。你这个小鬼哟，人不大，很机灵。缴过民团的枪，还要缴白军的枪啊！”

游击队员们跟随毛泽东进照相馆合了一张影。照片虽然在战火中丢失了，但那一幕却永远留在了杨成武记忆中。

比较刘少奇而言，杨成武认识毛泽东更早，接触更多，受的教育和影响也更多更大。他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将领。

记得那次打下赣州城，杨成武忽然接到命令，说毛主席召集连以上政治委员去开会。杨成武忙带着大家赶去毛泽东的住地。

“成武啊，”毛泽东一见面就问，“听说你们抓了不少的资本家？”

“抓不少，三百多。”

“你们了解清楚了吗？”

“听不懂他们讲话。”

“你们抓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戴礼帽的、戴眼镜的、穿旗袍的、拿拐棍和穿皮鞋的？”

“是呀，没错，抓的全是这些人。”

“你这个团政委，你又不了解这里话，又不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就违犯政策。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了资本家的标准，讲了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说：“你们现在就回去，回去赶快放人，给他们赔礼道歉。说清我们不懂话，没做调查研究，承认错误……”

杨成武回去赶紧纠正错误，经过调查研究，全城真正的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只有四个……

“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杨成武心里默默自语，发现车已停住。车窗外可以看到怀仁堂的屋檐。警卫参谋打开了车门。杨成武下车后，径直朝怀仁堂走去。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结束时，总理打了招呼，还要跟他和汪东兴再碰碰头，具体落实毛泽东南巡的各项事宜。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是要搞调查研究么。杨成武心里宽松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主席一定会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的。

杨成武独个儿点点头，脚步轻捷有力地走进了怀仁堂。

四 随时向总理报告

“准备得怎么样？”周恩来在怀仁堂的西大厅里，两眼一眨不眨望着杨成武。他日理万机，忙得不肯说一句多余的话。

“我已经组织好一套班子，带了电台、密码和保密电话，通讯联络随时可以和总理联系……。中央机要局送来两名译电

员，一个是广东人，还有一个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的，叫谢静宜。江青同志说他不错。”

“安全方面呢？”

“做了全面准备。天上、地上、水上、飞机、列车、舰艇都已安排好了……。调来4架‘伊尔18’，2架‘子爵’，2架‘伊尔14’，还调了4架‘米8’飞短途。地上准备了3列车，前驱、后卫和主车，都反复检查过了。水里已经和东海舰队联系好，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警卫部队已经作好一切动员和准备工作，随时可以行动……”

细心的周恩来略作沉吟，那是对毛泽东南巡的每个环节作一番过细思考。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他一直是将对党的忠诚来对待毛泽东。无论重庆谈判还是转战陕北，毛泽东走的路，他要先探一探，毛泽东吃的饭，他要先尝一尝，毛泽东要出现的场所他要先检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坐的椅他都要先试一试……

“我先到武汉，乘飞机。”周恩来坚持“事必躬亲”，思索着说，“十四日晨就可到达。你们十五日到，到之前不要中断联系。”

“是，总理。”

“陈再道回武汉之前，我要他集中精力抓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停下来望望杨成武。杨成武没作声。他明白周恩来的苦心，是含蓄地对他杨成武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也运用自己的影响朝这方面努力。杨成武轻轻点一下头，表示自己的心是与总理相通的。周恩来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仰面默思，轻声说出几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关系到主席这个想

法能不能顺利实现。所以……”周恩来没有讲下去，而是重新望住杨成武，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凝望片刻，他终于说出一句话：“成武，你要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

“我随时向总理报告。”杨成武庄严地说。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周恩来的忧虑之情无法掩饰，“主席这次视察，关系重大啊！”

杨成武肃容点头。他是驰咤疆场的名将，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但他深知没有饭吃会饿死人，会天下大乱。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也是首先在战场上树立起来的，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与国民党进行尖锐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更懂得“民以食为天”，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是，毛泽东对经济规律有多深的认识？

杨成武没有想过。哪怕动动去想的念头，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不敬，是他的信念和感情所决不容的。

不过，有件事杨成武却是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常提起这件事。

就是那次打下赣州，杨成武捉放三百“资本家”，其中有位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曾参加同盟会，曾资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曾在新加坡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红军打下赣州时，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嘉庚对国家、民族所作贡献的重大意义，陈嘉庚当时也并不认识红军奋战的全部意义。

于是，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杨成武向陈嘉庚募捐：“我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希望陈先生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帮助。”

陈嘉庚没有热情：“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

“能帮。”杨成武说，“我们军费很困难，药品奇缺。希望能向陈先生募捐四十万大洋。”

“我没有。”

“三十万也行。”

“一万我也给不了。”

“我们知道你很有钱。”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

“你不给，我们就只好没收你的东西了。”

“好，你们没收吧。”陈嘉庚很大方地做个手势，“全没收去吧。”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主要从事橡胶业，所以他的货也主要是胶鞋。红军没收了他的全部胶鞋，还有一些筒装的香烟。这些东西发到全军，杨成武也分到一筒香烟。他不会吸烟，便对那些“烟民”讲：“你们要努力学文化，谁考一百分，我就奖谁一支筒里的烟。”在这一筒高级香烟的奖励下，还真有不少红军战士下功夫学习，考一百分来吸一支高级烟。

后来，陈嘉庚认识了红军，红军也认识了陈嘉庚。抗战爆发后，红军改为八路军，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陈嘉庚也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出钱出力支持国内抗日斗争，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该会主席。

一九四〇年，陈嘉庚回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慰问边区抗战军民。毛泽东迎接陈嘉庚，握住陈嘉庚的手说：“陈先生，我要向你道歉啊。过去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打赣州，没收了你公司里的胶鞋和烟。”

“毛主席，我得感谢你们啊。”陈嘉庚笑得开心，“你们这一没收，可帮了我大忙啦！”

“噢？”毛泽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陈先生讲笑话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我是讲实话。”陈嘉庚收住笑，认真诚恳地解释，“你那时没收的越多，对红军对我都越有利。那时是通货膨胀，货卖不出去还得烧，还得倒海里去。谢谢你帮了我忙，解决了你们的困难也省了我许多力。”

建国后，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对杨成武说：“陈嘉庚现在是我们的政协副主席了，还记得我们没收他胶鞋的事吗？”

“记得。我跟他要四十万，他不给；要三十万，他也不给。他让我把东西都没收走。”

“是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四〇年他到延安，我们直道歉，他还直谢我们，说我们帮了他大忙。”

“怎么？我们没收他还帮了他大忙？”杨成武也惊讶。

“是啊，我们不大理解……通货膨胀，倾销都倾销不出去，还得倒海里……那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哟。”

毛泽东几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杨成武记忆深。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去联想毛泽东也有许多不懂的事，也会因此犯错误……

松柏枝头撑住一弯月，撑起一个繁星闪烁的苍穹。

灯火明亮的西大厅里，“碰头”已经结束。也许是怕中央文革那班人节外生枝，另搞名堂，周恩来不忘作第三次郑重宣告：“我再讲一遍。杨成武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联络员，一切重要事情，杨在主席和我之间传达、报告。一切重要的事。”

杨成武明白这样反复宣告的意义，这不仅是信任，也有利

于他今后的工作和行动。

“主席无论乘飞机、火车还是轮船，你——”周恩来望住杨成武，“杨成武都要负责安全。”

杨成武动了动肩膀，仿佛重负在肩。

一名工作人员来报告：“主席那边来电话，找杨成武。”

周恩来向杨成武点头示意，杨成武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中央文革的成员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目光里流出的内容微妙复杂。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杨总长，主席想找郑维山谈谈。”

“谈什么？我通知他。”

“主席想了解整个华北的形势。郑维山不是刚陪陈伯达转一圈吗？他们去了天津、唐山、保定等地，主席想在火车上听郑维山谈谈，不知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我现在通知郑维山到人大大会堂集合，然后一道上火车。”

“好。专列三点准时出发。”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夜十一点二十分。

第二章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潮漉漉的早晨，浑蒙蒙的武汉。

吉姆车从武汉军区急驰武汉空军驻地。

“娘卖×的吴法宪！”陈再道咬牙切齿骂粗话。外面传说“陈大麻子”，见面没有谁看出麻子，只有这种盛怒之际，隐隐能感觉到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出现于肌厚肉重的脸孔上。

武空政委刘丰一早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武汉，要见陈再道。陈再道一听就火：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为啥事先不告诉？总理到了武汉，提出要见陈再道才告诉陈再道。我陈再道在你吴法宪眼里是什么东西？

急刹车，狠摔门。陈再道大声大响地下车往招待所里闯，一看就来势不妙。随周恩来来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啊？”

“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径直跨入门去。

周恩来正用早餐，闻声抬起头，将手一招：“来吧，都来一起用餐。”接着吩咐接待人员，“拿几套餐具来，数数几个人。”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按总理手势，在餐桌旁入座。周恩来平平静静，边吃边问：“东湖那边怎么样？”

“东湖宾馆乱得很！”陈再道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又涌上来，“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并不在意陈再道的情绪，那是一种从容大度的宁静，只把头点一点，像谈家常话：“把它打扫出来。”

“打扫？”陈再道差点又喊出不好听的话，被钟汉华捅捅，才降低声音，边喝边嘀咕，“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我去看看。”周恩来仍然是家常谈话的清淡语气，“你们吃过饭也来一下。”

当武汉军区的将军们来到东湖宾馆时，周恩来已经把两派服务员都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两派群众都被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找工具打扫房间。

陈再道开始不安。让总理做这种管理员干的琐事，唉，太不过意了。他赧颜走到周恩来面前喃喃：“机关瘫痪，我们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无法究他……”

总理用手势止住陈再道，面对面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稍停顿，然后加重一点语气，“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

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心里一热，全明白了总理的心意，不由得诉说一句：“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断陈再道的话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谢谢总理！”陈再道振奋起来，立正敬了一个精神十足的军礼。

一 微 行

人大会议二楼一间小餐厅，两位将军草草用过夜宵。

“没有酒。”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嘀咕。

“不是喝酒的时候。”杨成武呷口茶水漱嘴。

“头次进京，咱们拿大杯子喝。”郑维山一脸怀恋之色。

“在遵义还拿碗喝呢……”杨成武不无惆怅。

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遵义会议结束，传来毛泽东重新回来领导红军的消息。三军沸腾，杨成武的部队举行了会餐。铁盆子盛菜，大碗装满茅台酒，将士们席地围了一圈又一圈。杨成武举起酒碗说：“毛主席回来领导咱们，这下准能打胜仗，革命一定能成功了！”先锋团的将士轰声响应，大碗喝酒像喝凉水一般干脆痛快。欢呼，拥抱，鼓掌，歌唱，好像胜利已经到来。

果然，十三年后，天翻地覆。三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把杨成武请到司令部所在地清河。那一夜，三十多位将领欢聚一堂。

“庆祝胜利，过春节，一个人先来三杯！”郑维山擎起高脚杯，走到杨成武面前，“你是这个部队的老司令员，你先喝！”

立刻有几名将军举杯附和：“干！干！”

不容杨成武搭话，耿飚已然逼上来：“三杯！干三杯！”

这位三十五岁的“老司令”豪兴陡发，奋然起身举杯：“不，五杯！我干五杯！”

五大杯烈性白酒被杨成武一口气连续干完，激情更是不可遏制，转过来向耿飚、杨得志、郑维山等将军展开反攻：“来，六杯！干六杯！”

杨得志犹豫：“你先喝，我后喝。”

杨成武坚持按规矩办：“我干过了。这次你喝了我就喝！”

“喝！喝！我先喝！”还是耿飚痛快，脖子一仰，那杯酒便倒进肚子里去了……

唉，那时可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天下大乱。

两位没喝酒的将军驱车北京站，在专运处那边登上专列。等候几分钟，车下响起骚动。

是负责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到了。八十名成员都是精明剽悍、训练有素的连排级干部。除了轻捷的跑动声，听不到其他音响，转眼之间便从站台上消失，都登上了前驱车和后卫车。

几乎是在站台空寂下来的同时，几辆黑色轿车急驶而入，停在主车车门口。杨成武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下车，立刻就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登上主车，几辆轿车随即驶离。他刚把目光离开重新空寂下来的站台，专列已经开动。他看一眼腕上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

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

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汪东兴、秘书及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没有招呼不会乱串。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谈。”

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起身。

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

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

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入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

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喜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

“两包香烟收买一个支部书记；舍一个女儿出去，就能俘虏一个县太爷，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个“道”要比那个“器”扑朔迷离，深奥得多。

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胜不衰。军阀也罢，蒋介石国民党也罢；日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陈独秀也罢，张国焘也罢；甚至还有那位“也许是你正确”的彭德怀，只要站到了对立面，他无不挑战而出，胜而不休，“宜将剩勇追穷寇”，要一个完全彻底。

可是，同“无形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

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英国的“羊吃人”恶不恶？但社会获得巨大进步。难道只有“恶”才能积累财富，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他与生俱来地“疾恶”如仇，所以要“另辟蹊径”，不信“善”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从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是扬“善”除“恶”，倡“公”废“私”。

他困惑苦恼的是人性的不可思议。

新中国成立，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是为“自己”这个主人干活了，人人都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心尽力吧？生产力该获得最充分的解放吧？

可惜，这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实际呢？却是举国的消极怠工，惊人的浪费；这些“主人”在“父爱”下不思进取，悠闲度日。

一群人在地里干同样的活儿，哪怕是一名妇女因为来例假停下来歇口气，其他人也会觉得吃亏，心里失衡，跟着停下来歇气。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们是宣过誓的，应该“献身”。可是，党员干部带头出大力，流大汗，群众看着不过意，也可以跟着轰轰烈烈流点汗，一旦党员干部不在了，群众又顺着禾垄睡大觉；如果党员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甚至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那么群众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莫非人就是只有看到实际利益，能满足个人的私欲才会生出积极性？难道人就不能改造成只讲奉献不要享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毛泽东坚持不让这一步。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得不对现实退一步，稍喘过一口气他就又坚持到原来的战线上。而且，对那些讲求实际，从“一大二公”退到“三自一包”的人逐个“算帐”，把他们视为“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怕这些人是昔日的亲密战友呢！

谁说唐·吉珂德大战风车没有一种悲壮的美？毛泽东与他想象中的那个魔鬼搏斗，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说：“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

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了。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不惜泯灭人性……他的人民至今还没摆脱贫穷。”

毛泽东主张“水至清则无鱼”，主张有右派朋友，主张留有对立面，唯独在人性上，却主张除“恶”务尽，容不得人性的矛盾。莫非他忘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他恼怒“宣过誓”的党员干部不能都像铁人王进喜，不能都像虎头山上的陈永贵。他希望人人都能像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讲的。所以他首先拿干部开刀，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想象中的魔鬼战斗，同时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可是，实际的矛盾仍然不像理论一样那么简单。

曾经为他开过专列现在担任铁路局机务段党委书记的孟昭勤敲着饭盒问工人：“你们见过吃‘钢丝面’^①的走资派吗？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一个月只能凭票吃半斤肉？”

工人说不出话。

理论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到了内蒙古，就变成汉族干部与蒙族干部的矛盾，东部区干部与西部区干部的矛盾，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到了云南，又变成南下干部与“边纵”干部的矛盾，转业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

注① 一种用玉米压制的食品，粗糙、难消化。

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根据地多，山头多，现在一“斗争”，矛盾就更多更激烈。这些矛盾一经和新产生的更加激烈复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矛盾“相结合”，那就绝无是非可言了。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成了各山头、各派群众组织的“争权”“夺利”。

理论上讲，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到了实际中全然不可能。如果说最初群众组织还有“造反”和“保卫”之别，一旦造反不杀头，造反有理，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擎出这面旗，反正有个“三结合”，无非是“结合”谁，“打倒”谁而已。于是，解放军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山头”和“派系”的争斗中，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再超脱，不得不忙于在各派政治力量中搞平衡，作仲裁。若不是有周恩来作得力助手，他简直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思考大的决策……

“这么说，都在抬出我的招牌嘛！”毛泽东终于对郑维山的汇报发出惊叹。

不是吗？河北省几大派，各自“造反”，都有要打倒的“走资派”，也都有准备结合的“革命干部”。

你是先判别“走资派”再论“造反派”，还是先定“造反派”再论“走资派”？

河北省军区支持一家造反派，三十八军又支持另一家造反派；中央文革先表态河北省军区支持的是造反派，陈伯达转一圈又说三十八军支持的是造反派，各自发枪，刀兵相向，用不着“走资派挑动”就天下大乱了。

杨成武说：“原来六十九军与河北省军区观点一致，三十

八军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后观点不一致了，闹起矛盾。”

毛泽东无法仲裁，只能平衡：“你是总长，你给两边做工作。”

杨成武说：“我找了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的领导在京西宾馆开一次会，我说你们不要不一致。你们三十八军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河北省军区也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不要闹矛盾。我批评河北军区，说三十八军从东北来，你们有责任帮助三十八军了解情况。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可他们回去观点还是不一致，还是闹。”

一个山头出来的还闹翻天，不是一个山头出来的还了得？

“解放军还是好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毛泽东决心不再仲裁谁是谁非，沉吟片刻，说，“坐在一起开会好。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武的要训练，文的、党政群干部也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全国的县人武部和军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轮流训练。小省来二三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来八九百，千把人。训练时间不一定太长，每一次训练至多两个月，两个月一期。到北京集训，各大军区也集训，各省市也集训。”毛泽东边思考边说，边说边补充完善：“到北京训练以前和训练以后，各省市、各大区都可以办训练班。一个是北京训练不了这么多，各省市、各大区可以分工办。还有一种，在北京训练完了以后，再加以训练，以巩固思想。”

谈话间，列车缓缓停站。望窗外，天光熹微。

“主席，天快亮了。”杨成武建议，“您休息休息吧？”

“郑维山要在石家庄下车。”毛泽东向窗外望石家庄。

“如果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

“就这样吧。”毛泽东起身向卧室走去。他谈过自己的体会：想不出办法，那就睡觉，睡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直到想出办法来。

毛泽东毫无倦意。既没吞服安眠药，也没有睡。他只是想躺躺，躺倒才能想出站立不倒的办法。

车入河南境内，毛泽东站立起来，再次召郑维山。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他思考再三，决定回到过去的态度上。过去他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后来又讲“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从他们手里“夺权”。现在他对郑维山说：“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

想了想，他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句话，他在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批示上已经写过。

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忽然变得浑厚，出现一种“共鸣”的轰响声。朝窗外望去，专列已驶上黄河大铁桥。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毛泽东望望郑维山，又望望杨成武，看到他们点头，便把目光转向窗外。

黄河一派苍凉，浓稠的河水仿佛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行军在阔大的沙质河床里，蜿蜒向东，融化在热浪里，消失于颤动的赭气中。

毛泽东用一种郁郁的声调望着黄河轻诉：“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

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像自语，像说给杨成武和郑维山，又像是把他阶级分析的立场和方法留给黄河。所幸是杨成武记录了下来，这段话没有随黄河流逝。

黄河已经被留在身后，再也看不到那派苍凉。

渐渐呈现于面前的是灰色基调的古城郑州。

“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

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出来，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

“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进行曲，“联络员”杨成武将这段“最高指示”通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中。

二 梅 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

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

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要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他的左边坐了“三三制”，那时还没形成“四人帮”，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干部私下称为“三三制”，包括了“大三”康生、陈伯达、江青；“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毛泽东的右边坐了“旧（救）国军”。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文革”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师称为“旧国军”。“旧”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新”生力量而言。但是国务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把

“旧”说成“救”；天下大乱，他们是“救国军”。

碰头会上，毛泽东举起左手，朝“大三”、“小三”那边一划：“我们的干部，不烧不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继续煽风点火……”接着，他又举起右手，朝国务院和军队干部的“旧（救）国军”们一划：“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救人于水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

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深明“将兵”、“将将”，治军治国之道。他常讲：“一个篱笆要三个桩”，天下不能清一色。“大三”、“小三”不能没有，“旧（救）国军”更不能丢，林彪这股力量也得用。

“一统天下”可以，“一色天下”不存在。“一色天下”就没有他这位领袖、统帅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碰头会上，毛泽东决定让陶铸“南巡”，“救人于水火”。他点了几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名，叫陶铸去保。会后，周恩来开列二十余名单，经毛泽东同意，交陶铸“南巡”时加以保护。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断然采取措施，利用“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制造事端，抓住借口，在陶铸南巡之前，将他打倒了。

现在，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吗？不过，要把文章作到毛泽东头上，怕也没那么容易，也未必有那个胆儿……

杨成武带着这种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顾不上休息，直奔“百花一号”周恩来的住地。

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他没进自己的住房，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总理！”杨成武敬礼，然后同周恩来握手：“主席已经安

全到达，住进了梅岭一号。”

“好。”周恩来拉杨成武坐，“先讲讲路上的情况。”

杨成武拿出沿途所作记录。虽然早已发过电报，他还是详细地汇报了全过程。

周恩来听得很细，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不放过，不时地点头，显然比较高兴。可是，听完汇报后，他像想起什么事，眉头微微一皱，起身踱了几步，似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周恩来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杨成武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周恩来用手势阻止杨成武，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讲话必须慎重：“他是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通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杨成武回到自己住处，立刻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

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帐！”

余立金和李作鹏不由得都挺挺身，好久没有这种“上战场”的感觉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园一号。

周恩来早饭后对杨成武说：“今天你参加听听。”

东湖在武昌市东郊。碧波万顷，渔舟荡漾；港汊交错，称九十九弯；大湖之外连小湖，小湖左右又连湖。南岸山峦吐秀，东岸丛林飞翠，北岸荻芦含碧，西岸亭台楼阁。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去梅岭一号，一路“丛林飞翠”，远眺九女墩、湖光阁、磨山，彼此相望，互为映衬；山容水貌宽荡胸怀，不禁消去几分隐忧。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杨成武一进梅岭一号，就给热得淌汗的毛泽东泼冷水。“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上几天？”

“一整年了。”毛泽东将沾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三根指头拎起来，轻轻搦动，不无抱怨，“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毛泽东动气了。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连火车也坐不稳，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他可一个也没遇上。

杨成武不急不忙陈述理由，决定他态度的是职责，而不是领袖的情绪。

起于青萍之末，掠于秀木之梢。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从到达武汉那

一天，他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异兆。再见到谢富治和王力，再接触一下武汉军民，再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可是，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下，他又不能直接据此发出“气象预报”，只能另谈理由。

他做了一些应急准备，比如下令机场打开后门，以备前门万一被堵，可以从后门登机。他与汪东兴、郑维山坐船查看了长江水。他的秘书张忠庆是白洋淀人，一身好水性，还下水游了一趟。上船后，天快黑了，好多人围住船看热闹，其中不乏红卫兵，一片声喊：“杨成武！这个是杨成武，是杨成武将军！”杨成武忙否认：“我不是。”红卫兵们喊声更高：“你骗人！你就是杨成武，我们认识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在吉普车上陪毛主席一道检阅过我们！……”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乘敞蓬吉普车。司机旁坐着汪东兴，身后两侧站立杨成武和谢富治，照片发在各大报刊，贴满宣传栏。现在陪检阅红卫兵的三个人都来了武汉，其中杨成武更显眼些，一下子就被红卫兵托出了老底。他没法解释，忙钻进汽车溜走了。

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是“微行”，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来劝阻毛泽东：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张张嘴，没有马上说出话。他要游长江，并非只是“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也不仅是“一整年了。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这里有政治。“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是总有人讲“到了斯大林晚年”吗？我还在游长江！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就是政治。

可是，他毕竟不愿过早暴露，过早轰动。那样不利于“微行”，不利于他的调查研究，把握真实情况。

“要推后几天？”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

“或许要一个星期。”杨成武认真回答。

“那好吧。”毛泽东沮丧地摆了下手，“只好如此了。”

周恩来赞赏地朝杨成武点点头，去毛泽东身边坐下。

郑维山、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等人已经陆续来到，各自找位坐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每天上午这些人到梅岭1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由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杨成武在长江水上忙了两天，这是第一次听汇报。看来毛泽东是在抬头一天的话题。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住谢富治问，“还讲了话？”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谢富治回答。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卫戍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了。

“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是保护军队和军队干部的态度：“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一针见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

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王力一边紧张记录，一边从字里行间揣摸毛泽东讲话的含意和精神。他眼睛有些发亮，似乎摸清了什么。毛泽东保护军队，但也点了几名将军的名。不言之中的意思该是军队也有“一小撮”，这“一小撮”还是要揪出来的。

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像是拿着一支针管要打预防针：“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支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表示“小事一桩”。“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毛泽东抬高眼皮朝着王力，目光里像是在问：你们能替代这个“名”吗？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吗？”毛泽东从四川又谈回云南，东一句西一句地随便拉扯。他想哪说哪儿，听者稍不留神也许就会丢掉什么重要的“思想”。

“周兴病了，赵健民谈了一下。”谢富治回答：“他对‘五·一六’通知认识不够。”

“五月十六日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好多猜测，还整到总理头上了。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毛泽东讲这些话时，不知是否意识到其中的悲剧？许多

“造反派”只是“枪”，是投机钻营者，他们没什么是非观念，完全是揣摸“上面”的意图，随时准备向任何人开火。

又听过一段汇报，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对武汉形势夸大其词的说法不以为然，庸懒地将手一摆：“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圜，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王力对毛泽东的态度感到着急。这几天的下午，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陈再道及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特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如何受迫害，如何想念毛主席，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革命造反，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讲到动情处，他不忘朝谢富治频频递去眼神。

“武汉军区是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谢富治及时接过话来，“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了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揪‘武老谭’，‘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王力用挖苦的语调说：“‘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老太婆、小孩子都进屋，说造谣。‘三新二司’的报纸出来就抢着买，有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听。”

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坐起身，语气也加重：

“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压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皱着眉头点香烟，用力吸进一口，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

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语气变宽宏：“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了。”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就怕毛泽东的宽容。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毛泽东却越加宽容，似乎王力的态度引起他什么警觉，故意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陈再道，要检讨。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毛泽东望望谢富治，谢富治没表态。也不好表态。毛泽东淡淡一笑：“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王力的记录笔开始发滞，心里若有所失。才有分心，又被毛泽东追回来：

“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

“军训全反过去了。”王力失去精神，说话声气降低。“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毛泽东一下子就肯定了武汉军区“两支”。

“反过去，还是反过来。”毛泽东完全没了脾气，“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保守组织。”谢富治替下王力，“前段造反派受他们压，压得厉害，现在开始全线反击……”

毛泽东联想万里，给谢富治又泼一盆凉水：“全线反击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搞入正轨。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还是主席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的任务与武汉地区谁“造反”，谁“保皇”，支持谁，反对谁并无直接关系，他参加汇报会也只是听听，所以讲话不

多，只是在关键地方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大联合的工作，不要再给两派煽风点火。”

“我跟成武是一致的。恩来啊，还有你。我们都主张大联合。”毛泽东把大手一划，将坐他两边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同他画在了一个弧圈里。

“主席，”周恩来摘下他的花镜，放茶几上，“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结束。晚上你是不是接见一下？”

“谈谈好么。”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下巴，“你也听听，你是总参谋长。”

夜，十二点半。东湖将一种纤细缥缈的无从辨识又能隐约感觉的清凉送到百花一号，送到梅岭一号。

这时的毛泽东思想活跃，思维顺畅。他坐在沙发上吸烟，右手朝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伸伸。于是，杨成武便像往常一样，隔茶几坐在毛泽东身侧。

这种情景每天都要重复一次或几次。

“明晚接见后，总理准备返京。”杨成武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明天下午武汉军区汇报结束后，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许多标语。”杨成武开始不紧不慢汇报情况。他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该怎样做。他的汇报总是只讲事实不加评论。这不像战争年代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是决策者。“标语内容主要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

“我们不是阿斗……”

“还是我的招牌，我们正调查研究。”毛泽东可能怀疑标语的指向。

“标语点了王力的名，要他照毛主席的话做，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杨成武不动声色地澄清了标语所指。“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问题，百万雄师有压力，刷了标语。”

“谢、王到造反派去过？”

“去过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

“到过‘百万雄师’吗？”

“今晚去了。”

“偏于一方。”毛泽东终于说出杨成武心里想的话。“还有吗？”

杨成武去拿水杯。他有许多思考，有许多话必须报告毛泽东，但怎么说？这里大有学问。几天来观察到的情景在脑中闪电般掠过……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周恩来下榻的百花一号又传出谢富治严厉的责斥声。从七月十七日始，每天下午这里都传出激烈的争辩声。陈再道、钟汉华盛怒难捺，牢骚满腹；谢富治、王力盛气凌人、态度强硬。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杨成武每次从长江边回来，走进会场一定会看到双方的争吵。谢富治声色俱厉：“你们支保吃‘左’，完全是跟百万雄师穿一条裤子！”

“我根本就没见过百万雄师的人！”陈再道脸红脖子粗，

“他们的头头我一个不认识，我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你们与百万雄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也硬要穿一条裤子！”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组织，可你们却把造反派组织‘工总’予以取缔，抓了他们的头头……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二个月了，至今你们还不改正，不认错！”

“我们是执行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也瞪起了眼，“他们冲击军区，搞打砸抢就要抓！八条命令是毛主席签发的，说‘所定八条，很好’！”

“你就讲‘八条’，你就不讲‘十条’，‘十条命令’也是毛主席签发，‘此件很好’，你为什么不执行？”王力拍响一下桌子，“造反派揪‘武老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再不转弯，你们自己考虑！”

“你算老几？要听你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王力几乎是在喊。

“不理解的要执行？”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摇摇头，“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你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大喊一声，全场顿时静下来。谁敢反对林副主席？吵红了眼，韩司令竟忘了这话是林彪讲的

……

二十多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情景，曾说：“在我们汇报的时候，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一些同志来时来走，进进出出，没有参加汇报的全过程……”

他讲的“来时来走”的同志主要指杨成武。也许他的一些

想法始终不便出口：杨成武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疑惑始终未消，杨成武也没去澄清，因为他心里坦然安稳。在那特殊的形势下，他以自己行之有效的方式多次保护了陈再道……

“犯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想不通，军区的同志想不通。”杨成武放下茶杯时，已经想好怎么谈，口气客观，甚至音调声气也没有起伏。“为此，同谢富治、王力争论厉害，都认为跟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没有过二心。每天下午争论完，第二天上午陈再道和钟汉华又研究修改检查，对原来的检讨不满意了。”

“有话直说，认识多少改多少，这是好的。”毛泽东轻松地把手一摊，“我没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还有个游泳。”

对武汉的形势，杨成武不像毛泽东那么乐观。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因为他能看到毛泽东不在场时各种人物的真实面孔。

“王力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批评了他们，要求他们回各自原单位去。百万雄师提议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原单位，两派都不许跨单位集中。”

杨成武仍是客观叙述，毛泽东吸烟不语。

“王力说，你们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你们怎么能管得了别人？”杨成武稍作停顿，给毛泽东留有琢磨的时间，然后继续说，“百万雄师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举手投降，安全也没有保证。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毛泽东沉默着，一口接一口吸烟。杨成武不再言声，轻慢无响地呷茶。

“完了？”毛泽东终于打破沉默。

“完了。”杨成武望住毛泽东。他相信，毛泽东不会怀疑他汇报的客观性；以毛泽东的英明睿智，肯定会听出问题，警觉事态的发展还有扩大的可能……

“就这样吧。明天晚上你也参加一下。”毛泽东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他听出了问题，没有表态。他主张大联合，却没打算搞“平等”。搞平等就是搞折中，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不能变。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二十点。

东湖被晚霞映照得如同燃烧；林木在霞辉里婆娑，鸟雀在枝叶中礼赞。

周恩来带领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位“中南诸侯”走进梅岭一号毛泽东的客厅。

毛泽东独自坐满一张单人沙发，他的对面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物，是一种“接见”的架势。

“主席，”周恩来侧让一步，将陈再道和钟汉华让到毛泽东面前，“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毛泽东伸出手，并没站起来。他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很随意，不像接待民主人士注重礼节。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依次立正敬礼，然后伸出两手握毛泽东那只大手，然后侧立一边。

“坐，坐这里。”毛泽东右手朝身旁沙发煽动两下，陈再道和钟汉华便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头，拘谨恭敬。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

然后，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哈哈。”毛泽东笑了。陈再道的口气和嘟起嘴的神气，很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赌气。这使毛泽东高兴……放心。“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将手包罗万象地一划又一兜，“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毛泽东深知其人其势地笑道，“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嗯？”

毛泽东不明白陈再道的表情变化。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陈再道手指谢富治，一脸疑惑的憨态。

谢富治有些狼狈，苦笑着说：“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主席问我我不讲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陈再道一个劲皱眉，毛泽东闭嘴闭不住笑。许世友、陈再道，四方面军很出了几个可爱人物。

气氛轻松下来，毛泽东讲话也放开来：

“我一月二十一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你们，”他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二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毛泽东作势作态，陈再道面呈赧颜。“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些组织。四月六

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毛泽东习惯地吮吮下唇，补一句：“河南还在打。”

不叫陈再道插话的谢富治插话：“我们去湖北大学、‘三钢’、‘三新’看了，他们对中央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也表示了对受压造反派的慰问和支持。”

王力说：“也去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据点。”

毛泽东将手一摆：“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谢富治和王力同声解释：“我们都平衡了。”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毛泽东问一句，然后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他看一眼杨成武，杨成武明白，毛泽东注意了他昨夜的汇报，注意了百万雄师的意见。“三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杨成武点点头。毛泽东如他所想看到了事态存在扩大的可能。

李作鹏插话：“‘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有点冷淡。”

王力点头：“也有点慌的样子。”

“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毛泽东望一眼王力，

“不能说他都是坏的吧！”

杨成武缓缓接一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百万雄师很大部分是产业工人。”

毛泽东点头：“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招待所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起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解释：“后来推迟了三个月。”

“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以手指地，是讲东湖宾馆，“这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他再指陈再道，“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厉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了，绞死、油炸了，全线出击哟……”毛泽东啧啧响舌，“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

“中央文革里，王任重一直是保；反对红卫兵，反对革命大串联……”王力列举王任重“保皇”罪行一二三。

毛泽东皱眉头：“噢，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

谢富治顺插一句：“贺龙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都搞到钓鱼台去了，搞了不少名堂。”

毛泽东又皱眉：“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

王力火上浇油：“他的读书笔记问题很多。他的读书笔记发到区以上干部去读去学习，而不学毛著”

不知谁冒出一句：“他作诗称主席是兄长，以兄弟自居。”

毛泽东第三次皱眉，脸色黯下来：“最后结果，还要等一

下。先让群众去批。”

又有人敲了一重锤，落井一石头：“他死抱着说，万万不能承认三反分子，就是不检讨自己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不再皱眉，脸色平淡下来，将手轻轻一指，就像随手丢掉什么不值得再留恋的旧物件：“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没人再点头，再扔石头，身子都靠向沙发，干完活儿歇歇气的样子。

“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重拾话头，第二次问。“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

沉默半天的陈再道突然又冒一句：“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要中央文革讲话才行。”

王力被将了军一样涨红脸：“‘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息事宁人地摆一下手：“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他指向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谢富治和王力同时点头。

毛泽东再转向陈再道和钟汉华：“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予‘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马上再转向谢富治和王力，“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四·一四’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

毛泽东像是谈累了，身子向后一仰，伸出两条腿，垂下眼皮说：“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这样……那我就瞎了眼。过去我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谢富治报告：“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蓦地睁开眼：“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他重新坐直身体，收回两腿，用了总结性的口气：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调合复国论。”他的右手拍在靠近陈再道一边的沙发扶手上，边说边立起身：“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陈再道和钟汉华随声起立，确实轻松一阵子。

毛泽东少有地送客出门。走廊里有几名服务员，毛泽东招手，服务员紧赶几步过来。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的。你们握握手。”

服务员纷纷同毛泽东及陈再道、钟汉华握手：“不打倒了。”

走廊里响起一阵开心大笑。

三 惊 梦

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前提是：平衡、对外。
否则，就是对立。

谢富治、王力等人和陈再道、钟汉华陆续走出梅岭一号，候在夜色中，准备向返京的周恩来告别。

周恩来与杨成武慢走一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费尽心力的周恩来振作精神请示。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的声音略带疲惫，透着一种缓和，“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这给杨成武留下深刻印象。

“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又点出两个名字，并说，“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在象鼻子沟。”周恩来回答，“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二十多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真正保贺龙的人，不是他的老部下，而是毛泽东。他多次亲口对我讲，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这个话我向叶、聂、陈、徐几位老师都报告了。可是林彪不答应，‘四人帮’也不答应，劲头特别大，非整倒贺龙不可。他们指使造反派冲国家体委，到贺龙家造反。总理叫我去，把造反派赶走，我带人去赶走了造反派。贺龙被逼没办法，到总理家去住了好几天。林彪追逼得厉

害，直接跟总理谈话，等于‘摊牌’了。总理为顾大局，没办法了，找我说：‘贺龙在我这里，长住问题多了，影响我不好办。你想想办法，找个什么地方安排他？’我说：‘第一，到玉泉山；第二，到军区西山那里。’总理说：‘到玉泉山不行，人家有闲话，军委西山有叶、聂、徐三个帅，再把贺搞去；他现在的情况去了也不行。再想想，还有什么地方？隐蔽些，不要让人知道。’我想了想，说：‘有象鼻子沟，国务院的。这三个地方都是我参加修建的地方，比较熟悉。有地道，能防原子弹。’总理点头：‘好，就放象鼻子沟，放在离坑道口最近的地方。总理交待说，安全问题由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杨德中负责。我就派了一个营去负责警卫。造反派曾两次冲击象鼻子沟，被我们赶走了。没过几个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我全家人一个不剩地被关押起来，根本不可能再保护贺龙。我被关的罪名之一是勾结余立金，私调飞机把贺龙送到莫斯科去了。出这种谣言的原因是，我藏起贺龙后，‘四人帮’和造反派找不到，总理有交待，不让说。‘四人帮’问，我始终说不知道……”

毛泽东多次讲，“九大”仍然要选贺龙当中央委员，后来未能如愿。一方面固然是林彪坚决不答应，“四人帮”也不干。还有个重要原因，在“九大”前，毛泽东曾拿了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毛泽东在武汉还是明确表态保贺龙的。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毛泽东交待，“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杨成武报告。

多少年后，乌兰夫见到薛明时还说：“我跟你和贺帅关在一起，我听说过你们的声音，还望见过你们散步。就是没法见面说话。”他还感激杨成武，说：“文化革命是你保护了我。”杨成武说：“不是我，是毛主席交办的。”

握别主席，周恩来与杨成武边走边谈。

“问题基本解决。”周恩来说，“按主席讲的方针，要搞好大联合。”

杨成武说：“总理，我送你去机场。”

周恩来摆摆手：“你不要去，外面还乱，你去怕回不来。”

杨成武说：“不要紧，总理，我不看你起飞，我不放心。”

说话间，来到院子里。陈再道和钟汉华把周恩来送上汽车，最后握别。

“要搞好大联合，要稳定局势。”周恩来再次叮嘱。

“我们听总理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保证。

周恩来与杨成武同车驶往武汉王家墩机场。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周恩来拍拍杨成武手背，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叮嘱：“你这两个任务是很重要的。准确地传达主席指示，正确地反映我的报告，特别是保证主席安全。”

从机场返回百花一号，杨成武匆匆洗漱休息。连日奔波的疲劳和对武汉局势的希望与隐忧，使杨成武躺倒就有了梦意，却又辗转反侧像是半醒。

似梦似醒，几个小时仿佛合眼就过去了。杨成武耳畔巨响连串，声声惊梦。定定神，是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响：

“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

“百万雄师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真正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

到底！”

……

杨成武翻身下床，只见树影在玻璃窗上婆娑，天还未亮。但是，他已完全醒了。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将周恩来送上汽车后，陈再道和钟汉华并肩信步走向东湖宾馆乙所。为保护毛泽东安全，他们临时住进了乙所那排朴素结实的小平房。

两人没有话，心里酸甜苦辣一样的滋味，一样地自己品尝。

回想毛泽东的谈话，相信毛泽东是保护他们，不主张打倒他们；心里几分热，几分甜，从心里感谢他的关心爱护。可是，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思想根本没通，没通也得承认，也得检讨，心里又几分酸楚，几分苦涩。再想想谢富治和王力，一种莫名的恼怒和隐忧便又溢出心头。

一进乙所住地，两个人便对面坐下。

“下一步怎么办？”陈再道问他的政委。

“检讨。”钟汉华只说两个字。

“马上通知所有常委，明天上午开常委会议，我跟钟政委做检查。”陈再道向秘书下令。

“告诉他们，做好各方面工作，尽快放掉朱鸿霞。”钟汉华补充。

“下午在礼堂开师以上干部会。”陈再道没好气地说，“叫那两位代表给大家做工作吧。”

不管怎么说，这两位“诸侯”那难以忍受的沉重心情，今天由于毛泽东的接见，是获得了暂时轻松。研究布置完工作，

便各自上床休息。

经历了多少难以成眠的日夜，今天总算可以在梦乡里一求安逸。他们睡得很香。

可是，没等享受一个囫囵梦，惊梦的高音喇叭便一浪高过一浪地响彻耳畔。

陈再道一轱辘爬起身，两眼泛泛地朝窗外望着，怔有片刻，一拳捣在床板上：“娘卖×的，又搞什么名堂！”

他披衣而起，匆匆去找他的政委……

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和王力并肩步回他们的汽车。

“我提议，”谢富治忽然立住脚，“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

“嗯？”王力一怔，随即犹豫道，“哎呀，主席说了‘偏于一方’，叫咱们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刚说完我们又去看造反派，如果……”

“百万雄师总部我们去过了。”谢富治解释自己的想法，“只有这个最坚定的造反派水院我们还没有去过。支持造反派是根本一条，应该去看看。”

如果说陈再道是看重毛泽东讲的“控制局势”，抓了冲击军区的坏头头，那么谢富治和王力看重的恰恰是讲的第一条：不怕付出代价，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都没有也不容易像毛泽东一样综合考虑两方面。这与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派别的利益有关。

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院顿时沸腾，欢声雷动。

造反派的热烈感动得谢富治、王力眼圈都湿了。他们毫不

犹豫地戴上造反派的红袖章，在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的“文攻武卫”队员的护卫簇拥下，先看了学院里的据点、工事，又慰问了武斗负伤的教职员工，尔后直奔操场旁的“红水院”体育馆。

望着人群如潮，泪眼纷纷，谢富治热血陡涨，呼声灌满体育馆，飞出天外：

“你们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你们造反派要风格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放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情绪是可以传染的，王力的声音紧接着又在体育馆里回荡，他几乎是在喊：

“武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好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的呼唤余音未落，谢富治又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上台表态。客观讲，谢富治也罢，刘丰也罢，原本不是什么坏人，都曾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建树过功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丰也曾恼火造反派的打砸抢，恼火他们冲击军事机关，也曾抓过造反派头头，甚至主张“多抓几个造反派”。一旦发现“造反”是号召和支持的，他就迅速转变了态度。毕竟，他一生是跟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你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个小学生，来向你们学习来了！”刘丰诚恳地表态，“过去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我要向你们道歉！”

刘丰对群众敬礼，赢来经久不息的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他的胸脯开始起伏，发出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洪声：

“希望造反派帮助我，今后我们一定要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口号声响起来，会场像动荡的海，燃烧的火。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那个设想中的平衡本来就难实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倾斜颠覆。“平衡”需要力量的平等和对消，但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给“百万雄师”平等，那叫折中或调和主义。“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只是可以“保留名称”，要对其“宽恕”，加以联合。

这种“大联合”便只能像个外壳很薄的甜梦，轻轻一触就碎了……

第三章 毛泽东被迫离武汉

武汉三镇，暑气熏蒸，炎威逼人；有洪水自三峡来，大浪冲天，泥沙俱下；说不得鱼龙混杂，更何况“江汉之鱼鳖龟鼉为天下富”。

四川“产业军”潮起潮落水未尽，湖北“百万雄师”又前赴后继滚滚来。毛泽东运筹帷幄，南游云梦，谈友论敌，会“诸侯”见臣僚，万般呕心沥血，一片苦口婆心，却不料武汉三派都未能在他划定的天地里共练太极拳、八卦掌。真有点像顽劣不羁的孙大圣，一个筋斗就要翻出十万八千里。

可是，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被高音喇叭吵得云里雾端的杨成武刚吃罢早饭，就见谢富治一脸惶戚半身汗湿地跑进来。气也顾不得喘一口，扬起的手臂才举到半空便倦倦地滑落下来：

“成武啊，出、出事了！”

杨成武拿起餐巾擦嘴。到底是戎马一生，见惯尸体鲜血，有一种静气过人。直到谢富治气喘匀了，才丢下餐巾问：“到底怎么回事？大清早就乱哄哄。”

“唉，乱套了。”谢富治懊丧叹气，“昨天晚上送总理回来，

我和王力、刘丰他们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做工作呼吁联合。谁想到过去受压久了，一听肯定了他们的大方向，就又闹起来了。”

杨成武皱眉：“这件事你们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不安地摇头。

“请示过主席没有？”杨成武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射手寻找到目标一样瞄紧谢富治。

“也没有。”谢富治一脸苦相。

“胡闹，你闯祸了！”杨成武吼一嗓，把谢富治吓一跳。他俩都是三星上将，很熟悉。谢富治虽然知道杨成武战功卓著，却从未把他像许世友那样看待，感受多的还是儒雅之风。何曾见过眼睛一瞪，竟也凶神恶煞得怕人；牙床咬出棱角，脸孔颈项红盈盈地胀粗起来：“总理为了大联合，开四天会，熬三宿夜，你们几句话就把它破坏了！我看你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

谢富治抱有希望：“还没那么严重，关键是做工作……”

杨成武鼻子里哼一声，不再听他说，匆匆赶去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

一 “王力是人还是鬼？”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小暑”将尽，“大暑”到了眼皮下。

武汉市凡有“高度”的地方，楼顶、杆顶、树顶，龟蛇二山、桥头码头，无不捆满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

几家欢腾，几家怨愤。到了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拚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篝火里，一个女高音从喇叭里冲天而起，声压群雄：“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播送重要文章……”

余音袅袅，绕云三匝，喇叭里已然换成深厚苍凉的男中音。那哀兵举剑之韵，使江汉大暑，群情汹涌里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

《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欺上压下，横蛮左右；摇笔舞文，指鹿为马；口若悬河，颠倒黑白。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无一例外出现大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停工、大破坏。这是为什么？他大喊“怀疑一切”以乱党；大抓“谭氏”人物以反军；大搞“反夺权”以祸国；大封“保皇派”以挑动群众斗群众；令革命派水深火热，反动派欢呼雀跃，又何其毒也！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当老虎打！

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

命群众，进行彻底的批判斗争！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打倒王力！

陈再道曾后悔没有直接听到这篇广播文章，他独个儿神情郁郁，忧怨满腔地走进了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室，一屁股坐下便再也不想动弹。

该来的都来了。没有招呼，没有寒暄，更没有往日开会前的幽默和粗话。十几个人面面相觑，或心事重重，或疑虑不安；或抑郁，或沮丧，或木然。

足足静有五分钟，不闻一声。

“哼，”钟汉华咳一声，终于沙哑着嗓子打破沉寂：“现在开会。由陈再道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

钟汉华看一眼陈再道，陈再道从桌上拿起那份检查稿，稿纸庶住大半个脸，从纸后漫应一声：“嗯，检讨。”

他开始照本宣科地读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眼睛又花；心绪不宁，怨气郁结，几页纸念得吭吭巴巴；该停的不停，不该顿的又顿住不动；声音没起伏，没婉转，平淡得不如白开水。好歹读完了，会议室又变成哑了一般静。

“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

“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吝啬地吐出两个字。

于是，会议室里声调不一地重复若干次这两个字。

散会了。留在会议记录本上的全部内容也只是这两个字：同意。

王力也是“知天命”的人了，参加革命时间不算短。但是

半生顺利，没经过什么风风雨雨，跌跌撞撞，更不曾体味那荣辱升降苦乐的反复滋味。这种人棱角足，喜张扬，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过几次地狱，再回首，方懂得“哀江南”——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早开，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是一位与王力同姓的老红军，当过小学教员，经历过打 AB 团、延安整风等多次运动，牢也坐过，假枪毙也经过，一生坎坷，左左右右，升升降降，最后当个师副政委；血也冷了，嘴也紧了，听王力上台指手划脚作报告，悄地里在纸上默写这么一首词。

春风得意的王力可不知有人看他的兴亡。满城的喇叭叫，也只淡淡一笑。有道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同谢富治盛气凌人地走进了军区大礼堂。台下早已坐满师以上领导干部，等待“钦差大臣”们谈话定调子。

本来，谢富治、王力商定，给军人讲话还是由谢富治出面，王力就不谈了。会议也是照这个意见安排。

可是，行伍出身的谢富治，打仗可以，讲话哪里比得上秀才王力？王力是在中苏两党大论战中脱颖而出；笔下云雨，口告悬河；他嫌谢富治讲得太不够劲，奋然而出，即席发言，真是“悬河”滔滔不绝。

“在座的都是师以上领导干部，”王力鸟瞰众将星，“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从ABC讲起……”

若非有录音和记录，准有人以为这是编故事。难怪人说，十个秀才九个狂生。

礼堂里众将哗然。或激怒，或惊愕；有人怒目，有人冷笑，有人欲走还休，留下来想多见见识“钦差大臣”。

王力浑然不觉，依旧“悬河”。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起，到《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ABCD，一直讲到一九六七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对王力在水电学院的“口若悬河”作出极其强烈的反应，军区大门外人潮涌动，呐喊如雷，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回答问题，讲明“四点指示”是何意思？何居心？

王力仍然浑无所察，仍然口若悬河。说“百万雄师”的前身“工人联合会”，从开始就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真正的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

要说祸从口中出，王力“悬河”之口祸出得可大发了。大批部队指战员和省直机关干部已经加入“百万雄师”队伍，封锁军区，要抓王力，王力却还是浑然不晓，还是口惹悬河：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河”未尽，嘴起沫。王力擦擦嘴角，在半夜十二点终于

结束了滔滔不绝。

礼堂数小时，门外已沧桑。王力走下讲台时，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几位军区领导只好设法将他从后门送出。直到这时，他才从“河”中探出头：

“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军区，大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势头……

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谢富治已经入睡。这位战友在王力开始“悬河”之际，便离开会场休息去了。剩下王力独个儿坐在房间，四周围人迹寥寥，刚生出一丝孤独感，几位军区领导严肃认真地走了进来。

“王力同志，‘百万雄师’听了你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怒不可遏，气愤万分，全涌到军区大院里去了。军区几位领导正在现场做说服工作，可是群众不答应，强烈要求你和谢富治同志接见他们。”

王力摆手冷笑。心里话：始作俑者！什么说服工作，分明煽动群众向中央示威！

“王力同志，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扩大……”

王力冷笑，鼻子里嗤地一声。不错吧？开始威胁了。乱吧，“隐患诱发出来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谁说的？林副统帅！

可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北航“红旗”的几个小将冲进来，失声失色道：“百万雄师来冲东湖宾馆了！……”

王力站起身，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许确有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的决心？他并没慌，慢条斯理地朝谢富治房间走去

.....

二 “兵变”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文革”史中“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日。

又是杨成武吃罢早饭之际。不过，睡得晚，起得晚，早饭后已是日上三竿。

又是谢富治匆匆赶来。这次不是慌迫，而是神色严峻，走到身边才说：“出事了。‘百万雄师’和部队许多人包围了军区，冲击我们住的二号，把王力抓走了。”

“警卫部队呢？”

“看来，他们是一气儿的。”

“你怎么出来的？”

“早晨陈再道来我这里，他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人也冲进来，要求回答问题。我和陈再道请他们出去谈，在房后一片草坪上。谈判中，我根据他们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回答问题。这时王力出来了，坐我旁边。‘百万雄师’这批人有一二百，已经准备走。可能王力出来的消息传开了，一下子冲来几百军人，动手打人了。我和王力忙往回走，进门时，他们已经追上来。走廊两侧还有通道，是个十字形。在十字口，我猛一拐弯进屋了。王力没经验，没拐弯，被他们一拥，从对面大门拥出去抓走了。韩爱晶和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我就忙跑到你这儿来。”谢富治叙述一遍过程，然后说，“这事还得你出面。你是总长，得你下令。那些战士估计都是独立师的。你去找一下牛师长，请他帮忙救出王力和谭厚兰他们。”

然而，杨成武找牛师长已是不可能。武汉三镇像开锅一样

闹腾起来，几千辆大卡车满载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排成四路纵队，沿街示威游行，是建国以来所不曾有的声势。军区大院完全被包围，人潮滚滚，根本进不去。杨成武见形势紧张，赶紧回来给北京挂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陈再道在哪里？”

“他挨了打，撒手不管了，看样子也管不了，跑我住的房间来睡觉了。”

电话那边稍顿片刻，传来周恩来的指示：“你同汪东兴、谢富治他们研究一下，多研究几种情况和应急措施，要做好他们冲击梅岭和百花一号的准备，要说服。现在的情况，要尽一切努力做好说服工作……我尽快赶到武汉。”

这时，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后，决定由钟汉华回军区做工作，陈再道留东湖宾馆。

“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高帽子、挂牌子、“喷气式”，所有领导干部身上的甲冑都被剥得精光，过去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光环统统扫尽，这些“赤裸裸于天下”的领导干部失去了威严、威信，也失去了权力。即便在台上，也不会一呼百应了；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常常是千呼万唤无一应。

钟汉华身为军区政委，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赶到军区大院，给“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做工作，让他们释放王力，谈来谈去谈不通。放人是毛主席指示，但又不能泄露毛泽东在武汉，更增加了谈判难度。

谢富治迟迟不见放回王力，而陈再道又睡在东湖宾馆不

动，不禁大为恼火，指责陈再道：“你是军区司令员，军区抓走中央代表团的人，你不去救，不去做工作……”

“我有伤”，陈再道也一肚子火，还不是你们自做自受？他说：“我行动困难。”

陈再道确实也挨了战士的打，有的是怪他当了“投降派”，有的是不认识这位司令员。陈再道不怪这些战士，因为他们在支左问题上观点一致。

“这能成为理由？”谢富治声色俱厉，“你马上回军区去做工作，保护王力，叫他们放人！”

陈再道躺到床上不理睬。因为钟汉华已经去了，毛泽东又住在东湖宾馆，人都走了放不下心。但他偏不说出来，他对谢富治有气。心里话，若不是看在你是这支部队的老首长，现在又是副总理的面子，你也得落个王力那种下场。

拖延至中午，传来消息，钟汉华等领导已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二十九师师部六号楼。可是，再联系把王力送回东湖宾馆时，却传来“王力失踪”的消息，并且都说“不知弄到哪儿去，也不知谁弄走的。”

那样的紧张混乱中，任何消息和动向都会引起各种猜测，并且不能不从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结果去考虑对策。”

武汉的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人是这样，北京的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是这样。

这时的林彪正在北京人大会堂的浙江厅里踱步。夏季他在京时常住这里；屋顶高，空间大，这里凉快。他思考问题有踱步的习惯。当想出一些眉目时，会停住脚，一手叉腰，另一只手的手指从谢顶的头皮上轻缓划过，深吸一口气，接着便开始行动：“我要写封信。”

他历来话不多，吩咐一声，秘书便将纸笔准备好，铺在桌

案上。

“主席”，林彪写下两个字，握笔沉吟。他过去就讲过不放心武汉军区，其实他是不放心四方面军的人。长征时张国焘闹分裂，留下一些矛盾；延安时，解决四方面军的干部思想问题，又留下不少矛盾。他林彪当接班人，有好多人是不服气的，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人多，力量大。武汉的陈再道当然不是孤立的，这里有鬼……

心里有鬼的人往往见鬼多，林彪常疑心身边到处有鬼，为此也伤过一些尊重他的人。

“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林彪写下了关系判断性质的最重要的话。这一条只要成立，他后面的建议便是顺理成章：“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

这封信林彪颇费踌躇。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以及更早的陈光等人都好办，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不好办，他必须避嫌。对四方面军的人，毛泽东先下决心，他好办；他先讲话容易引起毛泽东疑心。会疑心他排除异己，搞“清一色”。

毛泽东警惕“清一色”，不允许“清一色”。

林彪深知毛泽东的“将将”之道。有这样一件事：杨成武随毛泽东南巡后，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讲：“杨走后，军事要有人处理，成立一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任组长，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办事组……”办事组第一次开会，吴法宪便忘乎所以地笑道：“关起门说话，都是四野的，这回可以说说啥就说啥了。”林彪听说后，大骂吴法宪三个字：“你找死！”

“都是四野的”，这句话在毛泽东那里犯忌，在林彪这里便

也犯忌了。

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战将，根据各方汇报来看，已影响到南京许世友，许世友更是四方面军一员虎将，而且还牵涉到徐海东大将。他是许世友的老上级，曾经独挡一面，威风八面，率红十五军团独立完成长征，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他多次负重伤，脑袋上中一枪，从眼眶下打进去，打穿一个洞仍然活了下来，只是身体垮了，长期养病。可他现在也活跃起来。他不服林彪。再往上，自然就是徐向前……

既要影响毛泽东，不露声色地解决这些人，又要不使毛泽东起疑心，有所警惕。林彪思前想后，叫来戚本禹。

“这封信你帮助改改。”林彪含蓄道：“看怎么提妥当，怎么送给主席妥当？”

戚本禹一看信，立刻明白分量有多重，不敢擅自作主，找陈伯达和关锋这一大一小两个秀才商量，一道修改。陈再道还未包围梅岭一号，他若已经搞兵变，傻瓜也知道应该首先包围解决梅岭一号。这一条毛泽东也会想到。那么……对，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

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

改了又改，再请江青把关，终于定稿。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

江青去见林彪，将信的修改内容和改变署名的意见一说，林彪立刻点头：“好，这样好。”

两人简单一商量，决定由邱会作飞武汉送信，由张春桥飞上海，准备迎接毛泽东。”

江青举信在邱会作眼前晃晃：“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

在！”

谁都明白这封信关乎全局。江青想的是，信若落在陈再道手里，他不反也可能被逼反。当过演员又看书很多的江青，在电影在书里都没少见这种“逼反”的故事。

邱会作郑重地接过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庄严得近乎宣誓：“首长放心。我在，信就在，一定送到主席手里。”

两点十分，邱会作飞到武汉。

四点二十分，张春桥飞到上海。

三点五十四分，周恩来的专机从北京腾空，向南飞去……

下午三点左右，秘书向杨成武报告：“首长，邱会作从北京来了，要见你。”

“叫他来。”杨成武边说边朝客厅走。

邱会作一身戎装，进门立正敬礼，然后握手：“杨总长，这里情况怎么样？一〇一和江青同志都很担心。”

“一〇一”是林彪代号。正像工作人员谈到杨成武都说：“九号首长”，“九号”是杨成武。

“外面很乱，这里还可以。他们还没有冲梅岭和我这里。”杨成武简单介绍几句情况。

邱会作见屋里再没第二人，便从贴身衬衫内掏出一封信，把头凑近杨成武，郑重地：“交主席。首长亲自交办的。”

杨成武接过信，信封上写“毛泽东亲启”。

那时，邱会作尚未提上来，毛泽东脑子里还没有这个人，所以没法直接联系求见。邱会作只好通过杨成武传递。

杨成武赶到梅岭一号，亲手把信交给毛泽东：

“主席，邱会作从北京带来一封信。”

“邱会作？”毛泽东接过信。

“他是总后勤部部长。”

毛泽东拆开信，这封信只有两页，杨成武认出是江青的笔迹。当毛泽东翻页时，杨成武看到了江青的署名。

毛泽东望着信凝神有顷，缓缓抬起眼帘，把信放在茶几上，朝杨成武推去，笑着说一句：“劝我去上海。”

杨成武没有去拿信，只朝信注目几行，然后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毛泽东把手一拂：“我哪里也不去。”

“这里很乱，还是要考虑安全……”

“没事，我不走。”

杨成武不便多劝。反正总理马上要到，等总理来了再说吧。

周恩来比预定时间迟到了。

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改降山坡机场。”

同时间，吴法宪又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〇一报告一下。”

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武汉军区有鬼！林副主席已经派邱会作处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要绝对保证总理安全，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中国当时唯一一支空降部队恰恰驻湖北武汉，这个军是支精锐部队，出过许多黄继光这样的战斗英雄。部队接到命令，

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警惕武汉方向，随时准备粉碎陈再道的“劫持阴谋”。

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参加“平暴”。

周恩来的专机就在这剑拔弩张的一派紧张气氛中，降落在山坡机场。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两个中队的警卫部聚精会神，队员全是经过严格训练，骁勇善战的连排级干部。

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的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周恩来就问：“这里到武汉多远？”

“六十多公里。”

“附近有情况吗？”

“暂时没发现异常。”

周恩来当即决定，留下负责警卫的两个中队，只让两名贴身卫士随行，驱车直奔武汉。到达百花一号，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听过汇报后，再研究事态可能的发展。

“你们说，最恶劣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周恩来出题目。

三个人互相望望，这个题目不好做。

汪东兴说：“总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

杨成武思索着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击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问题……”

谢富治说：“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走王力，都是部队里人干的。”

“我们一起去见主席，”周恩来迅速作出决断：“为安全，

还是要劝主席离开武汉……”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还有段距离，何况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四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主席。

“主席啊，”一见面周恩来说，“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谈到武汉市里的混乱，谈到“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游行及情绪，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服毛泽东。拖到晚八点，杨成武说一句带兵打仗的话：“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无语。他忽然记起那部“大书”上的话：“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

周恩来见毛泽东不再说反对话，便及时上前：“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忙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毛泽东定下决心。

众人松口气，忙做走的准备。这已是晚八点多。

周恩来单独握住杨成武的手，小声交待：“我还要留在武汉做工作，你护送主席去上海。我要说话的是，主席一向是器重你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点了你的将，相信你。你也没叫主席失望。这次又是主席点将，叫你陪他南巡，希望你发扬传

统，不要叫主席失望，不要叫我失望。”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像当年长征率先锋团领受斩关夺隘的任务一样，立正敬礼：“我会完成任务的。”

细心入微的周恩来又具体交待：“你还要作先锋，走最前边。如果有人堵车，你就说：不许堵，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如果他们不听，你第二步可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我这里，你们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了。这时如果有坏人敢动，你就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消灭危险，保护主席到上海。”

“明白。”杨成武周身热血滚动。责任和荣誉使人年轻，他仿佛又回到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当年……

当年，红军过草地。先派一支部队试探，没过去。还受到国民党和藏族上层武装骑兵的伏击，造成损失。

毛泽东说：“还得叫杨成武来，他可以！”

公元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高原草地，秋意已浓。

十几匹烈马旋风一般卷过波状起伏的高原草地，马蹄荡起的尘烟后面，藏族牧民发出赞叹的叫声。几十里路转眼抛在身后，杨成武和他率领的骑兵侦察排驰入党中央所在地毛儿盖。他甩镫下马，直趋毛泽东住处。

保卫局局长邓发热情迎上来握手，引他踩着小木梯登上毛泽东、周恩来居住的藏式木架小楼。

毛泽东正在俯看地图，闻声转身，紧锁的眉头一扬，眼里像亮过一道电闪，脸上立刻出现粲然的笑容：“你来了，很好！”他指指身边的木头墩子，“就等你来挂印呢！坐。”

“主席，林军团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

杨成武英气勃发。毛泽东一脸喜悦，指着木头墩子说：“坐下来，慢慢说。”他叫杨成武坐好，然后说：“对，这一次

你们红四团还是先锋团！”

“是！”杨成武忽地站起身，好像立刻就要冲锋陷阵。

“坐下，坐下。”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地图，“我们派部队试了一次，没成功。这次你来，必须从茫茫草地上闯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保证完成任务！”杨成武再次腾身而起，仿佛全身涌溢着无法按捺的青春热力，眼里漾着只有长胜军人才特有的锐气。

毛泽东凝视那张二十岁的英武面孔，极有力度地点两下头，指向地图说：

“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几个师，大筑碉堡；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会断送革命。”

毛泽东的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推：“敌人以为我们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他以为不敢走的险路！”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第一次过草地没成功的原因，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杨成武这一次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邓发端来一个土盘子，盘子里放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当时粮食奇缺，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有数的一点粮食省下些留作过草地之用。杨成武心里泛浪，这六个青稞面馒头包含着多少情谊和希望啊！

他只吃了两个，坚决不肯再吃。给毛泽东留下一句话：“主席，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杨成武率领先锋团终于在茫茫草原上踏出一条生路，一条胜利之路。打垮了国民党和藏族上层武装骑兵，在身后留下无数路标。箭头所指，引导三军将士走出草地，走向抗日战场……

当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胜利在望，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接到斯大林邀请，准备经东北去苏联。这一路，将经过许多国民党重兵把守盘踞的地区，少不得涉艰险，履危难，打恶仗。

毛泽东点将：“杨成武，还是叫杨成武来。”

公元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杨成武由蔚县出发，经两天汽车颠簸，风尘仆仆赶到晋冀交界的城南庄，晋见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休息，半坐半躺伸出手：“成武，你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杨成武在毛泽东面前坐下。

“你打大同、打集宁、打清风后又打石家庄，你好威风啊！”毛泽东最后一句学了京剧的腔调，引来一阵轻松欢笑。“部队现在么样啊？”

杨成武汇报了出击平绥线和察南战役情况，也介绍了部队情况。

“好。”毛泽东从床头小桌上抓烟，吸燃后，不慌不忙说，“这次又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选一个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你亲自率领，准备护送我到东北去。怎么样？”

“主席去哪儿，我就护送到哪儿，保证完成任务！”

“哈，你要护送我武装大游行啊？”

一句幽默话又引来满堂轰笑声。

杨成武做了充分准备。后来因为解放战争发展迅速，毛泽

东离不开而未去苏联。不过，他对杨成武的信任和器重却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建国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终于出访苏联。他想到的还是杨成武，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出关；归国时，又是杨成武迎到山海关，同车护送毛泽东回到北京。

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五次战役后，双方转入战略对峙阶段。美国一边表示准备停战谈判，一面又集结重兵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严峻起来。鼓德怀准备组织三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七月底。但敌人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也将难守……

关键时刻，毛泽东召见杨成武：“你去！在此之前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

公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杨成武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走进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

“主席！”杨成武立正敬礼。

“坐下吧，请坐。”随着年龄和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和杨成武的见面话也有微妙的变化。“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准备，这很好。”

“指成员的士气很高。”杨成武虽然锐气依旧，但性格中已经增添了深沉稳健，坐在那里汇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好！”毛泽东介绍一遍战场局势，而后指着地图：“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奋然起身：“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么。”毛泽东起身作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院子里的凉棚下，一方桌、四碟菜，一瓶通化红葡萄酒，四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和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忙跟着站起来。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

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就又举起杯：“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 38 度线和 38.5 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像立军令状似地与毛泽东碰响杯，一大杯葡萄酒一饮而尽。

毛泽东仍然不坐不吃菜，又第三次举起杯，另一只手也举到胸侧，摇甩着手指说：“第三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三大杯酒喝完，那只酒瓶早已空了。

毛泽东的卫士曾回忆说：“主席第一次用这么大杯，一口菜不吃连干三杯酒。”

杨成武曾回忆说：“毛主席敬我三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两年，创下三项纪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星转斗移，岁月悠悠。

五十三岁的总参谋长杨成武又一次为毛泽东当开路先锋，护送毛泽东离开武汉飞上海。当年他驰骋沙场时无论如何不曾想到，有朝一日他护送毛泽东，是因为群众组织和解放军部分指战员包围军区、武装游行，冲击他所下榻的东湖宾馆。

当然，杨成武更不会想到，八个月后他将重回武汉，但那时他已沦为“阶下囚”。不过，这将是后话。

凌晨3点。夜缥缈，人朦胧，车队出发了。

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普车驱车走在最前，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度戒备的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车开得迅如疾风，警卫车几乎跟不上。幸亏夜深，街上已无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意外情况，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

机场并不象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静悄悄地停在机场旁。

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

“主席，你先休息一下，喝点水。”杨成武：“我上指挥塔去给总理打个电话。”

“你去吧。”毛泽东已经开始找烟吸。

“总理，我已安全到达机场。”为保密，杨成武没有提毛泽东。

“什么时候走？”

“首长没发话。”

“天上地下水上，确定没有？”

“我再请示一次。”

“确定后报告。”

“是。”

杨成武走下指挥塔，匆匆返回专列。毛泽东又在看那两页信，思考着什么。

“主席，总理让确定一下怎么走，什么时候走？”

“咱们就飞上海，你现在联系去吧。”

“我先准备一下，看哪个飞机合适？”杨成武说着，赶往停机坪。

停机坪上依次停不少飞机，有6架伊尔18，有几架伊尔14和子爵号，还有2架直升机。

杨成武叫人找来大队长，问：“我要用一架飞机，哪架飞机保险？”

大队长说：“这些飞机都可以飞。”

“飞行员怎么样？”

“都有一定经验。”大队长的回答都比较大而化之。

“你介绍具体些，比较起来哪架飞机更保险？”

大队长望着杨成武，眨眨眼，不明白这位总参谋长今天为什么这样“婆婆妈妈”？

他向杨成武详细介绍了每架飞机的详细情况，及飞行员的技术思想状况。

杨成武指着最后一架飞机：“我就坐这架飞机。”

“这架你不能用。”大队长居然笑着朝他的总参谋长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这架状况最好，是谢副总理用的。别的任何人不能用。”

“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火了，“我总参谋长用不了你一架飞机？”

杨成武恼火和惊讶是有原因的。

过去，派飞机有一套制度。可以说，不经总参谋长，任何人都无法擅自调动、使用飞机。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要行动，应该报总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用飞机，也必须报总理。如果总理自己用飞机，必须报毛主席。具体动一架飞机，有套必走的程序：首先是总参作战部接有关部门通知，马上报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批准后，再由总参作战部通告空军作战部，空军作战部报告空军司令员、政委，须空军司令员和政委联合签署命令，然后才可调用飞机。

如果是老帅们坐飞机，也必须经军委秘书长和办公厅批准，而后按程序由空军司令员、政委下达命令，调派飞机。后来杨成武听说林彪在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出逃，曾感慨：如果过去的一整套制度不遭破坏，林彪怎么能调动飞机，又怎么能飞跑啊……

制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破坏的。这位飞行大队长竟说：“这架飞机没有谢副总理的批准，谁也不能坐。”

飞机居然成了公安部长谢富治调动！

“再说一遍，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正要发作，远远看到毛泽东朝停机坪走过来。他急了，顾不及再讲“制度”、“程序”，咬着牙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低沉压抑的微吼：“这个飞机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要坐！”

大队长象被电棍捅了一下，神经质地一激凌，身体挺直了。顺杨成武的目光瞟一眼，脸立刻煞白，汗也淌下来。

“杨总长，我不了解，我不了解。”大队长解释时，身体象弹性十足的簧板那样一弯一弯，“我刚才讲的话是我不了解，我有错，我错了……”

杨成武手指飞机：“不要废话。毛主席就坐这架飞机！”

“是！”大队长全身挺直，立正。尔后报告：“杨总长，为

了保险，我们两个大队长飞这架飞机，为伟大领袖保驾护航！”

杨成武移动胳膊，手指横扫一大片：“这些飞机都要用，你们安排其他人坐。”

“是！总长。”

毛泽东这时已经走过来。杨成武迎上几步：“主席，我们就坐这架飞机，性能好，由两名大队长任正副驾驶员。”

“噢，那就上这架。”毛泽东站到飞机旁，等候安排。此类问题上，他听工作人员的。怎么说怎么做。

飞机没有那种民航使用的大梯子，只有飞行员上下飞机的小梯子，这种梯子要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在机场地勤人员指引下，一名卫士先爬上去看看，然后请毛泽东登机。

毛泽东笑了。入乡随俗，随着另一名卫士，也手脚并用地爬上飞机。

杨成武坚随毛泽东爬上飞机，安排毛泽东坐好。

“这飞机是哪里产的？”毛泽东回顾着张望。

“苏联。”杨成武回答。

“什么名字？”毛泽东掏出一支烟，并不马上吸，拿在手里捏来捏去。他也有这种习惯：把烟丝捏捏松，吸着省力，还可借捏烟的时间，起到控制吸烟量的作用。

“伊尔 18。”杨成武继续回答。

“多少钱一架？”

“不知道。反正好贵。”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制造出这种飞机？”

“我们正在研究，但还没搞出来。先仿制他的，但也不那么容易，材料不过关也不行。”

“噢，是个综合能力问题。”毛泽东点点头，吸燃了香烟。他下意识地朝机窗望一眼，忽然若有所失地皱起眉头，喃喃一

声：“想到长江里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主席，你先坐着休息，我去安排一下。”杨成武爬下飞机，对随行人员分派飞机。

第一架是警卫人员乘坐的飞机。

第二架飞机是毛泽东、杨成武、汪东兴、张秘书及两名警卫参谋王永良和肖良臣。

第三架飞机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第四架飞机是警卫部队……

不久，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响成一片，十多架飞机陆续滑上跑道，升上夜空，浩浩荡荡飞向上海……

21日上午11时。

机身轻轻一震，可以感觉到轮子在跑道上的颠簸和摩擦。杨成武的一颗心也随之落地。

总算把毛泽东安全护送到上海。

杨成武从机舱门探头望时，偌大一个虹桥机场，空荡荡不见群众和往时排列的官员。航梯旁只站立一个人，是张春桥。

他肃静恭立，独个儿神情冷冷，四周围人迹渺渺。

杨成武爬下舷梯，同张春桥握握手，没什么话说，仰面照顾毛泽东爬下飞机。

毛泽东同张春桥握手，也没话说，一行人奔车队走去。

无声无息，毛泽东住进虹桥宾馆。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毛泽东住楼下，有卧室、起居室和客厅。杨成武住楼下另一套房，那是以往江青住的地方，与毛泽东的住房走廊相通。

“成武啊，”毛泽东坐下来喝茶，定定神，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我们安全到达。”

杨成武挂电话时，毛泽东一直喝茶、吸烟、想心事。

杨成武的电话刚打完，毛泽东扬起手臂：“你再打一个电话，让总理早回北京。武汉的问题一天二天解决不了。我还要看看，想想。叫总理注意安全。”

杨成武第二次往武汉挂电话，毛泽东继续喝茶、吸烟、想事情。

电话打完，毛泽东再次扬起手，指着杨成武：“成武啊，你去，安排人飞回武汉，看看武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群众舆论、社会情况、部队情况、各方面情况……”

杨成武忙去布置。指派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作战部副部长李静飞返武汉，并要求：“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的毛泽东毫无困意。

喝浓茶、吸香烟、想问题。

他不时拿出那两页信纸看看。

武汉这场乱，到底是什么性质？兵变？那就谁也无法出进武汉了。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趁他尚未下定决心”一行字上。顺顺利利出来了，可见陈再道没下死命令。都说徐海东活跃，但出来了，就说明徐也没下死命令……

武汉问题当然要处理。不处理就没“王法”了。各路“诸侯”如果都效法之，哪怕是一个“诸侯”效法，后果亦足堪忧！

1958年，毛泽东曾用他那高亢的声音对省委书记们讲：“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不久他又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现在看来，没“天”不行，一点不讲法也不行。

陈再道就没“天”。

毛泽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二年前的夏天，毛泽东在广州，正准备游泳，陈再道、许世友、王建安三位将军来了，希望见见毛主席。毛泽东对那些工农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战将们历来宽厚优待。何况又是四方面军出来的上将军，他马上在游泳池边的布蓬下接待了他们。

天大热，3员战将个个汗水淋淋，倾听毛泽东谈天说地。忽然，陈再道望望那池碧水，招呼也没打一个，将那身军衣一脱，扑通一声响，穿着大裤衩子就跳进了游泳池，不时从水中探出头痛快地喷水气。

毛泽东愣住了，不再侃天下，望着陈再道泳水。

许世友和王建安也愣住了。他们这位老弟居然在毛泽东面前如此失礼，没有臣子样儿。特别是许世友，他远比陈再道粗犷鲁莽剽悍，但他又绝对忠孝，心里永远有个“天”，永远对“天”膜拜。他简直想冲那个没“天”没“地”的陈再道吼一嗓，再骂句“娘卖×的！”

可是，毛泽东却反而喜欢这种没心术没头脑的朴拙憨厚。他历来认为“上智”、“下愚”可以“与共谋”，团结成就一番大事业；唯独“中才之士”难与为伍，这些人夸夸其谈，各有己见，互不诚服而相轻。胜则争功自傲，败则推诿抱怨，实在难成大事。

“哈哈，”毛泽东笑着立起身：“你们游不游？我可也要下水了。”

这一天，毛泽东游得高兴，泳后还留这3位厚重少文的将军一道吃晚饭。

然而，三年后再看这件事，粗犷莽撞、没头没脑也会败大事，心里没“天”尤其了不得。所以，对陈再道必须严厉处理，给那些骄兵悍将作个例子，懂得“天”，懂得规矩。

可是，处理还必须有个“度”，把握不准“度”就会乱大局，出大事。要把握准这个“度”，首先必须准确定性。性质不定就无法确定这个“度”。

毛泽东再次招来杨成武。

“成武啊，困不着！不睡了，散步去。”毛泽东叫着杨成武，踩过厚厚地毯铺垫的长廊，踱出楼外。

繁星围拱着一轮弯月，静谧无言地俯瞰大地；海风送来新鲜和凉爽，清洗去夜的倦怠。

“王力有消息了吗？”毛泽东思索着问。

“有消息了。下午接到电话，他是被29师的师政委张昭剑悄悄保护起来了。张昭剑说，他现在听空军的。”

“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

“很多。”

“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卡车、骑摩托，端刺刀……”毛泽东望住杨成武：“他们那个师长你熟悉？”

“牛怀龙，过去在北京卫戍区工作过。不过，全副武装、端刺刀还不清楚。”

“以后听汇报，你，春桥、东兴要一起听。”毛泽东表情朦胧，但杨成武明白，一定是刘丰、吴法宪又向张春桥汇报了什么。

毛泽东停住步，认真望住杨成武：“你看出了吧？那天我见他们两个，钟汉华就坐不住，要走……”

“没看出来。”杨成武老实回答。

“为啥坐不住？”毛泽东自语着继续向前走去，这一刻他大概又想起了那本“大书”。

“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遂械系信以归。”

很可能，钟汉华是怕当韩信，被“禽之”，被“械系”以归……钟汉华是政委，当然看书多，懂政治。

“接触观察看法，”毛泽东思想连贯，但说话跳跃，有时省略许多内容，不知内情的人会以为前言不搭后语，“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作个手势，朝楼里返回，一边交待：“和北京武汉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

灯光下，陈再道与钟汉华面面相觑。毛泽东困不了觉，他们更困不了。面对武汉的混乱局面，他们一筹莫展。

“明天总理召集开会，也许能想办法稳住局势？”

“唉，”陈再道长叹，“听天由命吧……”

要说陈再道“头脑简单”，甚至“蠢”，也许有道理。但要说“反动”，他可想也不敢想，甚至也不会想。

多少年后，陈再道也曾回忆了那个“七·二〇事件”及自己当时的想法：

7月20日来临了……

清晨，我顾不上洗一洗一身由于闷热、烦躁溢出的汗水，走出了东湖宾馆二所，想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

我到谢富治房间里刚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二百多名代表就愤愤地冲了进来。他们挤在谢富治房间的门口，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我和谢富治一见这情景，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迎到了房间门口，劝他们到外面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为什么劝他们到外面？这是一条应急的“缓兵之

计”。

因为王力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损伤了这位“钦差大臣”，那我们岂不是更“罪上加罪”吗？

……

我们谈判的结果很好，当时我是非常满意的。谢富治根据他们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他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得到谢富治的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

这时候，躲在房间里的王力，同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他大概听清了谈话的内容，才壮着胆子走出房门，同我和谢富治坐到了一起。

谁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又旋风般地冲进来几百个人。这些人，多数都是部队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要求接见等急了，便怒气冲冲地冲进来。他们一下子拥到我们面前，大声呼喊着要让王力接见。那样子，真是咄咄逼人，不容分说。

我和谢富治都缄口不语。

这些愣头愣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再也控制不住理智的约束，感情支配了鲁莽的行动，只见他们呼地一下扑过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

那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

就在我挨打的时候，王力趁机溜进了他的房间。

这时，保卫人员喊道：“不要打了！有话说，有理讲……”那些挥动拳脚的战士，被这厉声制止住了，立刻把拳脚、枪托停了下来。

在我头晕目眩时，他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的王力，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当时，我被打得浑身疼痛，已无力阻拦他们后面的行动，勉强把身子支撑起来，叫他们不要抓走王力。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已成了“投降派”，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

最后，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去了……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合上就没那么简单。陈再道的观点和感情在“百万雄师”一边，但要他操纵“百万雄师”却不可能，武汉的局势决非他所能控制了。乱起来的导火线是谢富治、王力的讲话，支一派，压一派。但这不是根源。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毛泽东这句话是对的。然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把群众组织分成“革命派”和“保皇派”，那就错误了。

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和斗争。是根源。

何况，这一划分，将决定“头头”们的权力再分配，也将决定普通群众回到本单位日子好过不好过……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大跃进”。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没讲“始作俑者”，讲“亲自发动”。然而对“群众斗群众”，他始终认为是“走资派”在挑动。他所受大文化的局限，使他再伟大也无法看到自己的悲剧。至少在武汉这场动乱中，他疑惑、愤慨、恼火，目光始终是盯着武汉军区，盯着陈再道和钟汉华。

1967年7月22日1时30分，他与杨成武散步后几小时，终于向汪东兴发出指示。

那记录上有3条。

1. 接触观察看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
2. 我离开以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
3. 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的打仗的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

第一条无须多言。

第二条，北京采取的措施是由林彪主持制定，分两步。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他们敢来不敢来。不敢来就证明有问题，是兵变。二步：起草处理武汉的中央文件；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第三条，象朝鲜一样，军队不能不打仗。除了战场上打，那是少数，更多的是打思想仗。

星光熹微，斗牛苍淡。伴着7月22日破晓的青光，决定陈再道、钟汉华及其麾下一大批指战员命运的时刻开始了……

三 淡化事件

1967年7月22日，8时20分。

身体越疲劳，神经越兴奋，此刻的杨成武。

电话铃响第二声时，他已奔出5步，拿起话筒。

是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

“我们都到了。”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全能明白。“我们”是指北京来的人，自然包括王力。

王力受到29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上。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受周恩来之命寻找王力，张昭剑推说不知。7月3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实情，将王力送到武汉空军驻地，半夜又转移至山坡机场，22日晨与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见面。

“正同林总商量。”周恩来继续讲，讲得慢，便于杨成武记录，“天气许可要你回去一趟，夜航。商量部署，请示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动身先打个招呼。”

夜航北京，可以在飞机上睡个把小时了。杨成武才动这么个欲望，便不由得打个哈欠。

“对外的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

杨成武知道这句是说“七·二〇事件”。从电话来看，那边形势不紧，总理讲话谨慎含蓄，也许怕窃听。

9点40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告诉杨成武：“主席起来了，你可以去了。”

吴旭君是上海解放时参加革命，来到毛泽东身边任保健护士；个子不高，生得玲珑秀丽。后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结婚。她不但负责毛泽东医护保健，也兼管抄录整理毛泽东的诗。

词新作。在上海，她也兼点秘书角色，杨成武送材料传事情都是经她之手之口。

象往常一样，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吸烟，等候杨成武。他的眼球里隐约可见缕缕血丝，显然又没睡好觉。他没有同杨成武打招呼，一天见几面，似乎可以免了，只庸懒地朝茶几对面的沙发示意一下。

杨成武落座，身子前倾：“主席，总理来过电话，王力已经到了王家墩机场……”

也许是过度疲劳？也许是听说王力没事，只受了些轻伤，因而情绪变缓和？毛泽东听完报告，沉默片刻才讲话；声音一改高亢清亮，显得低沉缓慢：

“武汉问题，还是宜快？还是宜慢？”他象是在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直到那支香烟吸完了，才说：“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不好，错了。就是快也总要准备一下，动员。”

杨成武在纸上记录、因为林彪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

“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毛泽东一句一顿，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毛泽东望住杨成武：“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

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看处理武汉问题有无徐向前和叶剑英参加决策。

“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军区状态——江西、湖南、河南。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最好。”

杨成武说：“武汉还在游行，还得做大量思想工作。”

毛泽东点头：“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他没有肯定这个方式，仅仅提

一个可能性，马上转向目的：“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他分化，不然他就会调动农民。”

“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了电报。”

“海军暂时不动。”毛泽东断然说，“派兵问题要谨慎。”

“主要还是做政治思想工作。”杨成武说。

“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讲过，各军区的会议隔一两个月就开一次。八月上旬或中旬，江西、浙江、河南、湖南解决差不多了，开一次会。”

杨成武补充：“还有广西、甘肃、山西。”

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作为“错误”处理，而不是“兵变”，这是毛泽东思考一夜的主要成果，与王力回来了也不无关系。

杨成武问：“我今夜飞北京，主席看时间怎么安排？”

“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

杨成武松口气，直一直腰。关于武汉问题心里已经有了大数，他开始请示汇报北京的事情。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九月九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为什么要改为九月九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毛泽东面露愠色，声音一下子提高上来：“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一月一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哪个前哪个后”

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其他起义，包括你们闽西地区的起义，都是地区性的。”

杨成武感到事情重大，紧张记录。并且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过目后，加一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正式传达时，周恩来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后面加一句“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毛泽东看到后，把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删去，说：“那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所以，正式上文件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句，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句。

记录完毕，杨成武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师要不要请来出席？”

“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师都要到，不许请假。”

杨成武犹豫道：“现在有人骂我们朱总司令。”

“怎么骂？”

“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

“混！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一脸厉色：“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骂朱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吗？谁讲的？”

杨成武张张嘴，没说出名。因为是中央文革几个人都讲过的，他不敢回答。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

“长征时，张国焘我们天天谈。张要南下，搞分裂，叶剑英把张国焘一个电报单人独马送给我和恩来看了。我当时拿个纸烟盒，一边把主要内容抄了一下，一边问叶剑英：‘你怎么出来的？陈昌浩呢？’他说：‘陈正在开会讲话。’我一边抄一

边催他：“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毛泽东用手掌拍拍颈项，朝杨成武睁大了眼睛感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差点掉脑壳！”

杨成武也不胜感慨，频频点头。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用他那湖南腔，抑扬顿挫评价道，“叶剑英！”

杨成武又点点头，急忙记下来。

“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当参谋长，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个电报，邀叶挺、贺龙到庐山，想在庐山把叶挺、贺龙扣留起来。这个事，又是叶剑英立功。他是参谋长，知道此事危害性，就邀叶挺、贺龙到周瑜练兵的烟波湖划船，把消息告诉了叶、贺：一定不能上庐山。叶、贺没上庐山，搞了南昌起义……”

杨成武回京后曾问叶剑英这两件事，叶剑英说有这个事。并感慨道：“成武啊，我要是升官发财，我就不参加共产党了。我是参谋长、师长，我把一个师的薪水放银行一个月就发大财了，不用贪污就可以发大财。我那个时候入党是革命低潮入党，我这一生也很难哪……”

讲过叶剑英两件功劳，毛泽东又带了忆念的神情回顾一段私情：“宁都会议，我下台，没到前线去。叶剑英陪我参加宁都会议，挨批后，又陪我回来，到大柏地。两个人还对了一首诗呢，我写了一首，他对了一首……”

毛泽东脸上浮起一层缥缈的梦幻般的遐想，好象有什么美妙的东西令他神往。静了久久，才吮一吮下唇，冲杨成武笑笑，点点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

杨成武也再次跟着点点头。

“你参加红四军的九次代表大会没有？”毛泽东在回想中忽然问一句。

“没有。”杨成武摇头，“我那时还是个娃娃哩。”

“你怎么知道古田会议的？”

“政治委员传达的。”

“你们那个闽西啊，特别好！”毛泽东仍然沉浸在美妙的忆想中。

“为什么？”

“老百姓特别好。我下台后，在你们闽西活动，非常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老百姓每天早晨在我起来时，给我送一颗刚下的鸡蛋，说请毛委员吃鸡蛋。闽西也有两个缺点，跳蚤多、臭虫多……还长脚气！”

“哎呀，主席，”杨成武笑了，“你是先生，是穿袜子的，所以长脚气。我们闽西老百姓打赤脚，没袜子也不穿鞋，回来晚上冲凉，踩木拖拉板就回房睡觉了，打赤脚肯定不长脚气。”

“噢，你说的对，有道理。我就没分析这个问题。”毛泽东连连点头，说：“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下来，这次会议毛泽东没参加，主要是朱德、陈毅搞的；八次代表大会，毛又下来了。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毛又选上了。”

毛泽东不自称“我”，直呼“毛泽东”，表示谈历史的郑重。杨成武忙又记录。

“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毛泽东首先用肯定的语气讲，而后接着说：“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毛下台。会后陈毅到中央汇报，他如实向中央报告了七大情况。八大陈毅没参加，九大陈毅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九大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所以陈毅同志是位好同志。”

杨成武记录之后，说：“北京我们的老师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毛泽东惊讶地睁大眼。

“人家要打倒这个老师，打倒那个老师……现在有主席的

评价，他们就可以放心了。”

“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毛泽东掰着手指：“朱老总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但不敢点明，也不便再多问。他问了贺龙：“主席认为贺龙呢？”

“贺龙我过去讲了一些话，多次讲了，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么，‘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你回去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将大手一划：“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致词由杨成武致词。”

杨成武吃了一惊，忙说：“不行不行。主席，我怎么能祝酒词呢，应该是老帅。”

“哪个老帅？”毛泽东稍侧了头问。

“叶剑英。又是元帅，又是军委副主席……”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看一眼腕上的表，2个小时过去了，已是11点40分，便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补充？”

毛泽东略一沉吟，轻轻一挥手：“去把他们几个叫来……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杨成武一怔，随即默默而郑重地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杨成武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一道回到客厅。

几个人简单汇报情况。武汉军民仍然“百万大游行”，带武器，口号激烈。周恩来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争取稳定局势……

毛泽东这一生，容不得挑战，有挑战就一定奋然迎战。他的脸色沉下来，冷冷说：

“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已经暴动了。要谈去北京谈。”毛泽东记住林彪的话，看陈、钟敢不敢到北京。同时，他也考虑谈不成会激化矛盾，后果堪忧：“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还是早点离开好。现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头头未最后下决心以前，早点离开。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做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

“能不能谈谈试试？”有人建议。

“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让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除了北京，就近另找个地方谈呢？”

“另一办法，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略一沉吟，又摇摇头：“不必了，还是离开。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

“北京决定开百万人欢迎大会。”

“你们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成武、汪东兴不在，人们马上会猜到毛泽东不在家。”毛泽东指汪东兴：“你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见报时，要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出席。”

毛泽东的大脑，一刻也无法停止运动。“吃3次安眠药困不着。”

他对武汉的态度，对陈再道的态度，几天里变了又变。如果只是一个陈再道，打倒就行，犯不着费这么多心，问题是 he 要看全军，看四方面军和各山头出来的将军们，要看……林彪！于是，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就难下决心了。下午1点半，下午5点，又连续找杨成武、汪东兴，以及余立金、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谈话。

“要把城市的独立师进行调整！”毛泽东说出了他的最新考虑结果。

“成武，一个部队驻一地太久不好。你们北京军区那个66军驻天津太久，越久越不好，有了瓜葛。武汉就是例子，独立师和群众组织拉在一起，和地方许多人拉在一起。还有好多独立师，各城市都有，每地都有。”毛泽东停下来想想，放慢声音：“3年一换，4年一换比较好。否则住久了，千丝万缕，关系太复杂，东西太多。不是毛驴能拖走的，汽车、火车也拖不动了，坛坛罐罐怎么打仗？要调换。”他用征询的目光望住杨成武：“杭州就可以开始吧？”

“部队就要令行禁止。”杨成武道。

“那就先从杭州开始。可能不满意，但要执行。”

后来，杨成武坚决执行了。确如毛泽东预计的那样，不满意，东西多得拉不了，拖不动。许多指战员情绪大，甚至朝天放枪，一片声喊：“再见了，杭州……”

7月22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

几万人翻腾起一方“红海洋”，震天的口号声中，王力被用轮椅推下飞机。他胳膊上吊了绷带，腿部被小洪山上的荆棘

扎伤多处，留下一些刺儿。

谢富治、王力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

记者摄下了谢富治、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擎“红宝书”，紧挽臂膊的照片。

这正是毛泽东在上海谈军队调换驻地的同一时刻。

周恩来的专机也在此前降于西郊机场。

数小时后，7月23日凌晨2点30分，杨成武的飞机也降落在这曾经翻涌“红海洋”，现在变一片清寂的北京西郊机场。他立即驱车赶赴钓鱼台16号楼，向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

“太及时了！”周恩来边看杨成武关于“最高指示”的记录，边听他的汇报，只讲了这么一句痛快话，马上返回会场，对参加碰头会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并当即指示，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区发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队政委巴方廷进京开会。

凌晨3点，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陈再道等人早有思想准备，闻令立刻起身飞向北京。他们明白，此刻的行动越迅速越好，稍有迟疑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恶果。

在陈再道等人起身赴京的同时，周恩来匆匆结束了“碰头会”，拉上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救火去！”

汽车飞驰。周恩来手按电钮，将隔音玻璃升起后，才拍拍杨成武的手背，长出一口气道：“老帅们日子都不好过，主席的指示真是救火的及时雨啊。外交学院正在人民大会堂批陈毅，有主席的指示就好办了。”

那是没明没夜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像吃错了药，亢奋得日夜难以平静，通宵的批判会，人声鼎沸，毫无疲惫衰竭的意思。杨成武随周恩来走入蒸笼一般的会场，来到前排入座。

正在听取批判的陈毅与那些被报纸点名打倒的“叛徒”、“特务”还不同，除回答问题外，听取批判发言可以坐着。坐着也“不老实”，可以东张西望，可以和旁边人交头接耳。见杨成武跟周恩来进会场，眼睛立刻亮起来。他知道杨成武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

“有什么消息？”他拉住杨成武咬耳朵。

“有。”杨成武脸上流一丝开心的笑：“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两眼放出光彩：“怎么讲的？你说说当时情况。”

“主席当时是坐在沙发上，边抽着烟边讲的，表情挺轻松也挺高兴。”

陈毅忽地立起身，满脸放光，蓦地喊了一嗓子：“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会场陡然一静。杨成武怔住了，整个会场都怔住了，真是万籁一瞬俱寂，只剩陈毅挺胸扬首、缓缓扫视一圈会场，郑重宣布：“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最初，当陈毅宣布打开毛主席语录时，出于习惯和条件反射，多数红卫兵都开始翻语录，当有人说“语录只有270页”时，陈毅的大嗓已经钟鸣一般响出了“陈毅是个好同志”。

片刻的惊诧、痴愣，一道怒吼声划破了沉寂：“你造谣！”顿时，造反派们炸锅了，一种受到戏弄的愤懑之情潮一般涌起：“陈毅不老实就叫他灭亡！”“陈毅伪造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陈毅从容而立，开心地瞧着“娃娃们的热闹”，那些不懂政治又极热衷于政治的“红娃娃们”终于疑惑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不懂政治的人也明白，“最高指示”无异帝皇之圣

旨，伪造圣旨是万死不赦的大罪，陈毅再豪爽不羁也不敢如此儿戏神圣啊……

会场在疑惑的情绪中渐渐平静，陈毅已然换了严肃的神情，指指旁边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一贯严谨的周恩来也不禁为之灿然、频频点头证明：“同学们，主席最近是这样讲的。”

“好，请同志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陈毅一字一板地大声念：“陈毅是个好同志！”

会场再次轰然大哗。有人跟着念，有人开心大笑并助以掌声，也有人心有不甘地议论纷纷……

五个小时后，即7月24日上午，人大会堂里陈毅的笑谈神圣传入毛家湾。林办的秘书和内勤们无不为之捧腹。

“陈老总就是这么个性格，洒脱不羁。”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千古风流。”

“主席还能不了解陈老总？从井冈山到现在，开国元勋哪！”

“有人开心就有人不高兴啊……”

正聊得热烈，叶群推门而入：“议论什么呀？高兴成这样。”

马秘书把陈老总领着红卫兵学习“最高指示”的故事讲讲，叶群也忍俊不禁地扑哧一笑：“陈老总就是这样性格，能逗人也能气人。”她煞有介事地吁口气：“唉，其实毛主席和这些老师们是有感情的。首长对这些老师们也是有感情的。”她喘口气，脸转向王秘书：“我要给杨总长通话，你给我挂通。”

二十年后，王秘书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

“我退了出来，回到会客室，在卫生间挂通了电话。对方说：“你是林办吗？我是杨成武。”我听出是杨总长的声音，说：“杨总长，叶主任跟你通话。”

“我把听筒交给叶群，就退到会客室。

“叶群给杨总长通话，非常客气，非常热情：‘喂，杨总长吗，你好吗，这样热的天，你往返奔波可够累的……可注意身体呀！林总对你很关心。你要多保重……主席在上海可好吧？林总也很惦念他老人家。你再回上海代林总向主席问好。你有时间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一定来呀！……八一建军节，林总的意见也是你致祝酒辞为好。他和主席的意见一样。在上海主席没有给林总捎什么话呀？他谈到林总了吗？噢！没有……没有就算了。’”

绕山绕水，拐弯抹角，叶群没有从杨成武嘴里挖出任何消息。总参谋长回京，首先应该向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汇报工作，可杨成武却跳开林彪，直接去找周恩来汇报……什么意思？

叶群的脸同她的心境一样阴沉下来。

谁也无可否认：这是封锁。杨成武自己也明白，避开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只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是不正常的。但这是毛主席的意图，他只能无声地执行。

放下电话之后，他的脸色也很沉重。他处在夹缝中；一边是最高统帅，一边是副统帅，这样的政治格局，危难临头是绝无闪避的可能……

沉吟之后，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去林办请示工作，也不带夫人孩子去毛家湾看电影，尽快离京返沪。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黄浦江发出雨后的喧啸，上海的天空澄清许多。

杨成武下午3点乘飞机离开北京，在飞机上打个盹，2个小时后，又振作精神赶到上海虹桥宾馆。

他径直去见毛泽东，在他常坐的沙发上，隔茶几前倾着身子，向毛泽东汇报北京、武汉的形势。

“昨天凌晨3点，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七·二〇事件’，实际是武装游行。同时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进京。今天凌晨3点，陈再道和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刚住进京西宾馆就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噢？”毛泽东掀起眼帘，“陈、钟接电报就进京了么？”

“是的。”

“嗯。”毛泽东点头，释去对陈、钟谋反的疑惑，却又生出另一种警惕：“他们进京的消息怎么传出去了？”

杨成武耸耸肩，难以回答。毛泽东理解地点头。

“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找陈再道辩论。周总理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造反派不听他的。总理又找谢富治，生气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谢富治也急了，赶去做工作，把造反派弄走了。”

“嗯。”毛泽东松口气，脸色依然阴沉，紧张思索着什么。

“北京出现许多反徐向前的大标语。”

“哪些人？”毛泽东阴沉的面孔又添一层严厉。

“三军造反派。”杨成武尽量用平淡客观的语气汇报，“说是揪陈再道、钟汉华的黑后台。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许多人都坐车去京西宾馆转了几圈”

“还有哪些人去了？”毛泽东的两眼变暗，眉毛渐渐锁紧，

嗓子似乎受到了烧灼，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叶群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都去陪同，有几十辆小车。”

毛泽东阴暗下来的两眼突然闪烁一下，马上又变得黑，把手一挥，作了个烦躁的手势：“还有什么情况？找代表性的。”

“南京造反派也冲了军区，许世友坐车冲出大院不知到哪儿去了……”杨成武闭住了嘴，因为毛泽东的脸色变得有些吓人。他把眼睛闭住了，好象内心的怒火就要喷发，刹那间，他有力地约束了自己，沉默有几分钟，象是风暴过去，汹涌的波涛受了阳光和藹的照拂渐渐平息。他抬起有点苍白的脸，掀开眼帘，朝杨成武轻轻挥挥手，低声说：“你先去吧，有事我叫你。”

红日西沉，鸦鹊奔林高噪；小院清幽，伊人出楼轻言。

晚饭后，毛泽东又单独叫来杨成武，相随出楼，沿虹桥宾馆草木间的小径散步。

“这么一闹……”毛泽东已是心平气和。他仍然思考连贯，讲话跳跃，省去一些过程话：“是不是一大批人就会反对我？”

“不会的。”杨成武马上明白所指：“没有主席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党和军队和人民，爱戴主席；两派三派，各派对立，但都是拥护主席的。武汉就是例子。”

“都打我的招牌。”毛泽东略带自嘲。

“都想跟主席干革命，只是跟上跟不上。”

“陈再道你过去认识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噢。”毛泽东心有所想，漫应一声。走过一圈路，象自言自语，又象问杨成武：“他会反对我吗？”

“我看不会。”杨成武口气里带着自信。“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反对你等于否定自己大半辈子的奋斗，不会那么傻。所有我们的老党员老干部都不会反对，都想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对，对，对。”毛泽东迈三步讲三个“对”，然后深吸一口气，痛快地吐出去：“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他也不会到北京去了。”

毛泽东停住脚步：“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钟汉华呢？”

“也不知道。”

“你打电话问总理，找到他们，要他们回京西宾馆住起来，保护起来。你向陈再道传达我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毛泽东的声音越讲越轻越温和，他已经继续向前走去，身后留下毫不带感情的淡化了的声音：“明天你返北京，筹备建军40周年。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作犯错误处理么。警惕有人作文章。让张春桥去找许世友谈谈，他们两个不要对立，统一不了就调和。”

杨成武的脚步随着毛泽东放轻松放缓。他抬眼望去，天际那火红的晚霞正在淡化，悄悄化作了一抹淡淡的橙晖……

“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陈再道那张肌厚肉重的脸孔在毛泽东脑中已淡淡成为过去，另一张瘦削的面孔却棱角齐备地渐渐鲜明起来。

第四章 毛泽东敲山震虎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3时。

日火燎地，蒸腾、窒塞、酷热；路面柏油涔涔，广场水泥烘烘，气味辛辣刺鼻。参加“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的红卫兵们，为激情鼓荡已有呼喊口号，一路示威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队伍。

这时距开会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呢。

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关锋抓着电话，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关锋告诉他的战友们：“林副主席决定亲自参加咱们的大会！”

“太英明了，十分英明！”陈伯达舌头笨拙地抚掌而言。他善写不善言词。

江青说：“请林副主席一定参加。”

关锋转达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的意见，

接着自己又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该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各军区负责人参加。住西山的那一位就可以不参加了。”

“住西山的那一位”就是指叶剑英。

林彪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5 点前，炎威稍退，林彪登上天安门，望一眼广场的“红海洋”，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开始。浩大的集会声势只有中国人民“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去支援世界革命时才会见到。

“捣鬼有术，也有效”，蒯大富始终留心观察林彪。大会所喊口号，重复最多、语气最烈的有两句：

“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委一小撮走资派！”

林彪每次都举手了！

于是，会议一结束，他立刻在“井冈山”对外作战部里，增设一个“军事动态组”，准备大干一场。

可是，大会刚结束，杨成武飞抵北京。

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对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 3 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他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亲笔增加“同志”两字。

从周恩来处出来，他又通知邱会作，叫他也向陈再道转达

毛泽东的3句话。

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秘书正给林彪“讲文件”。

所谓“讲文件”就是把重要的关系大局的各种动态简略成条文讲给林彪听。

“主席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作了批示。批语是：‘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全文5条，其中第2条提到陈再道。主席在他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二字。”

林彪一怔，望住秘书不作声。

秘书明白份量，将毛泽东批示过的《通知》复印件交给林彪：“首长，电文在这里。”

林彪凝视片刻，一言不发，起身踱步。秘书眼睛随着他转，不再继续“讲”。

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已经搞到他毛泽东头上了么，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算什么？“欢迎”、“声讨”，大会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他又加个“同志”！这算“打虎不死，遗患无穷”，还是“武大郎捉奸，反受其害”？到头来好人都被他做了！

林彪脸色变得苍白，身上有一种不祥之感——湿漉漉的，是出汗！

他一急就容易出汗，一出汗就容易闹病。尽人皆知。

他忙看一眼壁上的字：克己复礼。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下午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江青讲：“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这本来是江青也常讲的，但这次江青却没说话！

叶群忽然进来了，看一眼秘书，小声说：“邱会作来电话。”

杨成武已回京，叫他转告陈再道主席说的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静气过人的林彪，始终一言不发，脸孔平板得象一块隐忍的青石。问题不在一个武汉，一个陈再道；二方面军曾是大威胁，因为贺龙是军委第二副主席。毛泽东讲过，中央军委的工作“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家贺主持。”贺龙利用林彪养病两年之机，主持军委工作，造成很大气候。现在贺龙这条线基本解决，剩四方面军这条线，能半途而废？运动已经起来，怕也由不得谁。既然你讲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就不能只造“党里”、“政府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必须造“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

“你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达到。”林彪一晚上只讲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这话曾三次被人听到，另外两次是“九大”之后和九届二中全会上庐山之前。

凌晨四点，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在开会前先同张秀川通通气，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让徐向前对‘七·二〇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不要给三军造反派抹黑……”

一 北京很热闹

1976年7月26日下午3时，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

这是“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的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扩大”到什么范围？超过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文革成员，一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种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差点溢出去。

主席台上坐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十余人。

武汉军区的座位面向会场，斜向主席台。名为“讨论”，实则受审，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为第一排。他们是最后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不要坐，你们站着，站着听！”

这就象站上了被告席。

谢富治头炮定调：“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炮声未落，吴法宪盘马弯弓，要在百万军中“夺旗”，“取上将之首”，他感觉已是“如探囊取物”。

先骂出水平：“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复辟急先锋”，“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今天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是个奸贼窝”，想不出词时，索性来句粗的“是你个娘卖×的”。

这就是扩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碰头会。周恩来虽然常“违心”，一时也“违”不下去了，三次打断吴法宪发言：“讲理，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三斧砍过，斜刺里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听听，有错误都不倒，是打不倒还是不许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气得脸色泛白，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嘴唇微张，怔了怔，突然醒过神来，这不是示威

吗？那一腔火气无处泄，眼睛一轮，盯住了陈再道，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搥了陈再道两个大耳光。若不是被拉开，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会场哗然，陈毅和谭震林一声不响，起身就走。

周恩来喝斥：“吴法宪，讨论会你怎么动手？这样搞是不允许的！”

江青轻描淡写打个圆场：“这个吴法宪就是造反派脾气，有股子造反精神。”

斗争会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7小时；会间休息又遭服务员们一阵拳脚。他见康生正襟危坐主席台，始终神情冷冷，一言不发，以为是不满这种搞法，便大声呼救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你说句话……”

“人可以变！”康生说话了，一字一句象抛石头蛋，“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康生不慌不忙拿出毛泽东批示的中央复电全文，逐条解释那五条内容。提到陈再道的第二条，康生解释道：

“‘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对这一条怎么理解？‘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是说你现在属打倒之列，不在革命之列，是敌我矛盾暂时按内部矛盾处理，但要有前提。不再坚持错误；这还不行，还必须认真改正；这还不够，还必须为群众谅解。一条做不到也不行。你本来是敌我矛盾，是反革命；三条有一条做不

到，你就是顽固不改的反革命，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

陈再道一阵晕眩，闭上了眼。他宁愿再挨吴法宪几个耳光也不愿面对康生讲的“现实”。他明白那个“群众谅解”是怎么回事，除非林彪和中央文革能喜欢上他！

可能吗？他绝望了……

“除了睡觉，我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问题。因为一想事，我就会沉下去。”毛泽东对保健医生徐涛以及身边几名卫士说。这是五十年代的事。那以后，他一直游泳，为了休息脑筋。

他从游泳池里爬上来，由卫士擦擦身，便又沿着池边漫步；休息过的脑筋开始运转，渐渐加速。

北京很热闹。毛泽东不是前排观众，他甚至象坐在楼上的“包厢”里。但他有“望远镜”、“助听器”。既可以鸟瞰整个舞台，也可以将望远镜调准焦距，对准某一个演员，看清他的眼神和每块肌肉的运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还是远点好。每逢大的运动或社会变故，他总是远离热闹中心；从“高饶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刘邓“镇压”学生运动，莫不远离，何况，如此还可“避恶鬼”。

看清了，看透了，一句话，一个动作即可决定全局，这才是真正的“中心”。

弄潮儿是不会对着潮流使蛮力；须因形就势，冲撞随和，刚柔相济。否则，别搞中国政治。

7月26日，吴法宪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他一笑置之。

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职。他点头首肯。林彪和中央文革发了《给武汉市革命群

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他也默认。

“北京闹得厉害。”毛泽东轻松地笑道：“林彪不满意么。”

好办。7月28日，毛泽东痛快答应：“那条驱逐舰可以留在武汉支持左派，再看几天。”

好办。7月29日毛泽东又作出使“左派”满意的决定：

1. 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

2.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3. 原梅岭、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4. 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5.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6.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其实，北京不闹，也会有此决定。那么大一场“七二〇事件”，不处理一批还行？没天没地没方圆了！

这“6条”北京怎么会满意？林彪说：“带枪的刘邓路线”，林立果发表文章，要在全中国“揪军内一小撮”。王力、关锋他们喊得更凶，不足为意，属“逐味”之流；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也喊，不过是“糊涂”，不足为虑。

毛泽东关注的只是林彪。

“人家长了嘴就要说话吗。”毛泽东对“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军内一小撮”只表了这么一句态，为以后留下伏笔。

他现在还要看看。当然也不能没有一点表示，毕竟还在一个“司令部”里。

7月30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最高指示：

1. 曾思玉、刘丰的任职命令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如何宣布可以晚一点办。
2. 独立师不调出，同意分编到44、45、29师去。独立师的人不离湖北，集中起来集训。
3. 独立师原担任的任务，由15军两个师和29师来担任。
4. 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
5. 王任重可以全国报纸点名。
6. 武汉军区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转达。

又是6条指示。不过，多加一句话给周恩来：

“陈再道要保护起来，留下人头好办事。”

“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都是以陈再道为代表；将来对这个问题表态，也只须对陈再道表个态，完全不必同林彪去直接对垒，不必直接去驳林彪的话。“陈再道”可不是一个陈再道哟……那是加引号的！

“你们懂什么叫艺术吗？”蒋介石曾这样问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你们不懂？那你们就去研究研究毛泽东怎么消灭了你们八百万军队，把你们赶到台湾岛上来的……那是人类艺术的最高境界！”

现在，1967年7月31日的午后，毛泽东在院内漫步，头上是华东七月的太阳；他走得从容、宁静、稳健又不失潇洒。

军事上，他是大艺术家；政治上，他更是大艺术家。

他脸上浮出一种朦胧的浅笑；几分自信，几分不屑。他是不会现在跟林彪发生任何直接对峙的；只要还在一个司令部，就不会。

不必。也不值得。否定“揪军内一小撮”无须去呐喊，否定“清一色”更无须公开去呼唤。

他在藤椅上坐下来，吸燃一支香烟，心平气静地发出最高指示。这是第三个6条：

1.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军委各副主席都出席。徐向前同志也要参加（这句稍加重了语气）。街上有大字报不要紧，做工作。

2. 朱德、刘伯承也要参加。（刘伯承有病，不在京，周恩来替他请假才获准不出席）

3. 各军区在京同志都要参加，韩先楚一定要参加。（当时韩先楚被骂为福建的“韩老谭”、“韩再道”。）

4. 各兵种头头吴克华、崔田民可不到，其他可到。总参彭绍辉不到。（三位不到的将军是因为早已被毛泽东点名。）

5. 其他方面参加人由北京定。

6. 同意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略一沉思，大概是想到陈再道是“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所以，他把不是军界的谭震林也破例提出来，说：“主席，谭震林同志是否可参加？”

“好。”毛泽东目示杨成武，“他一定要参加。”

林彪也在散步，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穹庐下散步；万籁沉寂，一厅阴凉。他两眼淡漠，四肢机械，遇了障碍物会下意识绕开，却决不正视。

他在思想。他不游泳，所以除了入睡，没有不想事的时候。陈良顺、刘杰等等身边工作人员这样描述：

“他躺着想，坐着想，走路也想。没有不想事的时候。他很朴素，也好侍候，很少有事麻烦人。他可以一坐几个小时不动，也可以没完没了踱步，间或眼睛一亮，从上衣袋里掏出笔和一方纸片，写下几个字或一句话，对着凝神片刻，或者小心翼翼收进兜里，或者撕碎丢一边。接着，他或坐或走，又开始想，直到眼睛再亮，再出掏纸片。他随身总是带着一叠方纸片。就这样，他想出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出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大最大最大’、‘最小最小最小’之类极富特色的语言和内容……”

不管你喜欢他或者仇恨他，你都无法否认他是个极富个性和特色的人。他的字是“林彪体”，他的话是“林彪语言”，都不会跟第二个人混淆。可以说，全中国独此一家。再说句公平话，他打的仗，全中国也是独此一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他资历最浅，没有背景，却排名第三。朱德占了一个“朱毛”，一个“红军之父”，他不好比；彭德怀曾代理总司令，初到陕北时，红军整编还当过总司令，他也不好超越。剩下的，无论是当过他的教官还是当过他的军长，统统不在话下。靠什么？……战功。

他打巧仗，打得神出鬼没；打恶仗，打得石破天惊；打大仗，打得山岳摆簸，天翻地覆。

红军战争，几乎所有著名战役林彪都参加了，是第一线指

挥员。毛泽东被排斥于领导之外的第四次反“围剿”，若不是林彪彻底打垮国民党陈诚部队主力，很可能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提前发生。

抗日战争，第一个打出八路军威名的平型关战役，是林彪指挥。在这场战斗中，打响第一枪的杨成武回忆说：“聂老总当时在原平。在前线看地形，分派兵力指挥战斗的是林彪。”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他打了两个。老百姓说他是“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横扫半个中国。”当初他是带了 10 万缺衣少枪的部队出关，二年后，他消灭国民党 50 万精兵，率一百多万大军出关；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是武器最精良，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难怪黄永胜敢口出狂言，入关时在司令部一手推开挡风遮寒的棉布帘，一手指天划地：“林总，现在单是咱们‘四野’一家也足以跟他蒋介石一争天下了！”

林彪喝斥了黄永胜。

他可以把蒋介石当猫打，当面团儿捏，但是到了毛泽东面前，却无法去掉那种自卑感。他忘不了长征路上那一幕：当他抱怨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弓背路”时，毛泽东那漫不经心的一声：“你还是个娃娃，知道什么？”

据说林彪看三国，掉眼泪，不是替古人担忧，只为一句“既生瑜，何生亮”。

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到 1959 年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林彪一步步进入政界核心，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大量读史，在政治斗争中学习政治，“提高”很快。他不再只是个军事家。

比如，“用你的话，办我的事”，他比谁都用得活。

这就算政治家了？

毛泽东讲：“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林彪马上用这句话办自己的事，“揪军内一小撮”，揪出个陈再道。该抓一串“李再道”、“王再道”了，毛泽东也不说他错，却在陈再道后边加一笔“同志”。林彪明白，举国都喊打倒陈再道，顶不住毛泽东这两个字。

“七二〇事件”激烈时，毛泽东讲了“已经暴动”。林彪马上用这句话，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他该清理这条路线上的人了，毛泽东还不说他错，却把这些都请去参加了八一招待会……

林彪突然发现，活到60岁，他在毛泽东面前也还是个娃娃！小打小闹解决点“个人恩怨”可以，抓几个人出口气也可以，安排几个人给点糖果吃还可以，一旦涉及要害，关系大局，马上象大人对付娃娃一样把你支走引开了。

毛泽东固然高他一筹，但现在离不开林彪。“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现在定不下坚实基础，他这个接班人就当不牢。刘少奇也曾是接班人，结果如何？一个《炮打司令部》，加标点符号不过二百四十三个字，就那么垮台了……

如何争得主动？林彪想了许多。

“打倒陈再道”，关系大局，不能轻易罢手。

“揪军内一小撮”，关系大局，必须继续搞。

打过仗的人都懂“坚持”，胜负往往取决于谁更能“坚持”。“打倒罗瑞卿”，不就是坚持的结果吗？

但是，必须情况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想到这里，那股怒气便升起；怒气托出一个熟悉的面孔：杨成武。

“杨成武封锁我！”他曾对叶群挤出这么一句。

“他是你老部下。”叶群提醒。

“罗瑞卿也是我老部下。”

“他写文章，讲你教他当师长。”

“罗瑞卿也在作战会议上说忠于我，‘弹打不飞，棒打不散’。”

“都是吴法宪那种人也不行。”

“讲山头靠不住，还得讲人。”

“那就考验一下么，看他讲人不讲人？”

……

不要误会谁听到了他两个人对话。没人听见。是叶群给杨成武打电话，既表白又威胁，有意露出大致如上的意思，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从一滴血能看出他的全身。”

杨成武一当红军，林彪就是他的首长；先后任他的军长、军团长。相当长一段时间，杨成武崇敬他这位老首长。

杨成武对笔者回忆过两件记忆深刻的事：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应召跑七十八里去见林彪，他要搞‘围点打援’和‘网开一面’的教学课。到了那里，也没课本，只有十几个战士。一个战士是‘白军’，几个红军各代表一支部队迂回包围，而后‘攻打白军’。‘白军’叫喊‘救命’，另一个‘白军’开始出动增援，另几名红军埋伏出击，将‘援军’在旷野里一举歼灭。接着是‘网开一面’。3名红军包围‘白军’，留一条路，路上几名红军埋伏于两侧。红军攻击得猛烈，‘白军’只好弃城逃跑，在路上被一下子歼掉。这时，林彪说：‘今天演习完了，下去多想想这课内容。’这一课真胜读10年书。”

“还有件事印象深。我从‘红大’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我为红一师师长，林彪同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我有

记录的习惯，从当兵到现在，开会或同上级谈话，全记录。这次林彪的谈话我做了详细记录，共9条内容，厚厚一本。陈光、罗瑞卿、刘亚楼当时都知道，并且都拿去看过，认为对部队建设很有价值。后来我将这个记录发表了，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林彪后来变坏了，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卖国贼，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但他讲的‘怎样当师长’不该因人废事，所以1987年我的回忆录发表时，我以尊重历史的态度，仍然将这篇文章收入回忆录中。”

罗瑞卿与杨成武情况相似，也是林彪老部下。也曾崇敬林彪，确实讲过“紧跟林总，弹打不飞，棒打不散”的话。但是有前提，就是共同革命奋斗的时候。一旦搞阴谋，这两位老部下就不干了。所以林彪说“讲山头靠不住，还得讲人。”

吴法宪是跟人不分是非；以人论是非，以人划线。可惜他能力不大，无法与罗瑞卿、杨成武比，所以叶群讲“都是吴法宪这种也不行。”

罗瑞卿被打倒，重要一条罪名是“封锁林副主席”。

现在，杨成武两次返京，只向周恩来汇报，不先向林彪报信；给陈再道都传了话，没给林彪透一点风；去见了几个老帅，唯独没来见林彪。

所以，林彪说他搞封锁。这条罪名足可决定杨成武的命运。不过，他毕竟是出自林彪麾下的一员上将，文韬武略，深受赏识。不是万不得已，轻易不舍得拿掉。

那就考验考验吧……

碰头会，吴法宪坐在了杨成武身旁。

“杨总长，”吴法宪两腮多余的垂肉竭力向上抽紧，化作三分谦恭、七分谄伪的笑容，朝他的上级点点头，将胖硕的臀部

塞进椅子上，目光闪烁着在杨成武脸上稍即离，频触频离。

杨成武立刻浑身不自在。这位空军司令员与林家的关系在军界几乎尽人皆知，每当他由于肥胖而鼻孔咻咻地喘息不止时，便会令人想起寻嗅蛛丝马迹的狗鼻子。

记得第一次返京时，总理向在京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达“最高指示”，刚散会吴法宪便粘糊上来，贴在杨成武身边问：“杨总长，主席对林副统帅有什么评价？”

“没有。”杨成武赶紧“关门”。

“不会吧？”吴法宪一脸狐疑，“几个活着的老师都提到了……”

杨成武沉下脸，严肃道：“没有。你不要乱猜。”

吴法宪笑得蹊跷：“这次回北京，去看过林总吗？”

杨成武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未露声色，含糊道：“下了飞机就开会，还没顾上，和叶群通过电话……”

“噢。”吴法宪仰天打个哈哈，莫测深浅地扬长而去。

望着那臃肿蹒跚的身影，杨成武心事重重。吴法宪是叶群的传声筒，军队上层尽人皆知。可杨成武又能说些什么呢？

毛泽东将老师评点一圈，确实没提林彪。但是，讲“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肯承担责任”时，熟知军史的杨成武听出了影射林彪的批评之意。当年东征自锡山，林彪反对。林彪想去甘南打游击。东征回来，毛泽东批评这件事，聂荣臻承担责任，林彪不肯检讨，毛泽东那时便说过“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肯承担责任”。旧话重提当然是有含意：林彪是共产党、解放军里唯一从不作检讨没写过检查的人。

评点老师以外，毛泽东曾单独谈过林彪。

“谁封我的四个官呀？”毛泽东指点林彪手书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奚落道：“什么

永远健康！难道有永远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如果这样搞，将来是要吃亏的。”

这些话能对吴法宪讲吗？何况，毛泽东还明确要求杨成武与林彪保持距离：“有些话，你不要对林彪讲。”

身到高位始知难。中国政治是这样，世界各国的政治恐怕都不例外。当举国上下都为毛泽东与他“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友谊和团结唱赞歌时，当许多老干部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来比喻毛、林之间的关系时，杨成武已深深感受到这两位统帅副统帅之间的矛盾、猜忌、警惕与斗争。而他本人，正夹在这对矛盾之间。

毛泽东让杨成武与林彪保持距离，林彪希望杨成武“带着孩子们过来看电影”，“一定要来呀”。就在杨成武照意图办事之际，吴法宪这个传声筒又在碰头会上坐到了杨成武身边。

“唉，全国这么乱……”吴法宪摆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望住杨成武：“你看谁能稳住阵脚，拿得起来？”

“什么都得毛主席来下决心啊。”杨成武怎么想就怎么说：“全国这么乱，只有毛主席才能稳住阵脚，只有毛主席才能拿得起来。”

“不，毛主席唱独角戏也不行。”吴法宪早有准备：“我看全国得两个人下决心，还有林副主席。”吴法宪盯紧杨成武“你说呢？”

杨成武心头微微一震。这已经不是泛泛而议，而是要表明政治态度了：是承认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

“关键还是毛主席。”杨成武淡淡一句，却表明了坚定的政治选择。

“噢。”吴法宪又一次仰天打哈哈，不再言声。杨成武的心

微微一沉，他明白自己的这一态度，不出半天就会传到毛家湾，传到当年的“林总”耳中。

叶群秘书王兰多回忆：

“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和杨成武之间产生了芥蒂，其真正原因正像叶群对林立果所说：“你爸爸这几天又不高兴了。他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他在主席面前说了什么话，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态度，有什么来头也不清楚。”

有一次，叶群刚从外边回来，把皮包往沙发上一摔，没好气地说：“他封锁我。”

“谁封锁你？主任。”我递上了温湿毛巾。

叶群一边擦着脸一边说：“杨成武。他从上海回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他有事也不来向首长汇报，只向总理汇报。他把首长放在何种地位！眼中还有首长没有？”

叶群哪里知道，“封锁”林彪的真正原因是主席的意图，杨成武只不过是照章执行……

后海南沿九号，杨成武送走客人，没有回屋，在门前背剪双手，望着那些盆景凝思默想。

真快啊，马上放出风来了。

叶群对当年一军团的几位将军说：“我从一滴血就能看出他的全身。杨成武不是林怎么说他就怎么干，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哩……”

杨成武不是吴法宪。

吴法宪是“林副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想那么多干啥？有林副主席呢。他想好了，我去做就是了……”

杨成武不然，他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

前不久，林彪想让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他对杨成武讲：“你考虑一下怎么办？”

杨成武摇头：“我觉得不大适合。他从没做过政治工作，而且……”

“怎么了？”林彪显出不悦。

“生活作风上，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说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一不打仗就去找女人。当总政主任，意见会很多……”

“算了，就这样吧。”林彪把手腕一甩，叫杨成武走。他本意是让杨成武去影响毛泽东和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器重杨成武，能听进他的话。既然杨成武有自己的想法，林彪便亲自去向毛泽东提。

后来，杨成武陪毛泽东南巡，到了武汉，聊天时，毛泽东说：“林彪想叫黄永胜当总政主任，我没同意。这个人啊，不是干事业的，花花公子。我对林彪讲，黄永胜这个人我认识都不认识，不合适。林彪又提议关锋，说关可以当主任或副主任，关锋怎么能当？我说关锋只能写讼词，不能判案。”

在叶剑英的问题上，杨成武也有自己的想法。

青海发生了“赵永夫开枪”的事件。在青海的两派中，叶剑英支持赵永夫，林彪支持刘贤权。

杨成武认识刘贤权。长征时，杨成武是红四团政委，刘贤权是六团卫生队指导员，常能见到面。后来刘贤权随林彪去东北，任警卫团长。与当时的林总和叶群关系都很好。

赵永夫事件发生后，赵永夫由于下令开枪而被逮捕。林彪追后台，对杨成武交待：“你从现在起，所有中央文件不要发叶剑英。”

杨成武下来越想越难办。叶剑英是元帅、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自己才是上将、副秘书长。副秘书长不发秘书长文件？自己怎么敢这样干……

杨成武苦思半晌，忽然脑子一亮：找总理去，总理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了林彪的指示：问：“总理，你看我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周恩来反问。

“……照发。我怎么敢封锁叶帅？那可是大问题了。”

周恩来笑着摇头，示意杨成武凑近，附耳道：“不发不行，不可照发。”

杨成武疑惑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又一笑，小声道：“什么搞卫生、整顿厕所、内务纪律这些文件你发他作什么？他不管那么细……”

杨成武恍然大悟，笑道：“明白了。”

于是，所有重要文件杨成武都照发，逢上卫生检查之类的文件，杨成武便很认真地交待军委办公厅：“这文件不要发叶剑英。”

可是，耳目甚广的林彪，最终能不晓得这个真实情况吗？

还有不少类似的事。比如何汝珍、王飞、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住在京西宾馆，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吃喝玩乐，把文工团女孩子的肚子也搞大了。几封匿名的告状信上来，杨成武十分气愤。他也不知道这几个人是“林办”和空军党办的人，曾跟叶群出去蹲过点，又与林立果私交甚密，都不是一般人

物。但正义总要主持，杨成武便将信批给林彪，写道：林总，有几封告状信，若调查属实，应严肃处理……

转上的信，如石沉大海。不过，杨成武从“林办”和空军党办一些人眼里看到了冷冷的敌意……

“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罢了你的官。”夫人赵志珍小声劝说。这是个既愿意打仗又喜欢理家的“女八路”，她的性格特征集中体现在那双凝聚了熠熠光彩的眼睛上，无论欢乐忧伤，顺利或挫折，这双眼睛从来不曾暗淡过。认识她的人都说，那里燃着生命之火：除非生命结束，光彩不会熄灭。举凡经过大风浪的女人，坚韧的意志力和顽强的忍耐精神都要超过男人。笔者一向认为：男人的美在于爆发，女人的美在于持久。赵志珍无疑是个坚韧而又持久的人。更何况生得来一个豁亮肚肠，举手投足常显出军人那种干脆凌厉的潇洒劲。作为杨成武的内助，关键时刻常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她向杨成武分析说：“现在你这个位置是在夹缝中，必须听主席的，又不能不听林总的；必须听总理和老师们的，又不得不听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上面越复杂，你这个位置越敏感，问题多了，每天提心吊胆。不当这个官，还可以自在一些。”

“没那么简单……”杨成武显然要看得远些，“哪个人是不当官就完了？罗瑞卿是吗？”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赵志珍眼里漾出一股锐气。“打一辈子仗，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

杨成武望着夫人，感到内心有一种相通，一种相互的支助。他忽然笑了，点点头：“天塌下来一道顶住。”

1967年8月3日，杨成武精神抖擞飞返上海。

5点45分，虹桥宾馆。杨成武已经坐在毛泽东身边，开

始汇报北京的情况……

二 许世友跪倒在地

一辆黑色吉姆车驶入虹桥宾馆，在杨成武下榻的副楼门口停住。

坐在司机旁的警卫参谋跳下来，紧跑两步，打开后车门，手扶车门等候。一名穿了军装的中年妇女很利索的钻出车门，四下里望望。

她中等个，看上去只有四十出头的年纪，眼角隐约有些细细的皱纹，仿佛来阵风就可以吹得一干二净。从她那健壮的母亲型的身上还有那眉眼舒展、脸色红润、风韵犹存的面孔上，你可以想见当年那位苗条、洒脱、漂亮的山东姑娘。她叫田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夫人。

大约是受了许世友的影响？这位夫人混身洋溢着火辣辣的气息。听到车门在身后砰一声响，拔步就往楼里闯。

“同志……”卫兵迎上来想拦住问话，那夫人却如人无人之境，一阵风似地卷入门，由她的随行警卫参谋冲前两步，一下子截住了门口的卫兵，压低声说：“许司令的夫人，来见总长，约好了的。”

卫兵鞋后跟碰出一声响，先立正，再退后一步。警卫参谋早已追进楼去。因为里边响起了喊声：“哪个屋啊？你们怎么联系的？”

警卫参谋追上去时，早有几名工作人员一溜快步地迎过来：“田普同志，这边，首长等你呢。”

田普被引入杨成武的客厅，嗓门挺大地问候：“杨总长，你好啊！”

杨成武从沙发里立起身，笑着伸出手去：“田普同志，你好。什么时候过来的？”

“上午。”

“许司令好吧？”杨成武随口问一句。

“好什么好？一点不好！”田普大刺刺朝沙发里一坐，“娘卖×的张春桥，专跟我们许司令对立，捅鼓一群×养的去冲军区，他算什么东西？摇两下笔杆子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不看主席的面子，我们老许早把他收拾了！”

许世友挂在嘴头上的几句粗话，田普一点也不少。公开场合她说话还注意，言谈举止有个老干部、女八路的风度。见了亲人和朋友，她很放得开，敢说敢笑敢哭敢骂。

“许司令现在在哪儿？”杨成武关心地问。

“金家寨。”

“跑那儿干什么？”

“开荒种地，”田普看着杨成武，半是玩笑又绝对半是认真：“练兵备战！”

杨成武看着田普没有作声。

“谁敢到他那里去，没通知他，没有他同意，他就开枪，就打！”田普一巴掌拍在沙发扶手上：“告诉他们，我们老许没有陈再道那么好欺侮！弄北京去？不谈好了弄一个试试，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别说是我们许司令！”

杨成武关注地问：“他带多少人？”

“一个独立师，机枪架路口，许司令亲手画一条线，敢过线就打！×养的造反派，张春桥，你过一个试试，算你有胆儿！”

杨成武知道田普不会说假话，这种人你教她假话她也不会讲。所讲那些事许世友也肯定干得出来……

“现在南京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不怎么样。你知道，陶勇跟我们许总是金寨老乡，一起参加革命，打国民党，打日本人，打美国人，打出个江山来怎么样？妈了×的，给造反派扔井里淹死了！朱兰给陶司令生了八个孩子……”田普几度哽噎，几度拭泪，“八个孩子给老许跪了一地，叫许伯伯救救命……”田普停下来擦泪，好不容易平静一些情绪：“许司令是进山了，你们看着办吧。×养的张春桥叫许司令出去，放他狗屁！聂司令聂凤智听他的话出去了，出去怎么样？装麻袋里打，扔进厕所里！说我们老许在延安造反，造反怎么着？那也是逼的，还逼还造反！”

杨成武无语。他相信许世友能干得出来。

“南京军区有人跟我说，肯定是毛主席来了。我跟老许通了一个气，许司令给主席写了封信。”田普从兜里掏出一封皱折的信封，“杨总长啊，我们信得过你。老许这封信就拜托你了，请你转给主席。”

杨成武接过信，在茶几上捋捋平，然后说：“田普同志，就这样吧。信我负责转交，你回去转告老许，要相信党相信主席，冷静些，你也劝劝他……”

许世友，共产党队伍里一个特殊人物。有人叫他“红煞星”。“煞”是凶神；他不是“黑煞”，是“红煞”。因为他是共产党军队的将领。8岁就曾抢过土匪的枪，8岁出家当和尚，学一身少林功夫；16岁空手杀人，扯旗造反；7次参加敢死队，8次负重伤。

他与杨成武不同。如果说杨成武是京剧里的“靠背武生”，赵云、马超式人物，那么许世友就是“花脸”，张飞、许褚式人物。杨成武为将文韬武略，许世友为将勇冠三军。战斗打激

烈时，胜负只在一刹那。杨成武于一刹那间，可以审时度势，出奇谋用能人一战而全胜。许世友于一刹那间，可以拔刀而起；身为师长、军长，也能吼声如雷，身先士卒，踊跃直前，激起全军振奋，不怕付出巨大牺牲，追随他杀出一条血路，夺取最后胜利。

广州军区接待处长与彭德怀元帅熟。有天他对彭德怀说：“老总啊，你见了当兵的没脾气，见了当官的没笑脸。当兵的都喜欢你，当官的都怕你。你知道吗？”

“是吗？”彭德怀慢不经心地瞥一眼接待处长，而后说：“当官的都怕彭德怀，可彭德怀就怕一个许世友，他是属牯牛的，三句话不对就顶人，还跟他讲不清。”末了，学接待处长的样子一本正经问：“你知道吗？”

一般人跟许世友打交道，都要犯点嘀咕。“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脾气”不好惹，可许世友的脾气更不好惹。南京几十万造反派要揪斗许世友，下通令，让许世友见群众。秘书把“通令”交给许世友，许世友飞一眼就丢进纸篓子，对秘书说：“你告诉他们，不见面他们闹闹还安全点，见了面我怕他们一个也活不了。不信，叫他们来一百个代表，我一个人去见他一百个，叫他们试试！”

这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了造反派，造反派嘀咕一晚上，一百名代表没选出来，只是贴了满大街标语：“打倒许和尚！”“许世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情况汇报到许世友那里，他只说一句：“妈了×的，不见面闹闹还安全点。”

周恩来深知许世友的脾气，怕他闹出大事，忙警告造反派：“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揪的话，我一小时就赶到南京去！”

怕许世友造次惹事，中央军委对许世友三令五申：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当一辈子军人，许世友对军令还是从不违抗的。他在军区 AB 楼开会，造反派来冲军区大院，他宣布：“主席讲，要退避三舍。先让他们一让。”

楼后是“桃山”，停几辆吉普车。许世友上车，说：“桃山、桃山，妈了个×的，逃娘的山里去！”

汽车驶入大别山，许世友问：“主席讲的三舍是多少？”

车上人愣了愣。有人犹豫说：“90 里吧？”

“妈了个×的，退过了！”许世友跳下车，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给我都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造反派们后来还是浩浩荡荡追来了。看见一排黑洞洞的机枪口和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队伍停下来，万众踟蹰，毕竟没人敢试许世友的锋芒，还是不见面安全些，喊一番“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便退潮一般缩回去了。

7月22日，武汉闹得凶时，毛泽东曾让张春桥跟许世友谈话。张春桥一听许世友就犯嘀咕，浑身不自在。

但是主席交办的事情还不能不办。

他费尽气力，总算与许世友电话联系上了。那次通话，许世友的女儿有过回忆：

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都做

过检查。”父亲的声音有几分委屈和愤怒，“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

“我是司令员，我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父亲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口，我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操练，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道黑眉象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

“没什么，我的卫兵在操练！”

“……”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操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

“就是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

“我这是军事重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我这儿就是有部队，他们是听我命令的，是保护我的。”父亲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武的吼声雷一般传入。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父亲把电话撂下，从牙缝里骂一声：“妈了个×的！”

……

“第三战役？”毛泽东眼里又闪出警惕之色，望住汇报武汉形势的余立金：“谁提出的？”

“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主要讲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余立金望着他的小本汇报。

“中央首长认为？”毛泽东缓慢重复一遍，“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

余立金张张嘴，说不出来。

毛泽东目光从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脸上一掠而过，动手去掏烟，将烟捏捏松，沉思着叼在唇际，沉思着取火吸燃。

他是讲过一些话。那是南巡前，7月13日下午，他对到会的杨成武等军人说：“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了。”这句话与王力、关锋讲的“第三战役”，乍看相似，其实有本质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首当其冲”，“是当局了”，是讲军队支左，介入运动，实际控制局势，把握大权了，以后要依靠军队，所以军队也要谨慎。

“文化大革命的重心由地方转向军队”，这是要把军队作为“革命对象”，作为下一步斗争重点，两个意思不是截然相反吗？

王力、关锋野心再大，也不会更不敢这么提，他们说“中央首长认为”，他们真不理解毛泽东原话原意？他们是秀才……

“这些小将‘通天’，不知他们说的中央首长是谁？”余立金小声说。

毛泽东不再追，他要继续看看。有时中央文革也尽干蠢事，跟林彪分不清谁是“始作俑者”。

“还有什么情况？”毛泽东问。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造反派一个任务，要他们派出人马到各地去介绍、推广武汉地区同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造反派动作很快，一下子出去几万人，到江西、河南、安徽、南京……”余立金看看毛泽东，放低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书呆子！”毛泽东脑中闪过陈伯达圆头圆脑的学究相，感情并没反映到面孔上。他毫不露声色地转望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哪里？”

“金家寨。”

“他干什么呢？”

“带个独立师，在那里种田开荒。谁到那里去，没通知他，

他就开枪，就打。”杨成武略停，补充一句：“他老婆告诉我的。”

毛泽东淡淡一笑，抬起一根手指：“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

杨成武说：“我去吧？”

毛泽东将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

张春桥下意识地托托鼻子上的眼镜架，眼睛眨一眨，没作声。

毛泽东又转向杨成武：“你告诉安徽李德生，叫他准备顿饭。张春桥吃顿饭。你再准备两架飞机，先乘直升机到金家寨接许世友，接到合肥，再用大飞机接到上海。你告诉许世友，是杨成武派直升机去接，不然他会打。”

杨成武点头：“明白。”

毛泽东指张春桥：“这件事马上办，今天把他接来上海。”

张春桥起身走了。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许世友反张春桥，张春桥反许世友。只能张去接许。”

杨成武点头：“明白了。”

“你去打电话吧。”毛泽东端起茶杯，杨成武等人都退出了客厅。

毛泽东开始自个儿踱步，开始想事情。

许世友这个人，厚重少文。他就是当个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不出多少“主义”。他跟了毛泽东，是司令，是开国功臣；他要是跟了宋江，至多不过是个鲁智深或李逵。这个人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色彩很深，不是取自书本，而是取之于民。规范他行为的准则，不能说没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色彩更浓的还是“忠孝节义”。

他不失鲁莽，又出自“敢死队”，是个真敢造反的人物。在延安他不是“造反”了吗？幸亏发现及时，调部队解决了。军事法庭上，他说想不通红军改“八路军”，说这是向国民党投降。毛泽东心里明白，其实与解决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路线问题有关系。许世友这样农民出身的武将，搞不清那么多“路线”，那么复杂的“思想”，他们朴拙而直观，看到的只是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

毛泽东保了许世友，亲自放他出来。从此，许世友对他忠心耿耿，他对许世友也格外偏爱。他在韶山挑粪种地时，看的书是《水浒》，那时至今，他一直偏爱李逵。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说彭德怀：“人民解放军如果跟你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许世友一听急了眼，轮他发言时，挥拳头跺脚，“娘卖×”也骂出来了。许多领导同志下来颇有微词，毕竟是这么严肃的中央会议。

但是，毛泽东恰恰喜欢许世友这一条。他不让毛泽东上山打游击，他要带兵跟彭德怀干。

1965年10月在杭州，毛泽东问：“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么多军区领导人，只有许世友一听就跳起来：“谁敢反对毛主席，我就发兵到北京去！”也许他根本说不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

这次文化大革命，带兵跑大别山搞“军事割据”的也唯有许世友一个人。确实有勇气，不惜命。

陈再道在武汉干的事情如果换成王任重或其他同样干部，那简直得“死”两遍。但陈再道一遍也不用“死”。

许世友干的事情换任何人头上，也早就“死有余辜”，但许世友不会有事。毛泽东了解许世友，他反天反地也不会反主席。何况，许世友这种人，真造反也反不出什么名堂。因为他

自己也从不知道自己会搞成什么名堂？他最多不过是为了自保，不让别人去搞他。

但是，处理得不好也麻烦。他这一挑头，如果有人效仿，那就不是一个陈胜、吴广，很可能出来刘邦、项羽式的人物……

怎么解决许世友和南京的问题？许世友这种人似乎生来就是与那些红卫兵小将，与“造反派”们对立的，已经发展成这样严重，再让他回头不大可能。

许世友是一个人，却关系全局；

南京造反派虽然几十万，也只是一个局部……

“看来，要委屈张春桥了……”毛泽东在心里说。

许世友当天到上海，第二天去晋见毛泽东。

在杨成武处聚齐，顺长廊走向毛泽东的客厅。

张春桥板着脸孔，一声不响。他只能支持造反派，他也知道打不倒许世友，他也跟许世友讲不清“理”。

从北京赶来的姚文元紧跟张春桥，更无话可讲。许世友眼里根本没有他。

只有杨成武超脱，轻松地在前引路。

推开客厅门，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

毛泽东慌从沙发里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他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许世友兀自用衣袖抹着泪，哭道：“主席，你知道，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

其他人见此情景，都自觉退出门外。

时间不长，（跟许世友谈话也无须时间长，）那扇门已经打开。许世友一脸精神地走出来，打赢官司一般。首先奔到杨成武跟前，灿然道：

“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他拉拉杨成武的手，“老杨啊，送你！”

“谢谢，”杨成武见他那一脸憨态，笑着连连点头：“谢谢了。”

却不料，许世友一扭身，朝张春桥、姚文元逼过去，小胡萝卜粗的指头直朝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鼻子戳去：“我打一只兔子送你们两个！”

杨成武赶快拉住许世友：“哎哎，得了得了。老许啊，咱们喝酒去！”

杨成武硬拖走了许世友。多少年后，他对笔者回忆说：“许世友就是这么个人，我怕他再说出什么难听的，闹出事来不好。”

三 “王八七”要消睡

公元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龙颜震怒了。

毛泽东坐于宽大的办公桌前，陷于弥漫的烟雾中。桌案上文件堆起三叠，面前还摊开着几份，看过而未作批示。那全是有关军队有关大局的文件材料。

他看到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他看过了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

他们是决心要打这个“第三次战役”呵！……

毛泽东思千想万，瞻前顾后，权衡统筹，决心渐渐形成，正准备“再看看”便作出决断之际，随手又拿过一份文件，却不料是红色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身体猛然一震，夹了香烟的手竟然颤抖起来。他的目光开始变暗淡，对着那一纸红字出神似地愣有片刻，突然抬起来，用高亮的声音冲秘书喊出一嗓子：“叫杨成武来！”

徐秘书吓了一跳。愣有 3 秒钟，转身流水也似地奔出去叫人。

“主席没说什么事？”杨成武忐忑地问。

“没说。看着看着文件就发脾气了。”

会不会因为那篇文章？……杨成武心里暗自嘀咕。

杨成武离京后，林彪宣布的军委办事组开会，下达一项任务。要求三总部和各军兵种、各单位都要写篇有份量有感情的文章，歌颂毛主席，批判“刘、邓、陶”，批判“彭罗陆杨”。

三总部，总参为先。文章当然也得更有份量和感情。为此专门集中一批小秀才，组成写作班子，群策群力，费尽心智，总算写出一篇不同凡响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文章写好后，总参两位副书记李天佑和王新亭主持讨论三四次。因为杨成武不在家，没有参加讨论，便送来上海请杨成武审阅。

文章是以“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写来送审。杨成武看过几遍，拿不定主意。因为文章里满篇马、恩、列斯讲的话，又有许多理论问题，这些无产阶级导师和领袖们的话，许多内容杨成武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实在当不了审批者。为难之际，灵机一动：主席就在旁边，为啥不送主席看一下？

于是，杨成武在文章上批下几行字：

“主席：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写了一篇文章，送到我

这里。现呈上主席，请主席有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批后，杨成武找到那位玲珑秀丽的护士长吴旭君：“小吴，这个文件你帮我交给主席，是总参革命派写的，我拿不准，帮我听听主席的意见。”

“行。”吴旭君拿上文稿就进了主席办公室。

两天过去了，估计主席也该看完了，莫非文章有什么问题？……

杨成武满腹狐疑地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屋子里烟雾腾腾，毛泽东正在桌案前一口接一口地吞咽。

“主席！”杨成武敬礼，然后轻步走到办公桌旁。

“这件事你知道吗？”毛泽东随手将两页纸扬起，目光却盯着那本《红旗》上的社论。

杨成武松口气，他送呈的文稿很厚，显然毛泽东动怒另有原因。他忙接过来看看，不觉也皱紧了眉头。

这是一封告状信，告一位上将军，而这位将军又是毛泽东十分欣赏并表扬过的将军。

“揪军内一小撮”，这位将军也受了冲击，被抄了家。毛泽东，周恩来及有的老帅也都保他，让他住到了西山。西山还住着老帅，一家一幢小楼，每幢小楼都配有一名女服务员。这位将军住在山上闲得慌，去看望聂帅，想聊聊天。去之后，聂帅不在家，只有女服务员。这位将军一时忘乎所以，把那个女服务员欺侮了。

聂帅是保他的人，没想到发生这么大事，闻讯后当即气得心脏病发作，送进医院。而那位女服务员，用血写了这封告状信，求毛主席为她作主申冤，从机要线将书送达毛泽东的桌案上。

“有无此事？”毛泽东抬头望住杨成武，目光严厉。

“我不知道此事，”杨成武将血书还给毛泽东。“我不在北京。”

毛泽东一掌拍在那血书上，大声说：“××啊××、××！你是扶不起的天子，扶不起的阿斗，稀泥抹不上篱笆墙啊！”

“文化大革命”中，有这么三句充满浓厚湖南韵味的话，那位将军就注定保不住而被打倒了。

毛泽东两手撑案，起身踱步到窗前，向着静谧的小院，向着天际的悠悠白云凝望片刻。

“看来啊，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还不行。弄一部《西厢记》唱到老，明年也不得收尾。”毛泽东叹一声：“黄牌不行还得红牌哟！”

他转身走向办公桌前，俯身最后望望那些文件资料，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三个大字：“大毒草”！

接着，他坐下来，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理整齐，从第一份文件翻起，逐条审阅，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笔下稍一停顿，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

叶群是个精力体力都旺盛的人，历来行色匆匆，带风带雨。这一次却悄无声息地回到毛家湾，关严自己房间的门。

她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叠文件，朝毛泽东的批示上最后凝望片刻：“不用。退林彪。”虽是8月天，她也生几分寒意；她的皮肤很白，但汗毛孔较粗，心有寒意时汗毛孔尤其显著。”

象这样干脆拒绝，毫不客气地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于是，这几份文件在手里就沉重得托不住。叶群抿抿嘴，忙将文件放入保险柜，锁起来了。

她打开屋门，吩咐工作人员：“你去他们秘书那里看看，老虎在不在？叫他来一下。”

“老虎”是林彪独子林立果的小名，现在是空军党办副主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他组织几个人以“红尖兵”的笔名，写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现在火有可能烧到身上，叶群要赶紧避火。

“你给江青写封信，要赶紧写。说明‘红尖兵’那篇文章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文没有，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林立果并不正面望母亲，而是斜着眼看。他的性格象父亲，又与母亲关系不太好，冷冷地不作声。

“哎呀，我告诉你吧，一组发火了，批了‘不用’，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叶群加了一点强迫的口气：“你要马上写，小事不谨慎就可能出大事，这是政治！”

林立果漫应一声“知道了。”洋洋而去。

叶群似乎懂一些政治。她多次公开讲：“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我紧跟江青。”

作为女人，她更懂得女人。她明白王光美的教训。江青在清华大学批王光美，说什么？说王光美随刘少奇出国访问不听她江青招呼，戴了项链。江青多少年不出头露面，王光美出头露面了，这是最大的罪过。因为女人没有不嫉妒的。在这个问题上，女人、夫人可以不尊重周恩来，不能不尊重江青。

这是叶群“女人政治”的一条原则。比如这之后不久，国庆节前夕，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来访，按定好的计划，叶群被列于迎宾的国家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叶群驱车赶到首都机场，一见江青没来参加，立刻引退，向周恩来告假。周恩来说：“你不能走。”叶群说：“江青没来，我一个人感到孤单。”周恩来说：“这算什么理由？客人马上就到，你又提前退出，

外交上太失礼。”叶群不再作声，见周恩来率大家上机场，趁乱偷偷溜走了。”

到家后，张云生等几位“林办”的秘书说她这样做是对总理的不尊重。叶群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不懂。总理考虑的是外交礼仪，但我考虑的是中国政治；礼仪怎么能比政治的份量！”

她差点没说出来的是：王光美就是讲国家礼仪忘记了中国政治的特色和份量。我怎么能甩开江青去出风头？

钓鱼台也乱了。

《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卷首上的“大毒草”三个字，令昔日的“亲密战友”们起了内哄。互相咬起来。

这也是“中国文人政治”的特色吧？几千年来，中国的秀才们不讲全部，至少是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特色：干大事则惜命，见小利则忘义；胜则争功狂傲，败则推诿沮丧。

毛泽东的批示一下，先是 11 号楼的江青跑到康生的 8 号楼，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然后开始抱怨陈伯达，推到陈伯达身上：

“《红旗》是陈伯达管的。”康生冷冷说。

“这事只能怪老夫子，书生气，书呆子。”江青历来善于埋怨推诿，“《红旗》那两篇社论都是他负责签发的，反正没找我签。找你了么？”

“我根本不知道。”康生一句就推个干净。

“主要责任就在陈伯达身上！”江青越说越怨气冲天。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埋怨就能解决。上海又传话来，毛泽东要追究责任，要查来龙去脉。

“11 楼”、“8 楼”，还有“15 楼”的陈伯达，匆匆集中到

了“16楼”，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在这里办公。

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红旗》总编；不能不讲话，不能不先讲话。

若是粗人谈这件事，可能会说：“娘卖×的，文章是我签发的。可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是一片好心……”

陈伯达不会这样。他扶扶眼镜，慢条斯理说：

“武汉出事后，林副主席在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春桥、文元、关锋、戚本禹，说到‘带枪的刘邓路线’，说‘今后就寄希望于你们了’。7月22日林副主席召集咱们文革全体成员开会，谢富治、王力也都回来了，参加了，确定‘七二〇’是第二个步骤里的一项内容，对吧？从7月26日到28日，3天时间，仅《人民日报》就发表、转载了22篇社论，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吧？文章大家都看过……”

“我没看。”江青很敏感，忙摆脱：“你们知道，我忙得很呢……”

“至少没有送给我看，否则也不会闹成这样。”康生冷冷声明。

陈伯达将圆而小的手摆一下，不慌不忙接着讲：“各报刊都要声讨‘七二〇事件’，这是没错的，开百万人欢迎大会错了吗？支持武汉造反派错了吗？都没错。问题是《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是王力改定的，对不对？……”

“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急了，嗓门很大，“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是文章里本来有的……”

“哎哎，康老，当初研究‘七二〇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关锋叫起来。

“请示我什么？”康生始终面孔冷峻，令人望而生畏。

“你，你说你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请示了主席。你不是说主席同意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我根本没说。”康生面无表情变化，好象是在讲一个无须证明的“普遍都知，共同遵守”的公理。“我在请示毛主席时，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哎……”关锋一下子立起身，去看王力。因为当时王力在场，康生是回答王力提问时讲的，中央文革其他人也都在场。

可是，王力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

康生继续讲他的“公理”，声调毫无起伏，象宣布尽人皆知的事实：“‘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责任在王力和关锋，你们要对此有个认识，作出深刻检查。”

陈伯达松口气，忙取手绢擦汗。

王力、关锋相视一眼，再不作一声。

高大的屏风上是烫金的毛泽东手迹：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镞。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林彪面对这首高大屏风伫立已有十几分钟，无声无息。那屏风象个巨人带着奚落的神情在对他说什么，言语中的意思都在词文里充分表达。

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当上接班人，也许是从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发表那篇关于政变的‘五一八讲话’之后就有了？总之，过去没有。毛泽东写这首词时没有，甚至在他坚持要打倒罗瑞卿时也没有。

过去，他看到这首词有一种激昂，感觉同仇敌忾；现在，看到这首词有一种莫名的不自在，感觉似“周公恐惧流言日”，

更象“王莽谦恭未篡时”，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人哪，位置越高，欲望越大；心鬼越多，恐惧越甚！古来位尊俸厚而挟重器多者，近祸及身，远祸及其子孙，必不善。

林彪忽然想到儿子也牵入进来，不由地一颤，回头望望。

西大厅长 50 米，宽 25 米，长度两端各有一门，门前各竖一高大屏风；大厅里空寂昏暗，鬼影也没一个。他还是疑心，低下头踱步，先绕“满江江”的屏风走一圈，再向对面“孔雀开屏”的屏风踱去。

“蚍蜉撼树谈何易”是说谁？说我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又是说谁？当然是说他自己……

林彪环绕“孔雀开屏”也踱一圈，确实没人，鬼影也没一个。他立在“孔雀开屏”前出神。

他已经是十二分谨慎。除了自己一定要做的事情，其他天大的事他也“不吭声”、“不表态”。能养病时他尽量养病；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他都基本不参加，不去抓权，都是周恩来大权在握，更不要说国务院及各省市。甚至中央军委的事情，大事也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周恩来在那里具体抓……

二十多年后，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责问我为什么又给叶剑英发文件？我说请示总理了。他就不再吭声。林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林彪的秘书们也曾感叹林彪的“不吭声，不表态。”比如红卫兵冲国防部，秘书回忆当时情景道：

“啊，冲国防部了？”林彪显得有些惊讶的样子……我开始向林彪报告国防部受到冲击的情况……说

他们希望得到林副主席的指示……“我没什么，让他们去处理吧！”林彪又想不吭声，不表态。

比如新疆石河子发生“造反派”与部队的武装冲突，死伤很大。秘书回忆说：

我把石河子事件的情况和两种对立的看法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听后未置可否，只是问了一句：“这个情况主席知道吗？”

又比如青海发生开枪事件，秘书回忆说：

林彪听讲这些情况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事……

甚至发生“怀仁堂事件”，即所谓谭震林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被称之为“二月逆流”这件大事，秘书们回忆林彪当时的情景，也仍然是“态度漠然未理”。直到毛泽东说话，他才吭声。

有一段叶群打给“林办”秘书们的电话记录，从中很能说明林彪的“不吭声”，连“中央文革”都看不下去了。

我现在在钓鱼台，正在和8楼、11楼商量一件大事……你快去向首长报告一下：最近，总理向主席建议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之后，总理才把这件事报首长。这样做，就把首长架空了。首长是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防部长，军内要召开这样大的会议，为什么不先经首长同意后再找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先报主席，后报首长，那还行吗？所以康老说，此例不可开。11楼也同意康老的看法，认为这很危险。这个事，首先应有个态度。文革都在支持他，他不能老是不吭声。你快去报，我在康老这等着。

据秘书回忆，当他把这个电话告诉林彪时，林彪的反应只是“用不大耐烦的口气命令说：‘你告诉叶群，叫她马上回来！’”

林彪除了睡觉，没有不想事的时候。却极少吭声，极少表态。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下，那是电石火花，随即习惯地掏出笔和一方纸片，然写下四句诗。这四句诗在他摔死后，曾作为罪证材料向全国公布：

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林彪朝这方纸片凝望片刻，收进上衣袋，离开“孔雀屏”，继续在西大厅里踱步，继续想心事。

就在这次“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的军级干部会议上，叶剑英请毛泽东和林彪到会讲话，毛泽东说不想讲了，请林彪讲吧。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名言；提出军队只能“支左”而不能“支右”，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些讲话毛泽东不是都赞同吗？指示把讲话

录音大量复制，发给全军全国各地播放……

既然毛泽东讲了“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么由此提出“军内一小撮”不是必然的吗？……

林彪脑中又闪了一下，马上抓住这电石火花，掏出一方纸片，写下后来成为罪证的一句话：他先制造一个你讲的话，然后他再批判你。

林彪的手指从谢顶的头皮上轻轻抓过。“用你的话，办我的事”，同时又不要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和警惕，最重要的就是摸清毛泽东的全部想法和打算。

可是，他的老部下杨成武和他不是一条心。

“他封锁我！”林彪心里腾起一股怒气。据吴法宪和邱会作报告，杨成武带了“最高指示”，中午12点45分第三次返京，落在西郊机场，马上就赶去钓鱼台见周恩来，根本不来向他报告，向他通气……

“这个人不能留在那个位置上。总参谋长，这是至关重要的位置，必须派可靠的人去……”林彪暗暗定下决心。

1967年8月25日凌晨1点，钓鱼台5号楼。

杨成武将记录交给周恩来过目，上面有周恩来对16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

周恩来一条条认真看去，看到最后一页，他的目光停住不动了，眉宇间透出一种严肃思考的神情。

杨成武的这段记录是：

外交部明天小批判，后天大批判。要陈毅请假、检讨。副部长留用检查，将来实现三结合。王力给外交部的谈话及一封信有些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造词

有些问题。占外交部的事，火烧英代办处，连锁反映到外贸部、其他部。对外是一致的说法。

耽心连锁反映（应），现在一个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一个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

这个记录虽然简单，包含的内容却很多，因为周恩来讲了很多。他相信杨成武会根据这个记录将他讲的话原原本本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去。

“成武啊，”周恩来轻叫一声，抬起眼望住杨成武。他没有马上讲下去，目光里闪烁着某种隐忧。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陈毅的权，王力在八月七日去外交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说了许多攻击陈毅的话。话里有话，明眼人不难看出矛头是暗暗指向周恩来。这就使周恩来表态更须慎重。事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行，因为在王力“八·七讲话”影响下，国务院各部都发生了造反派冲砸、夺取之风，何况造反派火烧英代办处，已造成巨大国际影响，要是没个说法，以后不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大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毛泽东表态……

“总理，还有什么话要我转达？”杨成武很少见周恩来这样犹豫、慎重。

“外交部王力‘八·七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不要露任何个人看法，就客观如实地反应情况，请主席指示。”周恩来将一包文件交给他。

“明白。”杨成武点头，郑重接过那包沉甸甸的文件。

“那好，你去休息一下，天亮就飞上海。”周恩来立起身，送杨成武。在门口握住他的手：“记住，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

“放心吧，总理。”杨成武用力握了握周恩来的手。

“哦，还有件大事，我处理不了，你要马上报告主席。”周恩来不等杨成武抽出手去，又朝自己怀里拉过来，“红卫兵包围中南海的事件你也知道了，已经闹了很久，大喇叭每天对着中南海喊，就是要揪斗刘少奇，逼我表态。他们搞的‘揪刘火线’，主席不在，我不好处理……”

“总理，主席讲过一次，绝对不许批斗刘少奇，二百人批斗也不许。”

“你把这里的情况再讲讲。”周恩来心事重重地压低声，“可能有人煽动。你跟主席的汇报，一定要准确、客观，不能掺任何评论性的话，特别是王力的事……”

杨成武完全明白周恩来的难处。王力的事实上是中央文革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大局，所以周恩来再三再四叮嘱。

1967年8月25日上午9点，杨成武飞返上海。

他径直去见毛泽东。走进客厅前，下意识地挺一挺肩，仿佛重负在身。在那个非常时期，他的每句话都关系重大，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仍是埋在文件中。能不能控制住运动局势，能不能一如所愿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在明年春天收尾，现在确实已到关键时刻。他可能正在为温州、抚州的动枪动炮伤脑筋？也许是为湖南、福建的抢枪，广东、广西的两派对立加剧而费心思？或许他正在思索东三省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

总之，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现在心里的大事太多，平时的大事现在都属排不上队的小事了。比如他送给毛泽东审阅的那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章，拖了3天，漫不经心地

退还了杨成武。

那是返京前，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来看杨成武，将3天前杨成武请她转呈主席的文章还给这位总参谋长：

“杨总长，主席要我送给你。”

杨成武接过那份文稿，卷首毛泽东 了一行字：

“我不看了，请伯达、文元酌处。”

吴旭君小声说：“主席翻了一下，没细看，文件太多。他说都是吹我的，我不看了，叫伯达、文元酌处吧。”

杨成武听过，也没当大事，就将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这篇文章，走机要线送回北京给陈伯达。他无论如何不曾想到，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这件过后就忘记了的小事，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会变成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成为他被打倒的罪名之一。

以后的事情以后说，1967年的夏天，毛泽东南巡云梦期间，天下大乱，这件事实在摆不到桌面上。杨成武现在所想，只是怎样向毛泽东报告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报告周恩来处理16省问题的想法和计划，特别是报告王力那篇“八·七讲话”。这都是关系运动和国家前途的大事。

“主席，”杨成武轻声报告，“我回来了。”

“噢，”毛泽东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望住杨成武，放下手里的笔，搓搓脸，立起身，向沙发走去，一边作手势，“坐下谈吧。”

杨成武与毛泽东又是隔了茶几而坐；茶几上两杯清茶，一听香烟。

杨成武拿出记录，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他讲得很慢，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评论，慢慢讲清每件事的由来、发展和现状。特别汇报了3件大事。即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造反派要

打倒陈毅，夺外交部和外贸部的权；造反派们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各大专院校组成“揪刘火线”，围攻中南海，要批斗刘少奇。

汇报中，杨成武将周恩来交给他的文件递给毛泽东，郑重道：“王力讲话在这里，总理亲手交我，让转达主席，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接过文件包，抽出里面的材料，并没马上看，嗓音略带沙哑地说“成武啊，你累了。你休息去吧，有什么事我再找你。”

20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说：“毛泽东听完我的全部汇报，只在最后讲了这么两句话，就让我走了。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让吴旭君把我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

无数星星闪着磷色的光辉，象眨动着的警醒目光，要穿透黑暗，窥测潜伏于树丛下和草丛中的秘密。暑气是在不知不觉中去失了威势，夜风已经挟了凉爽，梦游一样在黑暗中徜徉；惊动树叶发出沙沙吃语，又不时穿过纱窗，将那弥漫的烟雾吹散。

毛泽东站在窗前不知吸掉多少香烟，服务员只能说，那只大烟缸里烟头烟灰满溢，中间还冒起一个尖。

杨成武转达周恩来的两句话，时时在他耳畔响起：

“我耽心连锁反应。现在一个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一个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

毛泽东明白，文化大革命能不能照他的想法进行下去，能不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现在是关键时刻。天下大乱，党政机关瘫痪，解放军是剩下的唯一有组织纪律性的力量。如果乱了军队，那就不再是“乱了敌

人”，其后果将是从根本上“亡党亡国”。

现在的形势不能再放，必须收，而且要狠收一下。

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到如此程度，不下猛药，难以遏止。动谁？局部的人物不行，不足以震动全国，必须是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

王、关、戚这“小三”是足够影响、足够代表也足够活跃的了。早在 1967 年 1 月 10 日，王力、关锋就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七·二〇事件”中，王力又提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说陈再道“要变天”！8 月 1 日，王力、关锋在《红旗》发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8 月 7 日，王力又到外交部大讲“揪军内一小撮”。

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中央文革的日子可能要不好过几天。但是，敲山震虎，林彪便再不会讲“带枪的刘邓路线”，不会讲“把军内一小撮不好的人，揪出来统统烧掉”。这样还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对这位“最亲密的战友”未必不是好事……

“智伯欲割韩、赵、魏，到头来，三家分晋灭智氏。”毛泽东真想提醒那个“娃娃”，不要不相信这个道理。搞二方面军的人，搞四方面军的人，就是他所在的一方面军，也要闹什么一军团、三军团的矛盾；就是他任军团长的一军团，也要闹以人划线，讲究“听不听招呼”。这样个搞法怎么能长久？

毛泽东吐一口浓烟，沉重地摇摇头。

1967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 时，护士长吴旭君走进杨成武下榻的副楼。

“杨总长，主席请你去。”

杨成武抬眼就走。他早就在等候召唤。可是，吴旭君站在原地又讲话了。

“主席叫你备好返京的飞机，然后再去。”

杨成武立刻明白了什么，忙与机场联系。

备好飞机后，杨成武来到毛泽东的客厅。毛泽东已经坐在沙发里等候。他的眼睛又出现了缕缕红丝，但是面容平静得像一泓秋水。

客厅里转圈摆放的沙发，颇象颐年堂里的形式。毛泽东无言地朝茶几旁边的沙发示意，一种宁静、庄严的气氛顿时弥漫了整个客厅，使人不由得生出神圣和肃然之感。你说不清这种氛围、这种感觉是如何产生的，也许来自毛泽东那一瞥目光，一次缓慢而凝重的手式？

杨成武明白，他又将处身于中国政治斗争的重要位置，就象当年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虽然这一次无须枪林弹雨拚死搏杀，但他的一次联络，一个转达报告，便会发生震动全国影响全局的大事。他也明白，他现在所要做的事，没有刀光火影，却比刀光火影的风险更大。他坚信毛泽东的决策将是严厉而断然的，这个决策将由他来传达和执行。这一行动将打击林彪和江青两大政治势力，而他们不敢对毛泽东、周恩来反目时，必然将全部的愤怒和报复发泄到他杨成武身上。

不过，从“揭竿而起”那一天，杨成武就随时准备“马革裹尸”。夫人赵志珍常说他有三怕二不怕：怕老百姓受苦流泪，怕边防国防出什么纰漏，怕50年到100年中国超不过汉、唐盛世时在宇内所处的崇高地位。为此，他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人言否定，不怕喋血牺牲。

他在毛泽东身边坐下来。沙发之间的茶几有所变化，不象

平时摆有两个茶杯一听香烟，而是换成一叠白纸。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他吮吮下唇，继续说：“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毛泽东不慌不忙点一点头，始终望着杨成武，音调平和：“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关有活动，活动总要活动的……”

毛泽东将目光转向前方，凝视着空中某一点，略作沉吟，手指轻轻敲在茶几的白纸上：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其实，杨成武一直在记。毛泽东每次提醒这句时，表示重要，表示记录须一字不差。

“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客厅里静有几秒钟，点点头：“就这样。你回去，叫总理马上办。”

“是，主席。”杨成武立起身，内心激动，表情却冷静庄严。”

“只同总理一个人讲。”毛泽东强调。

“是，主席。”杨成武明白，真正的重大决策，毛泽东都是只同周恩来商议决定和执行，对林彪及中央文革并不完全相信，更不会完全放手。

杨成武敬礼，退出客厅。回到房间，他立刻通知工作人员，准备返京。此时，吴旭君又进来了。

“杨总长，主席叫你再去一下，还有事。”

杨成武匆匆返回毛泽东的客厅，毛泽东仍然坐在原来的沙

发上没有动，吸着香烟，作个手式。

杨成武重新坐下，重新拿起纸和笔。

“我又考虑……”毛泽东始终是若有所思的神情，缓慢道：“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3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怎么处理，由总理决定。”

杨成武记录完，检查一遍，交给毛泽东：“你看看，对不对？”

毛泽东认真看一遍，将“狠狠地批”用笔描清描重，然后点头：“对，就这样。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一个钟头之后。”

“马上去办吧。”毛泽东将记录还给了杨成武。

中午12点40分，杨成武降落北京西郊机场，立刻赶往中南海西花厅。

杨成武进门时，周恩来正围绕办公桌团团踱步。

“总理，”杨成武敬礼，“我回来了。”

“哎呀，成武，我正等得急呢。国务院各部告急，特别是外交部、外贸部，就等你带回上海的消息。”

“我带来了主席的指示。”杨成武在周恩来面前丝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从文件包里取记录纸。

“你走后，我时时盼主席消息。”周恩来的神情简直有点象迫不及待的孩子等待盼望中的礼品，“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

杨成武取出记录纸，一字不加，一字不减地念一遍，而后将记录呈交周恩来。周恩来的目光匆匆扫过字里行间，然后左

手捧记录纸，右掌在上轻拍一下：

“好！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全部到齐了。这样的“碰头”也有几十次，可能是冥冥之中的预感作祟？这一次的情形与原先已经很不同。原先中央文革里“民主空气”很浓，“大三”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破口大骂。江青曾经把陈伯达那身军装上的领章一把撕下来，讥嘲道：“你算个什么东西，还穿着军装！”陈伯达气得脸青，气得哆嗦，笨嘴拙舌地回击：“我瞧不起你！你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江青象所有任性而又不无顾忌的女人吵架时所表现的那样反唇相讥：“我也瞧不起你！”一语未落，拔腿脱离“战场”，走到门口，又回头多说一句：“我就是瞧不起你！”陈伯达嘴笨，张了几张才喊出声，好象最后多说一句谁就占了便宜，谁就是胜利者一样：“不是毛主席，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

这件事发生在半年前毛泽东主持的一次碰头会上，发生在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一般人很难想象这样最上层的“民主气氛”。笔者当年曾见识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处理青海、云南和内蒙古问题的场面，那种争吵与脾气大发，令我这位21岁的青年瞪目结舌，梦里幻中一般。至于中央文革里的“小三”，更是个个“年轻气盛”，“指点江山”，“粪土当年老革命”，就连那位老夫子陈伯达，也多次被气得一脸苍白，甚至跑去向叶群哭诉……

这次“碰头”没了那种“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只剩了紧张严肃；整个会议室静得只有心跳声；转圈摆放的沙发里，闪烁着半圈狐疑鼠惧的目光，互相探索一下，又小心翼翼地朝向周恩来和杨成武。

“吭，”周恩来轻咳一声，就象在每个人心弦上拨了一指头，几乎一致地挺了挺身，看着周恩来把两张纸拿出来放到面前。

“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周恩来容色冷峻，是过去这种“碰头会”上所没有过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中央文革所有人都大为惊骇，身体起了一阵大震动前的那种小颤抖；四名卫兵已经出现在会议室，朝着“小三”们走来；王力、关锋眨动着眼睛，终于从这离奇恶运的冲击下醒来，脸色苍白地垂下头，仿佛乌云满天，知道躲不过这雷电交作了。戚本禹似有不甘，惊惶地左顾右盼，找到江青。正要朝着她求救，却听周恩来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毛主席又说，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批，要批透……”

戚本禹脸色苍白，抖个不住，但不再作声，默默垂下头，听到王力、关锋被卫兵逮捕，离开会议室而去。

王力在门口停了停，转回身，从两名卫兵的间隙里朝着昔日“指点江山”，“粪土当年老革命”的“碰头会”投去最后一瞥，目光里竟流出一缕凄凉自嘲的苦笑，下意识地叹口气，猛然回身，走向前程未卜的门外……

二十年后，杨成武向笔者回忆这件事时，还讲了对戚本禹最后的处理情况。

周恩来宣布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王力、关锋当时就被卫兵逮捕，押出会议室。然后，开始“狠狠批”戚本禹……

批判告一段时，周恩来很严厉地说：“今天没处

理你，就看你能不能改正。能改正，就继续工作，不能改正，就严肃处理。”

戚本禹胆儿小。这种秀才骂起别人时，很尖刻阴损，得势时猖狂得不行，好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英雄，稍一轮到自己，立刻吓跪倒了，哆嗦个没完，一副可怜相，总想对所有人求饶的那么一副可怜相。总理讲过话，他一个劲点头说：“要改，要改，我一定努力改。”

这种人要改也难，他不敢不听江青，不敢不听中央文革“大三”的话；中央文革不可能不干坏事，戚本禹也不可能改，到了1968年2月，他还是被抓起来了。

那次也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没叫戚本禹参加。毛主席说：“我讲戚本禹是改不了的。过去我们想分化他一个，争取他一个，希望他改，他改不了。所以请总理把他立即处理，象王力、关锋一样处理。”

毛泽东讲过以后，周恩来当即在怀仁堂西厅召开会议，商量由谁去逮捕戚本禹。戚本禹当时被传到了怀仁堂的东厅，不在会场。

康生冷冷地看一眼陈伯达，说：“我看就请陈伯达同志去吧。”

陈伯达脑袋动了动，望着康生没作声。周恩来说：“陈伯达不行。”

陈伯达说：“还是请康老去吧？姚文元也去。”

周恩来说：“不行。他们去都不合适。叫杨成武去，顶多加个姚文元。”

其实，周恩来在怀仁堂休息处早已同毛泽东研究过，认为康、陈、姚与戚本禹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不适合。

于是，根据总理的决定，我和姚文元去了东厅。由我宣读命令，姚文元站在我后面一直没吱声。

我说：“戚本禹，上次主席叫分化你，争取你，但你一直没改正。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我宣布：立即逮捕你！”

从我一进东厅，戚本禹就吓得脸煞白，全身抽缩。我开始宣读命令时，他就抖个不停，想哭，一种不知所措的惊慌样。刚宣布完命令，两名卫兵已经抓住他，他大声朝西厅的方向叫喊：“江青啊，江青啊！江青同志啊！救我呀，救救我啊！……”

他就这么一路叫喊着被拖走了。同王力、关锋一样关进了秦城监狱。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聂帅、叶帅、陈帅、徐帅等老师，他们都很高兴，说：“总理做了件大好事，除了一个祸根，那些人也得老实几天了。”

“那些人”就是说中央文革的一帮子……

第五章 “不能再搞下去了！”

汉、唐两朝，繁荣强盛，世界各国无与匹敌。何故？承继了秦、隋两个朝代所创立的制度。

秦、隋两代都是结束中国割据局面，结束战乱，一统天下，创立新制的朝代；秦始皇和隋文帝均为中华民族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是世界公认的“影响和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伟人”。

可是，这两个伟人所创立的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朝代，都轰轰烈烈兴起，却又匆匆复亡而去。秦，三世而亡，不过 15 年；隋，三世而亡，不过 37 年。这又是为什么？

自古至今，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对此列举了许多原因，但归纳起来秦隋两代都犯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民不堪命”；过份使用民力，超出了国家和人民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极限。

秦修长城，隋凿运河，均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对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巨大贡献。

可是，历史功业煌煌乎大哉的秦始皇，在发 50 万民伏 30 万大兵去筑长城守长城的同时，又征调 150 万民伏去修造阿房宫和各地离宫 700 多处以及他的陵墓，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 2000 万人，服兵役和劳役的占 10% 以上，且都是青壮年，这

就必然造成田地荒芜，人民饥寒交迫，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隋文帝创科举制，未曾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的错误。但第二代君主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同时，在东都洛阳大修宫殿园苑，征发丁男每月多至 200 万人；为了游幸江南，从长安到江都修造离宫 40 多所，没几年就把隋文帝杨坚积蓄起来的国力挥霍殆尽，使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大隋朝很快就完结了……

“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冲着进门朝他走来的杨成武迎面甩去一句话。杨成武望着毛泽东稍怔，脑子马上又转动起来：这是毛泽东断然处理极“左”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用报纸上常讲的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8月26日，他返京协助周恩来逮捕了王力、关锋。但他心里明白，“小三”可以说是“主犯”，却称不上“首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都不事，甚至成了批判王、关、戚的英雄。根据他几十年的斗争经验，这一次的反极“左”，由于没触动“首犯”，很可能会引起新的事端。为了转移视线，“左”派们往往会制造借口，再来一次反右倾，中国政治不总是这样时左时右，“否定之否定”地走过来吗？各派政治力量却笃信“物极必反”，“30年河东变河西”的说法。

杨成武不由得替周恩来、替几位老帅耽忧，唯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会出一个“杨、余、傅事件”，没想到自己会首先变成“右倾翻案风”的代表。当然，这将是后话。

不过，在金风乍起，玉露生凉的9月初，毛泽东确实是有

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迫切感。他一连几天都讲了“不能再摘下去了”的话，讲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的话，讲了“开‘九大’”的话。

他虽然不断地讲“乱得好”，但心里一刻也没放松那根弦：凡事要有一个“度”，过度就会走向反面。南巡一路他仍然翻阅着“通鉴”这部大书，以史为镜。汉、唐沿用秦、隋制；秦、隋短促，汉、唐绵延。可见，非制度不好，“民不堪命”也。

大跃进，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结果是全国范围地饿死人。毛泽东虽然讲“大跃进好”，但他还是明智地悬崖勒马，结束“跃进”，并且带头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从而避免了危亡。

文化大革命，更是全民上阵，大批判，大辩论，直至……大战斗。这一次能勒住马吗？

自信不等于无忧。

一 “我垮台了你们要吃亏”

“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会不会象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

公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晚 10 点 30 分，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望着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三个人，象老师提问，又象学生请教。

三个人无语。不知是选择对答之词还是拿不定主意由谁先回答？

“从 1911 年到 1928 年，17 年的分裂。”毛泽东开始掰指头：“无非是象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当总统，张

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毛泽东数到蒋介石时，将掰下的五根指头一齐张开，“从蒋介石开始统一，但也并没有完全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三马，云南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们议议，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三人议论天下大势，少不得引经据典、博引旁征，比较条件，分析民情，综合国情，很快拉出5条理由，认为现在的情况，分裂的可能性不大。

张春桥说：“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国人民，把各派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听议论，听到这里，点点头又摇摇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我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你们将来要吃亏的。你们讲毛泽东，我垮台了，你们要吃亏的……”

杨成武肯定地说：“主席垮不了台。”

毛泽东微微一笑：“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毛泽东仰面天花板上的某一点，仿佛是在追忆他当教书匠时的生活。他多次讲过，“我没想到自己会当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那时不过是想当个教书匠。形势发展走到这一步，当初并没想到。”这大约就是偶然性吧？毛泽东重新望住三人，吁口气说：“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

毛泽东所说林彪讲话，是林彪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以及连升三级、担任了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时的讲话。林彪讲话强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靠两条：第一条就如张春桥所

说，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毛泽东断言：“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杨成武说：“人民要求统一，不要分裂。18年来祖国的统一人民是高兴的。谁搞分裂，谁就会被人民被历史所抛弃。”

“成武这条讲的好，”毛泽东满意地点头，“人民不喜欢分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是稳定的，是统一的。”杨成武继续讲第3条，“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主席‘四不’的指示办。”

“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军队还是好的。”毛泽东继而将话锋一转：“不能说都好，人武部和部分军分区，还有一些独立师就不大好。野战军队好。”

毛泽东又讲“军队不能说都好”，又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这里并不矛盾。因为讲话的范围对象不同，目的更不同。所以中国政界历来强调上下有别、内外有别，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余立金说第4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无奈地表示不满：“怎么最近又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群众大多数是好的，但红卫兵把干部揪多了。”

张春桥说第5条：“现在的情况和辛亥革命不一样，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没有地主资本家了。”

“对。”毛泽东首肯，“过去军阀混战，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个派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湖南的谭延闿就是代表大地主的……”

毛泽东讲了许多例子，象每次谈史一样，常常妙语联珠，讽喻迭出，可惜听者只剩倾倒，不曾记录下来，如今也回忆不

出了。记录纸上留下的只是：“讲了许多历史情况，我们都不熟悉。”

经过一番“务虚”的议论，毛泽东转向“务实”，又开始掰指头：

“天下大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七、八月份大进了一步。7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黑龙江省、北京市、山西省、青海省、山东省、上海市、贵州省。还有8个省的问题基本解决：河南、湖北、浙江、江西、内蒙、四川、甘肃。”毛泽东论天下大势，常喜欢用算帐的办法，算过省又算人口：“河南加上山东就有一亿多人口；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个省合起来又有一亿多人口，一亿多加一亿多就是两亿多人口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

毛泽东在拨弄“全国一盘棋”，那些可比西方各国大小的省市自治区在他手中象“棋子”一样把握着，他有这样一种权威、气魄和力量：“北方五个省：东三省和河北、天津。黑龙江虽然算好的，但内部还有点问题要解决；南方五个省：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如果解决了这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解决的方法，一个一个地解决。全国没有几个省么，七个八个加十个是二十五个，其中黑龙江是交叉的，总共是二十四省市。全国不过二十九个省市，就剩下新疆、西藏、宁夏、陕西、云南，何况宁夏和陕西问题已经不大。如果年底十个省完不成，搞九个也可以；九个完不成，搞八个七个也可以。”毛泽东说到这里，似乎看到大局已定，将手轻轻一拂：“没几个省市了嘛！”

不象诸葛亮定三分隆中决策那么精细具体，毛泽东轻描淡写掰几根指头，算几个加减法，天下大势就算论完了。他吸燃香烟，用漫谈的口气讲他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龙潜整得过份了！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

张春桥敏感地表白一句：“我已经把主席的指示告诉浙江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毛泽东继续讲：“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北京有的老师就喜欢骂人、训人，人家就找机会反你，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有机会就爆发了。过去罗瑞卿、刘亚楼锋芒毕露，盛气凌人，刘亚楼我就批评他几次。”毛泽东冲杨成武、余立金伸出一根指头：“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

杨成武笑着点头：“我们过去都有这个缺点，结果人家口服心不服。”

“是嘛！年轻时都有这个毛病，我拿棍子打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对我就口服心不服。”毛泽东转向张春桥：“你是不是好些？”

张春桥赧颜道：“我过去脾气也很大。”

杨成武说一句深刻话：“我们过去都有这个毛病，碰一碰钉子就好了。”

“我跟成武同感。”毛泽东连点三次头：“恐怕人都有这个毛病，碰一下钉子有好处。我要感谢四中全会让我碰了钉子，其实四中全会的决议比立三路线还左。”毛泽东冲杨成武摇晃手指：“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不要搞喷气式。总参是否也搞了点？”

杨成武说：“搞了点，还比较文明。”

“还文明呐？”毛泽东睁大眼笑起来。

杨成武也笑：“是相对群众组织而言。解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问题时，一条经验就是按主席指示的要先做好军队

内部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

“成武会讲话。你那里一讲，我这里就会想问题。”毛泽东不无赞赏地再次冲杨成武点头：“在武汉我们就有这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该找陈再道做工作，可是没有做。结果等到第五天才谈话，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陈再道3次站起来要走，以为我们要抓他。没有先做好部队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杨成武说：“春桥、文元到济南去做得比较好，先做好了部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转望张春桥：“是呀，我不是要你们到济南住到部队里吗？”

张春桥恭敬回答：“我们是住在军区八天时间，六天是做部队工作。”

“你到南京住在哪里？”

“也住在军区，时间比较短，许世友、杜平没有同我们说什么。”

“那是许世友不跟你谈嘛！”

张春桥一脸委屈：“杜平同志要我到军区党委扩大会去讲话，我要简报看，不给全份，只给了两期。”

毛泽东灿然一笑：“给你来个下马威呀！”

杨成武说：“有时秀才也很凶。”

毛泽东再次用赞赏的目光瞥一眼杨成武：“深刻。在武汉会议上，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

张春桥也瞟一眼杨成武，目光里流露的感情微妙复杂。他曾是杨成武的下级，抗战时很敬佩这位司令员不同一般将军，不但能打，而且懂政治。那时他距杨成武一大截距离，只能仰

视台上，现在他和杨成武分坐毛泽东左右，一旦对话，才明白什么叫文韬武略。言语中不显山不露水地就把自己意图表达出来并影响了毛泽东。他明白杨成武与自己不一致，却说不出口，何况毛泽东多次讲了与杨成武是一致的。他眨了眨眼，也含蓄地告一状军队：

“南京又给许世友贴大字报，不过内容全变了，说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许世友不知是否知道。”

果然，毛泽东讲话了：“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了。”

“北京也有这种情况，”杨成武讲话总是令张春桥头疼，“北师大还发声明，有些就是红卫兵自己搞的，未必都受人影响。”

“北师大那篇严正声明我看到了，第三条说林杰是坚定的左派，谁反对林杰，就是反革命。”毛泽东果然又讲了中央文革的人，“要给谭厚兰打个招呼。同红卫兵小将也要做工作，要告诉他们，现在如果不注意，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杨成武说：“有人总想做核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联合搞不好。”

“是呀，交大‘反到底’提出要以他为核心。”毛泽东将手画个圆：“什么核心？核心是在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王明、张闻天、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都不懂。”

毛泽东作个截止的手势：“总之，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我们在上海呆了近两个月，处理了武汉问题，抓了王关戚；处

理了温州、抚州、湘潭几处的武斗，找回一个许世友，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现在我们可以走走了。成武啊，你准备准备，我们该动了……”

二 从杭州到南昌

公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钱塘江闪着淡绿的光彩，在六和塔下象吹喇叭一样一气儿冲出杭州湾，汇入蓝色的东海。江北的笕桥机场，从清早便已戒严，近午时分，毛泽东的专列悄悄停在了这里。

“我还是去住王庄。”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口气带着一种请求。出门在外，他的行动不能由自己决定，而要听“护驾”的安排。

“不行，太乱。”杨成武一口回绝：“就在专列上吧，时间又不长。”

“唉，”毛泽东无奈地叹气，“王庄是个好地方哟。”

杨成武笑道：“下次再来，多住几天。”

中午11点整，杨成武带两名军人登上专列，走进毛泽东的客厅。

“主席，他们来了。”杨成武首先介绍那位穿绿裤子，脸颊瘦削，透一股精明干练劲的军人：“南萍同志，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主席！”南萍敬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仍然坐在沙发上，一边握手，一边打量南萍：“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毛泽东嘴角流出笑：“你就是南霁云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南萍知道毛泽东是说他处理温州武

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杨成武又介绍那位穿蓝裤子的中年军人：“这位是空5军政委陈励耘政委。”

“主席！”陈励耘敬礼，然后用双手去握毛泽东的手。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恭敬回答。

毛泽东作手势，叫南萍和陈励耘坐身边，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空5军和20军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毛泽东继续他刚才的话题，朝着刚刚坐下的陈励耘问：“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答。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毛泽东睁大眼睛表示“了不得”的神情，“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具有理由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没有。”南萍身体前倾，恭敬回答。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指点南萍，而后问陈励耘：“你

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声音很高，“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南萍解释，“派他们去主持温州。”

“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毛泽东听南萍汇报温州形势，说：“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对‘温联总’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对待‘温联总’。”

杨成武不失时机地点一句：“主席讲过，轮到造反派犯错误了，要警惕。”

毛泽东点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的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获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好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破坏了。”

杨成武已经吃透毛泽东的思想。他现在想的是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为此就必须反对极左，减少火药味，减少严肃紧张，增加团结活泼。但是，根据以往经验，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右”的倾向，很可能将形势一下子扭转，会刺激毛泽东从反左的方向停步甚至转向。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例子。当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提意见，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

机会主义”时，反“左”就一下子变成了反“右”。所以，杨成武极少直接讲反“左”，他只是讲客观存在的一些实情，毛泽东去自己作判断和决策。

反“左”只能由毛泽东自己去提出并作决断，不能由别人去喋喋不休。否则，将事与愿违。

“杭州也有标语要打倒南萍。”杨成武说。

“这个好。”毛泽东大声说。“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

这段话里有毛泽东一贯的哲学思想，也反应了他对两派群众的看法。群众都是水，无论哪派“水”，本质没区别；他是驾着革命航船的舵手。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从这点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审时度势，怎样逐浪弄潮，却是舵手英雄。有时他借助“造反”这股“水流”，但又不会让这股水流将舟随波而去，他心中那个目标时刻在眼前明光闪烁，他随时准备到“水流”不那么急的位置去，必要时还会远离这股“水流”……

接着，毛泽东又从他长期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经验，谈出他决策各部队调防的理由：“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杨成武关心一件事：“主席讲的南霁云搬兵是怎么回事？唐朝有个南霁云搬兵。有个叫张勋的被安乐生杀了，南霁云去搬兵报仇，搬不到兵就不走。他说，我城里老百姓没吃的，不发兵我也不走。”毛泽东再次望住南萍：“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

南萍赧颜道：“不知道。”

杨成武听毛泽东谈古论今，都作为一次学习机会。下来后翻阅《资治通鉴》，才知记录中“张勋”为唐肃宗时睢阳守将张巡之误。

张巡为“安史之乱”时，唐王朝的骁将、名将。率千余人的兵力数十次打败叛军数万大军的进攻，曾一昼夜杀死叛军一万余人，被肃宗下敕书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

杀死张巡的不是“安乐生”，而是叛军大将伊子奇。记录中的“安乐生”系叛军大将安乐忠之误，安乐忠曾大败名将郭子仪，却并不曾杀得张巡。

叛军大将伊子奇率大军围攻睢阳，张巡率兵三千人，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共六千人，抗击叛军十三万之众，大小四百多战，杀死叛军十二万多人。但叛军后援不绝，张巡却请不来一个援兵，断粮数月，将自己的爱妾也杀来分给将士们吃，吃尽城中一切可吃之物，战至最后四百人，饿昏之后才被俘就戮。临刑前，“颜色不乱，扬扬如常”。

南霁云系张巡麾下勇将，与张巡同时遇难。关于他突围搬兵一段，《通鉴》是这样记叙：

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六百人，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之……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霁云出城，贼众数万遮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贼众披靡，止亡两骑。既至临淮，见进明。进明曰“今日睢阳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曰“睢阳若陷，霁云请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明爱霁云勇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

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泣且语曰：“霁云来，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观睢阳陷没，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啮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往往为泣下。

霁云察进明终无出师意，遂去……

读史至此，杨成武方明笔录失误之多。“搬不到兵就不食”记成了“搬不到兵就不走”。

读史至此，方明白书生尚空谈，小说乱历史，安邦治国须读史的道理。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居安思危地说：“许世友不管有多大问题，要保。说他跟张国焘跑，张国焘是他的领导嘛！不跟他行吗？说他 39 年要杀我，根本就没有那回事。39 年他就到山东工作去了，这条罪状不成事实。第二条说，不打倒许世友苏浙皖就不能解放，我看不一定，打倒了也不一定苏浙皖就解放了。”

南萍说：“浙江现在主要是沿海的问题没有解决。温州、台州、舟山群岛。”

毛泽东更关心的不是一城一地，他继续自己的话题：“要保许世友，他打仗时候很凶，但单单一冲不行，要做政治家。我们军队大多数干部都是老粗，他们打倒了许世友，哪个来当司令员？要杜平来当司令员不行吧！这么多年他还当不了嘛。杜平这个人我认识，我熟悉这个人，是阿弥陀佛的人，优柔寡断。武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是许世友果断，错就错，对就对。”

杨成武又拿起毛泽东的话，每当他拿出毛泽东的话，总能引出毛泽东一番新议论，新“最高指示”。

“主席讲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一个同志犯错误，能帮一定要帮，红卫兵一风吹不好。”

毛泽东频频点头，又是一大番议论：“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矛盾的，统一还是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毛泽东对杨成武等人举起一根手指强调：“贺龙这个人恐怕还要选为中央委员，二方面军是个头子嘛。错误是严重的，只要他愿意改。邓和刘还是有区别嘛，要选中央委员。”

张春桥瞄一眼杨成武，他没想到杨成武看似随意的一句插话会引来这么一些“最高指示”。

“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62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跪、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是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毛泽东继

续评论干部，这种评论并非全面，只是即兴评点：“陈毅打过仗，但打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师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南萍和陈励耘听得发愣，许多事是他们这一级干部所从不知道的。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较久，听议论多，理解深，没有什么惊讶。杨成武和张春桥又不同，他们都明白毛泽东所讲对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具有何种意义和份量。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燃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最后几句话：

“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赞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不仅是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最后这段话，大概只有杨成武理解最深。毛泽东是很注意影响和代表性的。所以，有时小反革命要杀，大反革命却要刀下留人，甚至要特别养起来。这就是政治。

那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莫斯科回来，杨成武到山海关去迎接。专列驶动后，秘书叶子龙来请杨成武：“司令员，主席请你去谈谈。”

这次谈话是以聊天形式。毛泽东很高兴，天南地北聊了两个多小时。聊天中，毛泽东问：“你们华北部队，对使用傅作义系统的干部有意见。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和思想啊？”

“有。”杨成武点头，“不光华北有，西北和东北以及西南

的部队也都有。”

“什么意见？”

“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哈哈，”毛泽东大笑：“哪个讲的哟？具体点。”

“一军军长贺丙炎。说傅作义又升官又发财，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又什么水电部部长，老子革命一辈子，什么也没有。”

“这话怎么传的？”

“到处传的，不止一个人。”

“成武啊，你可要做工作，这是个大政策。”

“不那么好做呢，过去傅作义太猖狂。集宁战役没打好，聂老总叫我率3纵队，独1旅、2旅、4旅赶去张家口，保护中央局的退路。3纵政委胡耀邦，他看到敌人进张家口，一个劲哭……”

“胡耀邦还哭？”毛泽东睁大眼睛，“娃娃。”

“他就那种性格，爱哭、感情丰富，好事坏事动情就哭。”杨成武继续讲：“那时傅作义撒传单，叫主席毛润之，问：你是先生还是我是先生？说我们较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较量之后我输了，就叫你毛润之一声先生。现在我占了张家口，你输了一场，该叫我一声先生。如果你在全国输了，我就永不会叫你先生了。这些传单撒得满世界飘，他也太狂了。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对他印象极深，现在他彻底输了，反而受到重用，所以大家都有牢骚，说革命不如反革命……”

毛泽东不再笑，凝神默想片刻，慢条斯理地说：“成武同志，我们全国胜利了，就比方呢，我们建起了一座非常高大的非常雄伟的高楼大厦。这个高楼大厦里边非常宽敞亮堂，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你就要挂上一些字画，摆上一些古

董，养些漂亮的花。牡丹花、芍药花，各种花，不能空空如也。所以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派，特别是知名人士，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为建立起新中国就要享福，还要和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把中国从睡狮变成雄狮。”毛泽东轻挥手，脸上恢复了笑容：“你今天同我谈话谈得很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国家，不要那么简单，那么单调、清一色。你现在通不通？”

“通了。”

“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都是你的老对手，我讲的你真通了？”

“是真通了。”

“那好。你回去要向聂荣臻汇报，要开会，把我讲的都要传达。你还要在华北解放军报上发个社论，教育全军。”

“是，主席。”

此后，傅作义的嫡系部队，无论是天津还是新保安、张家口或者宣化，凡俘虏的全部释放。就连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也在1951年加以释放，不但放了，而且安排职务。比如傅作义的104军军长，安排为坦克军副军长，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董其武当了兵团司令，傅作义高兴；孙兰峰当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傅作义也高兴。

1955年，解放军授衔，董其武对杨成武讲：“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

杨成武忙赶去丰泽园，向毛泽东报告这件事，并将董其武的信呈上。毛泽东看过信后，缓缓道：“成武啊，你告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

要当上将。”

杨成武回来向董其武传达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小河一样淌下来，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哭出声。用杨成武回忆的话讲，是“哇哇地哭，哭得厉害。”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中防委员会会议，见到傅作义。

杨成武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傅作义激动地说：“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南萍、陈励耘已经辞去，专列驶离杭州，驶向江西南昌。杨成武望着车窗外飞速向后掠过的树木、房屋以及远处象缓慢旋转的绿色田野，内心酝酿着一种复杂情感。几分惆怅，几分振奋。

12年弹指一挥间，曾几何时，当年对待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政策，现在用到了贺龙、张闻天、陈毅这样一些老同志老共产党人身上，他们也需要用体现政策的方式才能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下决心要纠左，要制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要批判‘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毛泽东用有力的手势再次开始他的纠左讲话，“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

这是公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上午九点四十分。

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南昌的飞机场，车厢里坐着江西省的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穿着军装。

全国各地，军队都已成了“当局”。

“程世清，”毛泽东点名说：“你不要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号施令，你过去一直在26军当政委，你并不了解江西，不了解情况么。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加强调查研究。”

“是，主席。”程世清虽然坐着，也象立正敬礼一样挺挺胸。

“杨栋梁，”毛泽东又点第二个名，这都是十几分钟前杨成武向他介绍的人物，“你这个师过去在朝鲜战场打得好么。奇袭白虎团，机动灵活。要继续实事求是，要机动灵活。许多事不调查研究不行。总理讲抚州是军事叛乱，你们解决得好；不伤人，又解决问题。解决得好。”

毛泽东冲杨栋梁点点头，目光缓缓移动，停在陈昌奉脸上。对红军时期自己的这位警卫员说：“陈昌奉，你是江西人。你在江西也要很好地注意调查研究。因为你当兵，就是一个兵么，对地方情况，你并不是都了解。”

“是，主席！”这位当年的警卫员，今日的省军区副司令员也挺挺胸。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么！”毛泽东作个手势，再吸燃香烟，然后放缓声音：“过去我们多少山头，许多互相见面都没有见过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的好多根据地。在座的同志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的嘛！”毛泽东用夹了香烟的手指指杨成武：“你们的总长杨成

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认识的嘛，毛儿盖过草地前才熟。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哪一个为核心团结起来。”

毛泽东伸出两臂，作缓和安抚的手势：“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

毛泽东两手停止安抚动作，目光逐一扫过每个人的面孔，审视大家是否理解了他的想法和打算？

终于，他灿然一笑：“理解了就好。”

三 长沙—武汉—郑州

专列穿长沙城，过岳麓山，停在长沙南郊的大托铺。也许是故乡山水唤回美好的回忆？也许是西行一路，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毛泽东的情绪明显轻松起来，脸上时时浮显出和悦的笑容。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湖南省的“当局”黎源、华国锋、章伯森登上专列，晋见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正在与杨成武等人闲谈。杨成武说：“许多群众抢来枪，多数不是要打人。我的意见，所有民兵，抢枪的和没抢枪的都组织起来打一次靶，3发子弹，做工作，叫他们靶场上过过枪瘾，不要再乱打枪。”

“对，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笑着吮吮从下唇上溢出的唾水，望见了被侍卫引入的湖南省“当局”人物。毛泽东与他们要比对江西的干部略熟悉些，一边握手，一边随意问道：“有什么新闻啊？湖南形势怎么样？”

原47军军长黎原，现在提任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仍穿着军装，保持着军人那种雄壮威武的气度，干脆明了地汇报起

情况。谈到湘潭问题时，大概触发了毛泽东思乡之念。毛泽东将身体离开沙发靠背，一边朝黎原稍倾过身去，一边吸燃香烟。

“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黎原望望坐一边的华国锋，谨慎敦厚的华国锋少言寡语，只赞同地点点头。黎原接道：“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

他言外之意是善后工作不好做。

“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毛泽东和风细雨地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

“下边有些县城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华国锋插言。

毛泽东对县城似乎不大忧虑，不会影响大局，随口说道：“打一打也好，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有经验了，不会慌。”毛泽东望望杨成武：“是不是这样？”

在座的人，论直接带兵打仗，当然是杨成武最有发言权。他不无诙谐地说：“是这样的。我们闽西的农民部队刚改为红军3纵队时，兄弟部队送我们3句话：行军走不动，吃饭打冲锋，枪响发妖风。”

毛泽东开心大笑，杨成武边笑边说：

“第一次打长沙，撤退，经株洲、萍乡，我是在株洲，第一次见火车，冒里冒失爬上火车，结果在萍乡等好几天才等来部队。在株洲我第一次在夏天吃到冰块，才知道还有人造冰。第一次进饭馆，肖克、王良请我和刘亚楼吃顿饭，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顿饭；我和刘亚楼是新兵，太穷，肖克和王良是老兵，有几角钱，请我俩吃了这么一顿。过赣江，来了两只国民党的气筏子，一鸣笛，部队全惊散了，所以说‘发妖风’。以后到了文家市、浏阳，第二次打长沙，打个大胜仗，缴获了重机枪、花机关枪、轻机枪，我们3纵队才翻了

身。农民变成战士不容易。我这一生有不少‘第一次’是在湖南，所以对湖南感情深。还有几个第一次是在江西赣州，出不少洋样，见不少世面。第一次看电影是打下赣州城以后，没有声音，我已经是团政委，没看过电影。帝国主义的军舰夜里照探照灯，照到我们驻地，我派一个连去抓，抓几天没抓到，军长王良来了，才知道是探照灯，是军舰上的，抓不到。我第一次坐汽车是在赣州，第一次骑自行车也是在赣州，帽子被吹进龙江，裤子也扯破两块，总算学会了自行车，好开心哩。还有第一次见肉松，还以为是烟叶呢。见军长吃‘烟叶’，我吃惊：这东西你们还吃呀？军长王良也吃惊：这东西你们不吃呀？说来说去，说来说去才知道我又当了土包子。更糟糕的是刘亚楼请我和军长吃鸡，王军长吃完以后说：你这个鸡汤味道特别好。刘亚楼让卫兵把炖鸡的锅端上来，军长一看：你盛鸡汤这家伙是女孩子夜里用的磁尿盆。我哇地叫起来：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干净不干净就炖了鸡！王军长说：土里土气，你们干什么都不懂得，叫你也长点见识！”

杨成武讲得不紧不慢，大家的笑声却连续不断，一阵高过一阵。气氛难得地轻松活跃起来。

毛泽东不停地吮着笑出下唇的唾水，说：“农民进城，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钱，打死了作为安家费，没打死就白拿了，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和成武那个时候不一样。”

黎原说：“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向农村反过来进攻，打死几十个农民。农民就向城里边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农民并不总是保守。”毛泽东点头赞许。大约是受杨成武影响，也带了一种怀旧的神色，说：“有个肖佐如写了一本书，说跟我要过饭。他是同我一起要过饭，他会写字，他写了字，我拿去卖到教育局，又拿到一个庙里，一个地方得了两块钱；你不给我钱我就不走。然后有了两块钱在湖南就跑了一圈，搞调查研究。这个人后来偷了博物馆文物，跑到国外去当特务。”毛泽东讲着，将目光转向华国锋：“有一个毛怀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家乡作父母官，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说：“都还好。”

“毛新民一批都被杀了。”毛泽东开始谈他家乡的亲友，“韶山说都被保守派占了，如果占了，47军可以分几路打进去。姓毛的过去有48乡最能打仗，谁请他们去参加，一打就胜了。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父亲不得人心，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母亲说别埋在一起了，结果还是埋在一起了。有个土改，没有立碑写传……”

忠心耿耿的华国锋受毛泽东情结感染，小声说：“我们现在建立一个长沙小组来领导生产。”

毛泽东转向以敢字当头闻名的章伯森：“以后你反张平化，你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明白毛泽东是叫他当“工联”后台，说：“湘江风雷一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的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如张家政。”

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和长沙“湘江风雷”，

“文革”中是名噪全国的人数众多的群众组织，都在毛泽东南巡前后瓦解了。

黎原和华国锋同时讲：“‘九·五指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这段颇有些绕口令似的汇报，引来毛泽东一番感慨：

“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四十多天不敢拿枪。解放军不仅‘四不’，还有‘五不’呢！不敢拿枪呢！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华国锋说：“桂林、株洲，22个师支左支对了，另二个师支错了。衡阳以南的铁路已经通了。”

“浏阳现在有一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本来有几十个省级的干部。”黎原和章伯森汇报。

“他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毛泽东问华国锋：“农业生产怎么样？”

“农民照样作田。”华国锋回答，“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地委、县委级都瘫痪了，现在照样作田。”毛泽东不无欣慰，那种不安宁的激情便又昂扬起来：“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地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我就高兴！听说富治同志这次才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

理。”

“大多数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毛泽东虽然时时容易讲出过激的话，但始终不曾忘记此行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收，要安抚：“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黎原请示：“主席，我们每个军分区需要有一个营的兵力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现在分区都瘫痪了，想把两个工程兵团用来暂时担任湖南各分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好，同意。”毛泽东点头，再次讲他那每到一地都要讲的话来作为结束语：“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思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又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

黎原最后插话：“他们会造枪炮坦克等武器，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把手一挥，赞同也表示结束谈话：“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这次要在武汉住几天！”

专列由湘入鄂，毛泽东不乏意气地对杨成武大声说。

他大概想起两个月前离开武汉时的情景，那时简直像是天塌下来了，杨成武上前去顶，一路开道匆匆离开武汉。

“还住东湖梅岭 1 号！”毛泽东补充一句。

“可以。”杨成武同意，“政治形势基本已经稳定了。”

“我就怕四方面军出来，结果还是出了个陈再道。”

毛泽东将目光从车窗外转向杨成武：“你认识不认识曾思玉？”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原来在我们3团当青年干事，以后到一军团当侦察参谋，那时我们就相识。抗战时，他在晋察冀4纵队当副司令员。司令是陈正湘，政委是胡耀邦，副政委是王昭。那时我们已经熟悉。”

“这个人怎么样？”毛泽东关心这位新“诸侯”，这位林彪赏识并已谈过话的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曾这位同志很好。”杨成武换上严肃的神色严肃的声音：“打起仗来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太勇敢。有机会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他就决不放过，一心要打。我打仗时，最担心他太勇敢暴露了我整个的战略意图。”

“哈哈，”毛泽东开心一笑，“讲得好。”

“工作起来不怕他不积极，就怕他太积极。”杨成武讲第二条，“一个窗帘、沙发、桌子、茶杯他也管，管太细太多，下面有反映。”

“行啦，我了解这个人了。”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1967年9月19日，重返武汉的毛泽东又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

夕阳顺着斑驳的云排悄悄滑落。吃过“早饭”的毛泽东接见了吃过晚饭的曾思玉、刘丰等武汉军区新领导。

“形势怎么样啊？”毛泽东一边与新“诸侯”们握手，一边

习惯地问：“有什么新闻吗？”

新领导们汇报了武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听后，脸上一度有笑容，但那笑容很快便消失了，十分严肃告诫一句：“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新领导们为毛泽东声色的严肃震动。

“独立师的干部不要去揪，不要搞苦了。”毛泽东再次加重语气警告：“王力就是不听我们的话。”

客厅里出现片刻寂静，每个人都在品味其中的份量。是啊，王力那样炙手可烫不可一世的人物，多走一步也一样坠入深渊，何况在座的？

毛泽东知道他的话已起到该起的作用，便放缓语气，进一步讲明自己反复讲过的想法：“‘文革’搞一年多了，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左手，“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

“是。”杨成武点头。其实他至少已把这个话报告过总理3次了。

毛泽东将扬起的手蓦然挥下：“现在我很不喜欢四个伟大。”他吮吮下唇，“讨厌！”

客厅里又是久久一阵沉寂。“四个伟大”是林彪所提，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直接地将林彪所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毫不掩饰感情地斥为“讨厌”，表示“很不喜欢”。

至此，被接见的“诸侯”们才明白，所谓“最亲密的战友”也并非如他们一贯想像的那么“最亲密”。

“曾思玉同志，”毛泽东打破寂静，严肃紧张之后换上活泼的语气：“你知道你的老首长是怎么说你呢？”

曾思玉狐疑地望望杨成武，未敢作声。

“他说你呀，不怕你打仗不勇敢，就怕你太勇敢；不怕你工作不积极，就怕你太积极。”毛泽东的手指朝着曾思玉指点：“所以我讲了不少，叫你不要太积极，影响了整个战略意图。”

曾思玉嘿嘿笑，这段评价还是不小的褒奖。

杨成武慢条斯理讲：“曾思玉同志，我跟主席说过，你想从东北调批干部到武汉。你刚到武汉，对武汉干部情况不了解，调些人来是需要的，但调人多了来武汉，恐怕就会有副作用。你已经调好几个人来了，行了，不要多调了。虽然用着顺手，不一定好。”

“你的意见对。”毛泽东冲杨成武点头，“不调不行，调多也不行，副作用大。”

谈话气氛逐渐变轻松，最后变成聊天的形式。

曾思玉说：“武汉现在还有人打枪。”

杨成武说：“除北京、上海没发生抢枪，还有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基本上没有抢枪。其他地方程度不同地发生抢枪。还有打枪问题，听说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曾思玉附和：“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白天晚上总打枪，天天打，打得人心不安。结果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了，把他们带去打靶，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湖南也是这样，英雄所见略同，这是个好经验。”毛泽东

喝着茶水、又嚼嚼嘴里的茶叶，说：“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了靶再上交。”

不知不觉中，夜色已深。杨成武看看表，是晚 9 点。

毛泽东立起身，开始讲“总之”。讲“总之”就是要结束。“总之，干部问题，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批干部。干部有些是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如自首分子，投敌、脱党分子，叛变分子，三反分子，除了这些人以外，对广大干部要加以教育，组织他们集训，然后有的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毛泽东肩膀随着摆出的手一道用力：“不可不教而诛，当然教过之后就更不可诛。”

1967 年 9 月 21 日上午 8 时，毛泽东经过一夜工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满怀信心满有把握地说：

“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他向杨成武吩咐：“准备返京，布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实现‘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的设想。”

“什么时候走？”杨成武问。

“明天。”毛泽东交待：“在郑州停一天。”

第二天，9 月 22 日清晨，专列驶离武汉。

风驰电掣；天一步步高，云一路路远，秋色越走越浓，毛泽东收获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心情也一阵阵迫切。

“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毛泽东走一路，向杨成武讲一路。那种“决心结束运动”的神情给杨成武留下了深刻印象。“要成立个专门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不要搞清一色，陈毅这样的要选人政治

局，邓、贺、乌这样一些老人都要入中央委员会……”

不断地“吹风”，不断地“交底”，专列已经停靠在郑州火车站的一段道叉上。

刘建勋、张树之等河南领导奉召登上专列，挤进专列上毛泽东的“客厅”。那是个小包厢。

大名鼎鼎的刘建勋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能作到共产党的一位省委第一书记，而且又是河南这样的大省，自然是有些本事和贡献。不过，又有许多人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很有意见，最终是倒台了。

可是，在共产党的干部里，他也有“独此一家”的地方，其表现令杨成武这样名列史册的人物都“叹为观止”，大有看法。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声望日隆，地位一天天崇高，到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顶峰”，所到之处，欢声雷动，即便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见了他也是恭敬不已。

刘建勋却不然。他是摇摇晃晃，拖拖拉拉地登上专列，满不在乎地走进客厅，随随便便同毛泽东握一下手，不等让座，没什么客气寒暄，便大刺刺地朝毛泽东身旁的沙发坐靠下去。也没到此结束，竟两脚互相帮忙，漫不经心地脱下那双圆口黑布鞋，两只手象当年“土八路”一样捋起裤腿，露出毛茸茸两条腿，身体一仰，两腿两脚都上了沙发，象河北老太太一样盘腿坐到了沙发上。

挤在小小一车厢里的高级干部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简直太失礼了！他竟一边用手搓脚搓腿上的泥，一边同毛泽东谈论天下大事，河南形势。杨成武想给他提个醒，又无法说出口。因为谈话已经开始。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毛泽东对刘建勋的“作风”似乎见

惯不怪，笑微微问：“有什么新闻吗？”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刘建勋漫不经心地就给“大好形势”抹了一笔黑。“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微皱眉头，一口口吸烟，吐出的团团烟雾后边，两眼郁郁，闪着黯淡的光。仿佛看到满园果实将熟，天际忽然涌来一团乌云，天气预报说有大风冰雹……

他声音低沉地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杨成武回答。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毛泽东吩咐。

这是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文攻武卫”的一段，所有人都听得认真；没有人评议，甚至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有目光各异，微妙复杂地闪烁着连成一气，宛若神秘的海。

……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得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的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其间也夹杂着江青高亢而激颤的呼声：“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

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录音播完时，毛泽东嘴唇动动，差点吐出一声“大毒草！”

但他及时憋住，一口接一口吸烟，沉默许久。会议室里也随他寂静许久。

毛泽东不好讲话。他南巡期间，讲过“武装左派”，“主要是武装工人左派”的话。在上海讲过，在长沙也讲过，但他是针对特殊地区特殊情况在小范围里讲的，只对几个人讲了。比如上海，那里没有抢枪，他讲了“准备武装十万工人”的话。比如湖南，针对某些地区抢枪严重，他肯定了黎原“发枪”的作法，说：“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又送回来，给你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就抢跑了。这是个好经验。”

江青显然是获得了消息。毛泽东想到这里，愠怒地扫一眼张春桥。江青不象毛泽东上下内外有别，她竟跑到群众中去大讲特讲。从群众的欢呼声看，派性对立严重的群众为之鼓掌欢呼的是江青所讲“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有了这两句，后边的一切解释和表白都毫无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全国范围的武斗泛滥……

毛泽东的喉结上下滚动，嚥下一口唾液。他曾讲过，他对江青是“有看法但是没办法”。

终于，他打破了沉默：“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这是唱反调么！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

提法不行。”

刘建勋盘双腿，哈着腰淡淡说一句：“有的小报还登主席到过什么武斗现场……”

“屁话！”毛泽东火了，“我住虹桥宾馆，大门也没出过，成武知道。”

“根本不可能的事。”杨成武作证：“主席从没出过宾馆大门。”

“我已经讲了一路，南京军区不能倒，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是个标志，南京军区一倒，其他军区都要受影响。我讲了一路文化革命不能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人就是不听招呼。”毛泽东陡地提高声音：“王力就是不听招呼！”

毛泽东的目光变犀利，是在警告一切不听招呼的人谁破坏“明年春天结束”的战略部署，谁就将步王、关、戚后尘。

毛泽东站起身，大声说：“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招呼的，他还要搞下去。谁要搞谁就搞去，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不在这里讲了，我回北京再讲！”

专列离开郑州之际，毛泽东再次指示杨成武：

“回去就搞个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你再抓个训练班，不但党政群干部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训练时间不一定长，至多两个月。北京搞，各省各大区也搞。都说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不过四个月，那就是个训练班嘛！现在的学校一搞就是几年，这不好，要改。”

“是”杨成武一边记录一边回答。

“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厌！这话你告诉总理，

不要对林彪讲。”

杨成武的笔停下来。他明白什么话可以记下文字，什么话不可以留文字，只能记心里……

第六章 政治交易的牺牲品

上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

——资治通鉴卷十一

中国历朝历代，大的政治举动或变故之后，都有紧随而来的“赦天下”。这不是传统或习俗，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是被历史证明的成功有效的统御之道，包含了武戏文唱，红白脸相间，不计前嫌，容天下之量等等优点的领导艺术在其中。

公元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入北京。车身在刹车的作用下震颤时，杨成武以手加额，长吁一口气：“顺利回京了！”

26日晚，毛泽东亲临京西宾馆会场，看望九百多人参加的集训干部会议全体成员。绿军装和红宝书潮起浪卷，欢声如雷。毛泽东频频招手，一脸灿然。跟随他身后的林彪机械地甩动手腕，煽动着秘书为他带来的那本《毛主席语录》，脸上带着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固定的笑容。

掌声渐渐沉落时，毛泽东朝着台下搜寻张望；一阵落座的

椅子错动声之后，会场出现片刻的寂静。

蓦地，一道高亢的声音吹号一般划破寂静，在大厅里隆隆回荡：“陈再道来了没有？”

一阵窒息的沉默，仿佛是被猝不及防的闪电雷霆震呆了，整个会场都凝固了一般。

“主席！”一声呼唤，台下立起一位将军，高举右臂，肌厚肉重的脸上，几粒麻子泛出紫盈盈的光，声音带着一种历尽苦难，终于回归的惊喜、激颤和凄凉：“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好，好，”毛泽东向他点头，向他招手，声音焕发着九月阳光一样柔和的光彩，安抚着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你坐下吧。”

杨成武在那一刻注意到吴法宪。这位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空军司令员，望望面无表情的林彪，嘴唇蠕动一下，沮丧的垂下了头。

他听到身后隐隐的几句议论：

“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

“瞎乱半天，原来主席是保陈的。”

“陈大麻子这回腰杆硬了！”

……

一 “大树特树”

林彪铁青着脸，一路无语，回到毛家湾，在客厅的沙发里闷坐良久，终于挤出一声：“突然袭击！”

坐在对面察颜观色的叶群只舒了半口气便又憋了回去。林彪吐出声来总比憋出汗来好，但这一声证明了她的担心：毛泽东上午对陈再道的安抚以及讲话，没有同林彪通气。武汉“七

二〇”这一回合，白脸恶人都叫林彪做了，红脸善人却让毛泽东当了。

“开始对‘七二〇’的定性，是他先表了态，现在又变了，这不是……”叶群没敢说出那句“两面派”。

“一策两全。”林彪两眼呆呆地望着空中的某一点。在统御术中，一策保两全或多全，历来被称为“奇策”。毛泽东南巡，罢了陈再道这样一批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悍将”的官，夺了他们手中的军权；又抓了王、关、戚，再淡淡安抚陈几句，使水深火热的陈再道一批人反而感激他，恨只恨王、关、戚以及他林彪这些人，真是帝王韬略，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又高明多了……

“主席的想法……跟不上。”叶群受林彪影响，交谈时，特别是涉及毛泽东，也常讲半句话，或是跳跃着讲些不连贯的话，“现在又让贺龙、邓小平、乌兰夫进中央；一会儿又‘讨嫌’……南巡讲话，问谁封了他四个官？含沙射影……”

林彪始终不再言声，微眯的两眼深不可测。

“不通气，不打招呼……只跟周讲……杨成武搞封锁！”叶群咬了咬牙。

“杨成武……有人撑腰。”林彪轻轻讷道，目光里漾出一股锐气，瞬间又逝，将手轻轻一指，叶群便悄然起身退了出去。

下午四点，林彪练字。

叶群帮忙备纸墨，在桌侧嘀咕：“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又成立个‘二办’，由杨成武负责，让加快解放老干部……”

林彪略一凝神，写下四个大字：天马行空。

叶群继续唠叨：“吴胖子有点沉不住气，几次来电话，说杨成武反对‘两个拿得起’，只承认毛主席的权威，不承认首

长……”

林彪拧紧眉毛，略作沉吟，又挥笔写下四个大字：克己复礼。

这两幅字后来都挂在了墙上。

第二天上午，内勤王兰多在为叶群收拾床铺时，在枕边发现了一张卡片，上边写着：

“封官许愿，
礼貌、拉扯，
挑拨离间，
含沙射影，
两面派，
往死打。”

如何解释这些话？至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一定论。不过，叶群自己是这样讲过：“在资产阶级说来是权术，无产阶级认为是策略，这也是阶级分析法。”

林办的秘书，叶群的内勤，二十年后都曾回忆证实过叶群讲过的这句话。比较而言，还是黄永胜讲的粗俗而又明白：“封建社会是长袍马褂，关紧门户再干事；资本主义是脱光衣服，自由乱爱；我们只能讲为革命献身，多作贡献。说到底都是要×女人。”

周恩来的脚步刚刚踏上怀仁堂的门阶，又停下来，侧脸望着那辆滑行过来的“吉姆”车，缓缓回转身。他认识杨成武乘坐的这辆车。

每当看到“吉姆”车，周恩来心中都要涌起一种复杂情感。因为这种车是以他一位老朋友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生产制造出来，这位老朋友就是原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被

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也被全盘否定。中国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防止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可是，运动搞到今天，他有些迷惘了。这个善良的愿望能实现吗？

杨成武已经钻出车门，紧走几步，向周恩来敬礼，周恩来点点头，轻轻握一下杨成武的手：“中央征求对开‘九大’意见的文件看到了吗？”

“看到了。”杨成武的脸孔在秋阳的映照下焕发出青春仍在的光彩。

这是 1967 年的 10 月 21 日。

“前天宣布了主席在武汉的讲话内容，听到些什么反映？”周恩来与杨成武并肩朝怀仁堂小休息室里走。

“热烈拥护。”杨成武明快地回答四个字。前天，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及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们在人民大会堂 118 号开会，正式宣布了毛泽东在武汉所讲“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决策”，特别规定一条：“九大”的筹备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所以，杨成武特意补充一条反映：“陈老总挺激动，说：成武，你就这么干，听总理的。”

“是听主席的。”周恩来随口纠正，示意杨成武坐到茶几旁：“今天召集你们有关领导来怀仁堂西厅开会，就是要布置‘九大’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的难题，就是要想法子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当代表，选进中央委员会。老同志打倒得太多了，怎么解脱？”

杨成武迎着周恩来那半是期待，半是忧愁的目光，略作沉吟，压低一些声音：“还是得主席讲话。”

周恩来继续望紧杨成武，点点头又摇摇头，慢条斯理道：

“决心要主席下，具体工作还要靠我们做。成立由你负责的‘二办’，就是想把非常困难的老同志交由军队来负责……这是会前我先找你通气的。”

杨成武下意识地耸肩，似乎压了重担，郑重地点一下头。他知道，中央专案办公室是由周恩来负责，但副主任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周恩来的手脚根本无法施展。刘、邓、陶、彭、罗、陆、杨等人的案子都归此专案办公室。杨成武的第二办公室成立后，中央专案办公室就顺理成章地简称为“一办”。“一办”的日子不好过，杨成武在“二办”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的副主任有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这些人，都是不肯解脱老同志的……

周恩来似乎体察到杨成武的难处，将谈话的范围缩小到具体人上，手指在茶几上轻轻一点：“叶向真的案子，矛头是对准叶帅的。‘二办’下设十个组，叶向真这个一组的组长就是你杨成武来当，你要负责保护好叶帅。”

“明白。”杨成武点头。

周恩来探出上身，几乎是耳语般地轻声道：“他们搞叶向真，主要说她和造反派在北京医院抓了彭真和罗瑞卿，这个事情是中央文革指使的，戚本禹用红机子打的电话，有记录。叶向真就是有错误，也是被他们利用了。”

“明白，是中央文革某些人指使的，和叶帅毫无关系，要查就会查到中央文革……”

周恩来微微一笑，含了会意和赞赏，手指在茶几上又轻轻一击：“还有青海的案子。”

杨成武又一点头，他知道，在青海省问题上，叶剑英支持赵勇夫，林彪支持刘贤权。赵勇夫已被罢官、逮捕，林彪和中央文革都要追赵勇夫的后台。

“刘贤权同志我认识。”杨成武小声汇报，“长征时，我在四团当政委，他是六团卫生队指导员，见过面。后来到东北，刘当警卫团长，与林彪、叶群建了关系。”杨成武略一停顿，悄声道：“赵勇夫开枪，责任在他自己……，叶帅并不知情。”

周恩来凝神听完这句话，面孔、四肢同时松弛，了却一桩心事，坐直身体放开声音：“成武啊，就是这样了，我们去开会！”

两个人起身，朝西厅走去。

深夜，静悄悄的毛家湾。

“叶群回来了吗？”合目静坐了很久的林彪，手捏额头忽然问一声。

“回来了。”内勤小心翼翼报告，“正给几位秘书谈话呢。”

“叫她来。”林彪将捏在另一只手中的那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丢在茶几上，缓缓站起身。

他又开始了室内踱步。

下午，陈伯达送来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报告说：“文章我已经改定，建议用杨成武的名义发表。”

“他是什么意思？”林彪问。

“他不同意。”陈伯达抓抓泛亮的脑瓜皮，“他说他没读马克思，也没读过列宁，写不出这种文章，用他名义发不合适。”

陈伯达顿了顿，朝林彪瞄一眼，看不出所以然，便补充道：“我认为还是以杨成武名义比较好，用‘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发有点那个……还是用杨成武名义发影响大些。”

“嗯。”林彪不置可否地哼一声便结束了关于这篇文章的议论。他要想一想。

杨成武封锁我！这个念头死死缠绕脑际。他的态度究竟有

什么来头？这个疑问沉重地压在心头。

毛泽东南巡讲话，林彪从杨成武那里所知内容，不比京西宾馆那些集训的将军们多多少少，未曾公开的内容，他是从其他一些渠道得来。他相信肯定还有一些内容是局限在杨成武、汪东兴这些毛泽东身边人的心里，至今无法窥清。

单是从其他渠道得来的消息，已经足够他疑虑惶恐。

“四个伟大”毛泽东“很不喜欢”，已经“讨嫌”！对于“导师”、“领袖”、“统帅”、“舵手”也讥讽为“谁封我的四个官啊”？当曾思玉和刘丰讲“依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时，毛泽东竟警告说“讲多了你们要吃亏的”……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这是林彪在黄埔军校学习时便熟读的《六韬·发启》之言。再经几十年严酷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生活的锤炼与积累，那种见微知著，在微变中预测突变的敏感性及洞察力都是超人的。毛泽东讨嫌“四个伟大”，无非两个原因：其一，刘邓已倒，他要减少个人崇拜；其二，刘邓已倒，与林彪的矛盾上升，借批“四个伟大”来降低林彪的位置……

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一个“战役”的方案已在朦胧中成形。他是搞战役的大手笔，在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公认他不弱韩信。然而，这一次战役既不是在井冈山消灭陈诚的王牌精锐十一师，也不是在东北战场歼灭蒋介石的数十万美械武装，这一次的战役是要打乱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乃至改变中国的政权结构……

他已经踱到窗前。夜空里繁星闪烁着锐利而又寒冷的光辉，高处不胜寒。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到刘少奇、邓小平，有谁个能与他长期合作共事？林彪颤栗一下，流水也似踱

回头，踱到茶几旁。戎马一生，他只信实力，别的都靠不住，关键时刻只能靠实力说话。“他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目的还没达到，文化革命不能到此收尾！”这就是林彪半年来思考与行动的出发点。

他朝那篇“大树特树”投去一瞥，决心已然下定：对，就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让你所信用的人去说你所“讨嫌”的话，再看你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策保两全。既可探知你毛泽东的全部心思，又可为将来处置杨成武留一道伏笔……

叶群姗姗来迟。她正在秘书那里发泄肚子里的积怨。林办秘书张云生曾这样回忆：

叶群看完演出回来，已经很晚了。但这时的林办工作人员都还没下班。我们几个秘书正在看文件，叶群进来了。

“今天晚会的事，是谁来电话通知的？”叶群一进门就板着面孔问。

“杨代总长的张秘书。”我回答说。

“以前杨代总长通知事情，都是叫秘书打电话吗？”

“不都是。”郭连凯把话接过去。“多数情况下是杨代总长本人来电话。”

“太不像话！”叶群坐在沙发上，把小手提包往旁边一摔，“这样重要的演出，他们为什么不通知首长去？”

几个秘书见叶群来头不对，知道她想作什么文章了，谁也没敢吭声。

“我为这个事找杨代总长大闹一顿。”叶群见我们仍不吭声，继续说下去。“我把他拉到一个小房子里，指着鼻子问他，你杨成武的眼睛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

后面这句威胁性的话，叶群是咬着牙说的……

叶群这番雷霆大发，由于林彪的召唤而中止。她带着余怒未息的激颤匆匆走入小客厅。

“你给杨成武打电话。”林彪手指红机子，用那种尖锐的声音说：“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就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

叶群怔了怔，见林彪脸色不好，虽然不知是为什么？但她还是拿起了电话。这种时候还是先照办，再问为什么才好。

电话很快挂通。叶群像是忘记了刚刚发过脾气，换上一种谈公事的严肃平静的口吻：

“是杨代总长吗？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伯达同志已经改定。他建议用你的名义发表……”

“伯达同志跟我说过，我已经讲了，这不合适。”电话那边传来杨成武谨慎缓慢的声音，“我写不出这种文章，那里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我都没读过，说我写的人家不相信。而且这篇文章是两位副书记李天佑、王新亭主持讨论三四次，我都没参加，不宜用我名义发表啊。”

“用你名义发表影响大。”叶群把“大”字咬得很重。

“伯达也讲这个话，可我写不出理论性那么强的文章，许多话知都不知道，将来人家问起来我怎么办？说不清只能出洋

相。这件事我已考虑多次，我不同意。”

“这样吧，你再想想，”叶群瞟一眼林彪，留个活话：“明天你到林办来一下，我们再谈。”

第二天上午，杨成武应召来到“林办”。

叶群板着面孔，口气全变了，完全是命令式：

“一〇一决定以你名义发表这篇文章。”

“一〇一”是林彪代号。杨成武微微一怔，还想说什么：“叶主任，我想跟一〇一当面汇报一下想法……”

“决定了的事，你不要再讲了。”叶群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摆一下手：“党组织有权力决定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西北高干会是主席写的文章，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那篇谈国际形势的文章，有人认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点，从西欧东移，到了东方。主席认为这个说法不妥，主席写了文章，说国际政治斗争的重点仍在西欧，这篇文章用陆定一名义发表了。农村工作调查研究那篇文章，也是主席写好用江华名义发表的。”叶群显然是作好充分准备，侃侃道出三个实例，而后口气一转：“所以党有权指定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一〇一决定了，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就以你名义发表。”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写文章用有关负责人名义发表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对他讲过这些往事。他张张嘴，再说不出反对的理由，放低声道：“我服从。就以我名义发表吧。”

十一月三日，一篇影响极广，给杨成武个人声誉造成巨大损害的“大树特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

天气阴冷，却始终不曾落雪。

杨成武带着一身寒气，心事重重地朝118号走。今天主席召开碰头会，少不了又要批“大树特树”。

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发了脾气。11月6日，毛泽东在人

民大会堂对康生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您是知道的。”

“这是陈伯达的事！”毛泽东望住杨成武，“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稍松一口气，却也不敢轻心，因为还压着个林彪。他心里明白，是被挤入夹缝了。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毕竟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杨成武主动承担责任。

“这不是你的事情。”毛泽东再次表态，并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如今，1967年就要结束了。在12月26日关于韶山通车的报告中，又出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之类屁话，毛泽东在27日召开这个碰头会，肯定会再批“始作俑者……”

杨成武正要进会议室，一声闽南高腔打断了他的沉思：“成武呐，成武！”

杨成武止步转身，见到了陈伯达，一边匆匆追上来，一边两手作揖，嘴里不停地道：“对不起，对不起你呀，我给你做了件坏事，给你赔不是了！”

杨成武苦笑道：“我说那些理论我不懂，你坚持要以我名义发……”

“唉，我是糊里糊涂哇，”陈伯达在杨成武面前立定，不改作揖的姿态，宽大的脑门湿漉漉泛着光，连连叹气：“我是吃了安眠药哇，糊涂了，糊涂哇。”

陈伯达一脸苦涩的可怜相。他日子不好过。年初，他跟着康生、江青一道讲话打倒陶铸，造成既成事实，迫得毛泽东权

衡利弊，不得不同意，却也惹来烧身之火。毛泽东雷霆大发，在小范围里大骂中央文革里几个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组长陈伯达。到了毛泽东南巡，他又卷入“揪军内一小撮”的漩涡里，虽然最后只抓了王、关、戚，但他也挨了批，几番检讨解释，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处处谨慎，事事小心，一心揣摩毛泽东的思想，竭力紧跟，却不料“好心”搞个“大树特树”，又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几乎“灭顶”。当他惴惴不安地在沙发里坐下时，毛泽东一声轻咳便令他激凌凌绷紧了全身。

事后，毛泽东所讲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等问题，陈伯达都没留下多少记忆，他所记忆深刻的只是毛泽东朝他投来的严厉一瞥：“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不停地眨眼皮：“我是糊里糊涂哇，没把好坏呐。”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陈伯达几乎要哭。

毛泽东用挖苦的口气说：“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我是吃了安眠药哇……”陈伯达摘下眼镜，不住地擦汗，发出蚊子一样的嘤嘤细声。

“流毒甚广！”毛泽东余怒未消，“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报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负责

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恩来点头：“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便将毛泽东批陈伯达、姚文元的话在京西宾馆作了传达。

二 两个女人

公元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

在中国，围绕两名特殊的妇女，政坛又起大风波。这两名妇女就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江青和第二夫人叶群。

杨成武怀着隐隐不安的心情驱车驶向毛家湾。自随毛泽东南巡之后，每当要见林彪，总是感到不安。毛泽东对林彪的警惕和某种封锁，深深影响了他。如果说，当年他写“林军团长教我当师长”时，全然一片尊崇之情，那么现在则不然。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生活，他懂得了如何识别和考察人。比如《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确实可以给人以启示。

毛泽东在聊天中，多次用赞赏的口吻谈及朱元璋，特别是朱元璋对人才的重视。正所谓“鸿鹄能够高飞，是因为有羽翼；蛟龙能够腾跃，是因为有鳞鬣；君主能够治理好天下，是因为有贤人辅佐。”贤主论人，外考“八观六验”，内审“六戚四隐”。

所谓“八观”：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

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

所谓“六验”：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

以此“八观六验”外考林彪，则不难发现：仕途通顺之时，他尊陈伯达理论家，尊江青“杰出”，却将“红军之父”朱德说成“你打过什么仗？还不是都靠我们毛主席！”就连井冈山上的“朱毛会师”也变成了“毛林握手”。当他显贵时，任用的是吴法宪、邱会作、叶群这类人；当他富有权势时，豢养的是江腾蛟、周宇驰、王飞、何汝珍之流。中国政治，历来将官宦分为六正六邪。他惧恨周恩来、朱德、陈云这样的圣臣、良臣；迫害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叶剑英、陈毅一类忠臣、智臣；疏远聂荣臻、谭政、谭震林等一大批贞臣、直臣。他亲近的是陈伯达、吴法宪一类具臣、谀臣，喜欢的是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邱会作等等奸臣、谗臣；结盟的是康生、江青这种贼臣、亡国之臣。

想到这里，杨成武不由得眉头深锁：林彪已不是红军时代的林彪，也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他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呢？

随毛泽东南巡返京，杨成武即深感此“微行”所引来的波澜远未止息。他连接几封告状信，揭发王飞、周宇驰等人住京西宾馆等地，“胡作非为”，“飞扬跋扈”，将一些文工团员和女服务员“搞大肚子便弃之一边，并进行恫吓、威胁……”

考虑空军党办这些人物特殊的背景，杨成武便给林彪写了封筒信：“林总，有几封告状信，请阅。若调查属实，拟对这几人作严肃处理。请示。杨成武。”

信批出后，久久没有回音，在空军当兵的女儿杨易却哭着跑回家。她受到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诬陷迫害。杨成武顿时明

白了一切……

在这种时刻，林彪亲自召他见面。他隐隐感到，这次见面将是某种摊牌，很可能将决定自己的政治生命……

尚未跨进客厅门，杨成武已看清林彪与叶群同坐在一张大沙发上，脚步不自禁地略有踟蹰。

辨别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外考“八观六验”，内审“六戚四隐”。

所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所谓四隐：朋友、故旧、邻里、左右之人。林彪让爱吹不爱批，信邪不信正，说假不说真的老婆叶群把持“林办”，操纵军委；让志大才疏，有野心没阅历，多受捧少磨难的儿子林立果去抓空军……如此作为，会是什么后果？

他三分惶惑七分忧虑地跨入客厅门，像战争年代那样向他的老首长立正敬礼：“林总，我来了。”

“你坐。”林彪气色平和，用手示意。

杨成武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来，叶群过来替他上茶，他客气地欠欠身，表示感谢。虽然形式和以往见面差不多，但杨成武从那一瞥目光，一声轻咳，甚至一个微笑上可以感受到某种微妙的变化，更加确信这次约见的不寻常。

“林总找我有件事情？”杨成武竭力想表现自然些，“请您指示。”

“有一件事情找你来帮忙。”林彪目光灼灼盯紧杨成武，却迟迟不往下说。杨成武两手抓着沙发扶手浑身不自在，真比火燎还难受。他在那一刻，不自禁地想到了随毛泽东南巡，从“谁封我的四个官啊？”到“四个伟大”“讨嫌”；从“什么永远健康”，“人有不病不死的吗？”到“有些话你不要对林彪讲”……如果林彪要求他将毛泽东的谈话全部汇报一遍怎么办？

杨成武终于耐不住沉默和灼人的目光，嘴唇蠕动一下，勉强笑笑，沙哑地问道：“什么事情啊？请林副主席指示。”

林彪嘴角一抽，掠过一丝似有似无，莫测高深的笑意，目光始终不离杨成武的脸孔，像要作最仔细的X光透视。他轻咳一声，不紧不慢说：“叶群同志16岁入党，这是事实。”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定下调子，然后口气一转：“可是现在有人捣鬼，说是假的……”

杨成武心头长舒一口气：不是问主席南巡的讲话。但他马上发现事情仍然不妙，林彪接着给他出了道难题，比当年的“围点打援”难，比“怎样当师长”也难。

“既然有人说假的，怎么办？就要证明是真的。找你来帮忙，写个证明，证明是真的。”

杨成武怔住了，不知不觉便淌下来汗。多少年后他对笔者感叹：“我是吓出了汗，紧张的不得了。这种情况下，写不行，不写也为难……”

“谁？”杨成武避开正面，喉结滚动着嚥下一口唾液，绕山绕水地找出路：“谁证明叶群是十六岁入党？谁讲叶群十六岁入党是假的？”

林彪不回答，目光变得黑森森，铅一般罩住杨成武。

杨成武漫不着边际地咧咧嘴，目光游动着想摆脱那罩住他的肃杀之气，转望住叶群：“谁说是真，谁说是假的？我没看到，也不知道……”

“吴法宪写了个证明，”林彪又讲话了，讲得很慢，口气里韵味十足，谁都不难听出含意：“你也可以写一个。你是总参谋长，你写这个证明有份量，最合适。”

吴法宪确实写了个证明，但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找叶群当年一个同学写的。

杨成武下意识地摆一下手，明白躲不过去了，只好正面回答：

“这个这个，我写不合适吧？”杨成武竭力笑笑，笑得尴尬苦涩，“我没同叶群共过事哇；过去如果在一起，知道情况，那好办。不在一起……”杨成武舔舔干燥的嘴唇，又去望叶群：“还记得吧？我同你是一九六〇年才认识。我面神经麻痹、住院，你到协和医院来看我。你说：‘我是林彪的爱人，我代表林总来看望你，林总让把我们的2斤肉给你吃。’那年每人每月供应1斤肉。我说：‘不要不要，我和爱人也有2斤肉。’就那次我才认识你，第一次见面……”

杨成武讲不下去了，他突然读懂了对方的目光。叶群的两眼分明是说：“我从一滴血就能看出你的全身！”林彪目光里一片肃杀：“你要死还是要活”？这份证明是故意出题考验他呢。可是，老首长也罢，副统帅也罢，接班人也罢，是死是活也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啊。

为脱身，杨成武决定堵死这个话题：“林总，叶群这个事可以调查一下，没问题后给我看看，看过之后再讨论如何处理……您看怎么样？”

多少年后，杨成武对笔者回忆说：“林彪沉默三五分钟，就那么看着我我不讲话，目光好像刺入我心里，气氛好紧张，好难熬呀。我只能硬撑住，何况毛主席早对我发过话。最后我问：‘林总，你还有什么指示？’林彪把目光一转，不再看我一眼，也再不讲话，把胳膊抬起来，弯着臂肘，手举在眉毛一侧，用腕子甩动手，从里向外甩了三次手，就用这个动作把我驱出了客厅……”

夜深了，杨成武难以就寝。

“无非是罢了你的官！”赵志珍用力劈下手掌。这位燕赵女儿颇有荆轲之风，凌厉泼辣地劝说丈夫：“你这个位置，明摆在夹缝里，又要听主席的，又要听林彪的；又得听总理和老师们的，又得听康生、江青他们中央文革的；没见罗瑞卿的例子，两边四方一顶，你就是牺牲品！”

“讲什么话？”杨成武烦躁地摆摆手：“共产党员，革命几十年，总要有个原则吧？”

“文化革命搞有两年了，有原则吗？”赵志珍愤懑道，“每天提心吊胆，不当这个官还可以自在一些……”

话音未落，电话铃响了。赵志珍拿起电话，应对两声，立刻捂住话筒，疑惑地望住丈夫：“江青找你，这么晚，不知什么事？”

杨成武皱皱眉，接过电话：“我是杨成武。哦，江青同志，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边似乎在大喊大叫，杨成武受震一般将听筒稍稍移开一些，神色严峻，紧闭双唇，只偶尔从鼻孔里嗯嗯两声。末了，用勉强的声音说：“江青同志，你冷静一些。明天上午我过钓鱼台去。”

电话压下了。静守一边的赵志珍小声问：“又出了什么事？”

良久，杨成武叹口气：“唉，傅崇碧是‘误入白虎堂’哟！”

车轮沙沙，心事悠悠。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仰靠车椅，双臂交叉于胸前，微眯着两眼想心事。

正是杨成武应召去毛家湾的同时，他驱车驶往钓鱼台，同行的有卫戍区副政委周树青及秘书冯正午。

想到要见的人是江青，便又烦又恼又无奈。眉毛锁起良久，忽然又扬起来，鼻子一哼，嘴角绽出一层不屑的浅笑，嗤出声：“其奈我何！”

“什么？”周副政委问。

“没事。”傅崇碧索性闭上眼，独个儿继续想心事。

毛泽东南巡前夕，江青与康生追问傅崇碧为什么把许多走资派都藏起来，不让批判？傅崇碧回答：“上面知道。”这个“上面”本来是讲周恩来，但傅崇碧发现中央文革来势不妙，忙找机会向毛泽东讲了这件事，得到毛泽东认可。他无疑拿到了尚方剑，却丝毫不露声色。康生，江青等人当着周恩来的面追查此事时，傅崇碧先是轻慢地翘起二郎腿喝茶、吸烟、拒不回答；继而追急了，便仍是故弄玄虚的一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内心紧张却无法讲话，只有寄希望傅崇碧能顶住不说。顶到江青拍桌子，康生拍沙发，张春桥和姚文元站起身喝斥之际，傅崇碧才拍案而起：“你们去问主席吧，他知道！”

滚锅里浇下一瓢冷水，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中央文革一班人的尴尬窘迫之态可想而知。他们“意在周公”，却追出个毛泽东，明显是受了傅崇碧一番戏弄。

傅崇碧出了胸中一口恶气，自然很开心，会后钻入周恩来的车厢，讲起经过，禁不住开怀大笑。他相信中央文革恼恨他，会有报复，但他不怕。不仅因为周恩来会保护他。中央文革几个秀才“其奈我何”？

不过，他也明白少招惹江青的道理。几天前，北京鲁迅博物馆给江青写信，说鲁迅的四箱手稿丢失了，江青让傅崇碧过问此事。傅崇碧不敢大意，马上追查，查明手稿是经戚本禹之手存入中央文革保密室。傅崇碧在电话里报告江青，江青不信。傅崇碧并不争论，他手中有保密员的收条，便由周树青、

冯正午陪同，当面向江青汇报清楚。

车停在院门口，冯秘书到传达室联系，经陈伯达同意，驶入钓鱼台，正碰上散步的姚文元，便由姚文元引领进入会议室等候。

屁股还没坐稳，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江青一头撞入门来，劈面就是尖叫：“傅崇碧，谁叫你进来的？”

“嗯？”傅崇碧惊得一怔，马上又皱起眉头，望望姚文元又望望冯秘书：“在传达室联系过啊。”

“说呀，谁叫你进来的？”姚文元也突然变了脸。

“在传达室联系过，打了电话……”冯秘书脸色苍白。

“给谁打的电话？跟谁联系的？”江青气势汹汹逼向冯秘书。

“陈伯达……办公室。”冯秘书在江青的淫威震慑下有些慌。

“陈伯达在哪儿？办公室哪一个？”江青嘴快得像机关枪，蓦地转向傅崇碧，尖声刺耳：“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区司令，未经允许就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傅崇碧始料不及，仓促申辩：“我们报告过了，我们在哪儿抓人了？”

“傅崇碧，你就是没有请示！”姚文元声色俱厉。

“你解放军带头这么干！在北京，在中央文革所在地你就这么胆大，这还了得？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证？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尖厉的喊声像刀子刺耳，连续几天不曾合眼休息的冯秘书高度紧张，突然眼一黑，身体晃了晃，仆地栽倒下去，手中的公文包飞出，将毫无准备的江青吓得一声惊叫，跳出去两步：

“他拿皮包打我！”

会议室里一阵死静，直到发现冯秘书已昏迷不醒人事，才明白是一场虚惊。傅崇碧忙于找人救人，江青却又尖叫起来：“检查一下，看他皮包里是不是有枪和子弹？”

幸亏没有。不然更成了“林冲误入白虎堂”。

傅崇碧已经冷静下来，严肃说：“江青同志，我是来汇报鲁迅手稿的问题，这也是你交办的。我已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

“不可能！”江青任性的大叫。

“这是卜信荣的收条。”傅崇碧呈上证据。

江青看看那收条，脸一下涨红，冲姚文元喊：“把卜信荣给我叫来！”

工夫不大，卜信荣匆匆赶来，惴惴地立到江青面前。

“你是个混蛋！”江青憋足劲骂，“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

“江青同志，手稿是怕红卫兵抄家搞丢失，才保存到中央文革来。”卜信荣小心翼翼解释，“是戚本禹拿来……”

“不要讲了！”江青的右脚在地毯上一顿，“你把手稿给我拿来！”

四个樟木箱子被抬来，江青亲手翻看，果然是鲁迅手稿。她咬咬牙，忽地立起身：“我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锁起来！”

卜信荣两手发抖地锁好箱子，刚立起身，迎面听到一声吼：“你是个坏蛋！”江青狠狠指定卜信荣：“把他抓起来！”

两名警卫冲上来，不由分说捉住卜信荣双臂。

“冤枉！冤枉！我冤枉啊！”卜信荣连声呼喊。

“把他嘴堵住！”江青挥舞着手指挥：“用手帕，塞住他的

嘴！”江青看着卜信荣被拖走，这才狠狠瞪一眼傅崇碧：“你的事没有完，是严重的政治事件。青海的赵永夫，云南的赵健民，还有内蒙的王逸伦，都是这样喊叫冤枉，都是这样拖走的！……”

傅崇碧阴沉着脸没有作声。他明白这并非只是威吓。

三月九日晚，杨成武应约来到钓鱼台。

“傅崇碧他亲自带人冲钓鱼台，两辆汽车，武装冲击，就在这里，在中央文革！”江青一见面就大喊大叫：“你们军队这么干，还了得吗？你去找傅崇碧，先批判，后检查，然后决定如何处理！”

杨成武大智若愚：“这不对呀，傅崇碧是卫戍区司令，照制度他可以随意进钓鱼台，根本无须报告谁，就更谈不上冲了。”他望望静坐一边的周恩来。

江青怔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傅崇碧为什么要冲钓鱼台？”杨成武明知故问，“这里他可以随便进出，他来肯定是有事。为什么事？”

江青张了张嘴，毕竟没好讲鲁迅手稿的事，口气一转：“总之你们军队不守纪律，他还带了部队！”

“是部队还是秘书、工作人员？”杨成武慢条斯理问。

“反正是军队。”江青的火气又浮升起来，蛮横下令：“你去召集卫戍区干部开会，今后再不许发生这种事。”

“我去不合适吧？”杨成武再次转望周恩来：“我没兼北京军区职务，也不兼卫戍区政委，情况也不了解，我去不好办哪。总理，你说怎么办？”

“你不是红小鬼吗？”江青开始发作，“为什么不听招呼？你去京西宾馆召集一个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傅崇碧！”

杨成武望着周恩来不应答。

周恩来明白事情最初的起因与傅崇碧保护他，戏弄了中央文革一班人有关。江青搞傅崇碧有很大的火气也是冲着他周恩来的，所以很难表态。心里迅速权衡一下轻重利弊，终于讲了话：“成武啊，我看这样，你陪谢富治去，他兼着北京军区政委。谢讲话，你去主持会议，你看好不好？”

杨成武一脸不高兴，低声应道：“是，我听总理的。”

“怎么个情况呢？”谢富治似乎也为难，但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忙转口道：“那好吧，我去讲讲……”

“你们都不支持中央文革，”江青跳起身就走，身后扔下一声叫：“都不支持文化大革命！”

剩下几个人似乎早已习惯这种闹剧，无动于衷地静坐着，待脚步声消失后，周恩来淡淡说一声：“散会了。”

三 政治交易

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晚，叶群走入林彪的小客厅。

“成武被江青叫去了。”叶群一进门就报告。

“什么事？”林彪掀起眼皮问。他虽是在恒温的室内，仍然戴了呢制便帽，中山服也系好每一颗纽扣，怕进风似地扣紧风纪扣。

“为了傅崇碧冲钓鱼台……江青发了好大火。”

“唔。”林彪耷下眼皮不再作声，坐禅入定一般。

碎嘴饶舌的叶群每逢这时便少有地安静下来，悄悄坐在一旁望定那顶灰色呢帽下的病态的瘦削脸孔。在林彪动脑筋的时候最好不要搅他。

昨晚，当林彪三甩手腕，驱走杨成武后，只讲一句：“又

一个罗瑞卿。”

只一句，叶群就明白杨成武“死”定了。因为首长的决心下定了。

叶群对杨成武可说是恨透了。恨只恨他“不忠”，“忠”与“不忠”是叶群看人的首要标准，就是忠于林家还是不忠于林家。林彪曾骂江腾蛟是“坏蛋，张宗昌”。可是，一旦江腾蛟跪在叶群面前，赌咒发誓要忠于林彪叶群，“海枯石烂”，“赴汤蹈火”，“死了也甘心”并在实际行动中唯林彪、叶群之命是从，则一夜之间这个“坏蛋，张宗昌”就变成了“好同志”，“身经百战的好干部”。据林办秘书张云生、郭连凯等人回忆，吴法宪、邱会作等人莫不如此。

杨成武则不然。他与罗瑞卿、肖华一样，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他甚至还被林彪把手教过“怎样当师长”；但他也与罗瑞卿、肖华一样犯了大忌，就是不忠于林彪，不能无条件地唯林彪之命是从，甚至跟着毛泽东“封锁”林彪。林彪将将，深明“择人任时”、“择人任势”的道理。战争年代他评价杨成武“文韬武略”，“可以独挡一面”，称为“爱将”。在夺取政权后的上层政治斗争中，这些评价已无意义，他需要的是“海枯石烂”的忠心，“死了也甘心”的效忠。杨成武没有这两条，只能倒台，让位给黄永胜之类具备这两条的新人。在林彪眼中，这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常现象。

叶群虽然喜欢发难，但也有点自知之明。她明白自己能够兴风作浪，煽风点火，却没有组织“战役”，打倒一个受毛泽东信用和保护的大人物的能力。

只有林彪具备这个能力。叶群对此确信不疑。罗瑞卿被称为“毛主席的大警卫员”，私人关系非常密切，林彪搞一个

“战役”就迫得毛泽东“忍痛割爱”，交给林彪处置了。贺龙被毛泽东称为“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是毛泽东政治一盘棋中的重点保护对象，林彪再搞个战役，现在不也是抓起来关押到象鼻子沟去了吗？“处死”他不过是个迟早的问题……

“首长看问题深刻，我们比不了。”叶群对她的秘书讲过“心里话”。比如昨天晚上林彪的谈话，就令叶群心服口服。

昨晚，杨成武走后，叶群开始说事。先从杨成武转来揭发王飞、周宇驰等人的信开始，说信的笔迹象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所写。林彪“一针见血”地评点道：“余立金同杨成武犯一个问题。”叶群马上领悟。因为余立金也陪毛泽东南巡，吴法宪曾向余立金探听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余立金说“没有传达的任务”。

叶群继续讲，王飞和周宇驰看到告状信很恼火，反告余立金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易来往密切，决心查处他们的问题。林彪对叶群编织的“男女问题”又是一针见血：“莫须有。要害是杨、余勾结，要夺空军的权。”叶群马上又领悟了。莫须有，则说你有就是有。作文章的目的是要证明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夺空军的权。

那么，傅崇碧的事又有什么深奥的思考？

“杨成武有野心。”林彪终于讲出他的思考：“他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叶群稍稍一怔，马上叫起来：“傅崇碧是你的老下级啊，和咱们关系还不错，又有总理保护……咱们也得团结人嘛。”

林彪面无表情，声音冷淡：“政治就是平衡，就是交易。”

叶群又一怔，好半天才似有所悟地嗯一声，但仍有些犹豫：“可是……”

林彪冷冷地截住叶群的话头：“可是傅崇碧按杨成武的命

令冲击中央文革。”

叶群眨眨眼：“没有证据吧？”

“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都可以证明，杨成武说傅崇碧可以随便进出钓鱼台。”

静默片刻，叶群像消化完似地抚抚胸：“对，谢富治是中央文革的人，是主席信任的人，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打倒谢富治……”

林彪点点头：“杨成武虽然是我的老部下，但他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反对谢富治，反对许多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同志。有野心，两面派。

“对！”叶群激动了

“他就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叶群再次怔愣，但思路已通，很快便想圆了：“对，鲁迅手稿是戚本禹背着江青等同志弄到中央文革，然后再由傅崇碧借此理由冲击钓鱼台！”

林彪冷峻的脸孔已经变松弛，指指电话机：“替我约见江青。”

叶群的内勤兼秘书王兰多曾回忆这次约见：

当晚，林彪约见江青。江青来到毛家湾，我把她引进叶群办公室。我端来了水果，叶群也赶紧招呼江青坐下。可是江青走到沙发近前又回转身来，气鼓鼓地站着。

“你情绪不好？”叶群问。

江青说：“杨成武把我气的！早晚我要被他们活活气死！”

“林总也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叶群道，“我也愁

得睡不着觉。”

江青忙道：“什么事儿？”

“杨成武！”叶群说：“他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吴法宪的权。林总约见你，看看怎么办？”

江青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正觉得他的态度不对呢。后台是谁？”

叶群道：“去年跟主席到外地去视察，几次回北京，来见过你吗？”

“没有。”

“也不见林副主席，只向周恩来报告情况。”叶群说：“‘八·一’建军节，他致的祝酒辞。周在拉他。”

江青：“还有傅崇碧。这可能又是一个中心！”

叶群：“林总很为难，他不好直接找主席，问题又很严重。”

江青说：“我去，我不怕。顶回来再找！”

“好，就这么办。”叶群怂恿着江青。她转过头对我说：“小王，你通知首长，江青同志马上就过去。”

我通知了林彪的内勤小孙，又回来告诉了叶群。

叶群挽着江青的胳膊走出了办公室……

据记载，林江联手，文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武有吴法宪、邱会作、谢富治、李作鹏等人，轮番或集体向毛泽东告状，正如江青所讲，“顶回来再找”！光会议就开了四次，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已是在劫难逃。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晚。

杨成武在京西宾馆主持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会议，讲话是低

调的：“今天开这个会，上级叫我来主持。有人说你们部队冲钓鱼台，事情的由来和经过我不清楚。如果冲了，那就是错误的，如果没冲，就把事情讲清楚，吸取教训，避免出类似问题……”

会议草草收场。杨成武回到家时，已经快九点；精疲力竭，心情郁郁。工作人员端上饭菜，却毫无胃口，勉强盛碗汤呷几口。

近两年来，杨成武或者度日如年，或者“一天等于二十年”。上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翻云复雨；下层群众斗争，扯旗造反，无法无天。杨成武身处其间，上压下挤，四方逼迫，透不过气，真有一种“没顶”的感觉。面对四菜一汤，脑子里转的却是一张张面孔，代表着种种政治力量，政治思考和追求，他不知那个平衡点在哪里……

当他下意识地夹一个馒头时，眼前突然变朦胧，四壁似乎在旋转，脑子一阵晕眩，全身软软地，轻飘飘地，似乎要浮升起来……

实际上他却顺着椅子溜到地上，倒在饭桌下。

好像过了很久，又像只是一瞬间，他恢复了意识，感觉有人在搬动他的四肢，感觉脸有些麻，口有些苦……

终于，他明白自己犯病了。这种晕眩病1965年在青岛犯过，去年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犯过一次，都是由于紧张过度。这次是第3次。

躺回卧室不久，医务人员匆匆赶来。有聂帅的保健医师赵遗年，有心血管专家吴杰，还有他自己的保健医生，会诊结果：迷走神经亢进，植物神经紊乱。是紧张劳累过度造成的。

他有些伤感。当年率前锋团冲破蒋介石四道封锁线，巧渡金沙，飞夺泸定，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创造

多少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他也并不曾“紧张疲劳过度”而晕倒。是老了？还是中国政治太难搞……

多少年后，杨成武对笔者讲述他晕倒后十四天的经历，不妨将记录和录音摘引如下：

从3月11日起，我就躺在家里养病。晕晕沉沉，听秘书讲，江青来电话，一定要找我。把电话转到床头，我抓起电话，立刻听到江青的喊叫：“刚批评几句，你就病了？”我无力争辩，说老毛病犯了，医生可以证明。

唉，我政治上的预感还是差很多。只知道日子难过，却没想到林彪、江青他们会搞那么大动作。就在我病倒这天，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首先是从空军发难，由王飞、周宇驰这些爪牙动手。20年后经林办及叶群的秘书揭发，才知道前台指挥是林立果，后台是林彪和叶群。

王飞、周宇驰等人在京西宾馆找到吴法宪，诬告说：“余立金的秘书跟空军报社的杨易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余的秘书的爱人发现了杨易写的情诗，要自杀。”吴法宪立刻赶回空军司令部，叫来余立金秘书追问。余的秘书听了大吃一惊，说“没有的事，造谣！不单是陷害我，更是想搞杨总长，这里有个大阴谋！”王飞不叫余的秘书分辩，要把他关起来。吴法宪不敢马上关人，又把余的秘书爱人叫来追问。余的秘书爱人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什么男女关系？什么情诗？到底谁跟谁呀？”王飞马上抢过去说：“你找我告的状嘛！说你丈夫和杨易有不正当关

系，你还要自杀！”余的秘书爱人愣了愣，才明白“指鹿为马”并非历史故事，现实政治生活竟也如此残酷。她哭喊起来：“吴司令，造谣啊，根本没的事！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敢当面血口喷人……”

王飞和周宇驰佯装大怒，又拍桌子又吼，就要抓人。吴法宪毫无准备，又没看到任何证据，何况追问时，余的秘书及其爱人开始都是茫然不知所云，这件事分明是无中生有，马上抓空军政委的秘书，而且要扯到杨成武身上，他也不敢签这个字。面对王飞、周宇驰咄咄逼人的态度，明知他们是林立果的人，还是脱口发了句牢骚：“你们强迫我签字，你们说怎么就怎么，不是夺了我的权吗？你们都夺去算了！”

周宇驰把情况报告林立果，林立果说：“回家睡大觉，谁喊你也别出来。”接着他就去搬叶群。

当天下午，叶群就召来吴法宪，兜头一顿臭骂：“你为什么说周宇驰要夺你的权？周宇驰正陪林立果，那不就是立果要夺你的权吗？立果是我们的儿子，你不是说我和林副主席要夺你的权吗？你不分是非，不分好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告诉你，有人要夺你的权，但不是我们，是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

在毛家湾工作过的许多人都证明了这顿臭骂。我曾听吴法宪叫叶群“叶妈妈”，对林家历来是俯首贴耳。见叶群雷霆大发，吓得连声求饶：“叶主任哪，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绝没这个意思，你去调查，查出来我挨天打五雷轰！”

“你立刻把周宇驰给我找回来，向他赔礼道歉，

照他说的办！”叶群下令。

“我立即照办，一万个照办！”吴法宪表态，并且一回空军就下令抓走了余立金的秘书及其爱人。

林彪、叶群把捣鬼、耍两面派称为“斗争策略”，他们的那一套，善良人永远是无法想像的。余立金和赵志珍一次次去找叶群，好不容易见一面。余立金说：“我和吴司令工作一直配合得不错，关系也很好，可是最近他却很反常。空军党办一些人胡来，他不去制止，反而偏听偏信。背着我，把我的秘书两口子都抓起来，还搞逼供信，硬逼他们承认和杨易有什么关系问题，真是乏味！一个空军司令干这种蠢事的确令人费解。我找他询问，他吱吱唔唔，蛮不讲理。我觉得这人变了。杨易是志珍的女儿，刚来报社工作，人生地不熟，志珍委托我秘书照顾一下，这有什么不好呢？可是他们故意无事生非。现在杨代总长又正在生病，我真迷惑不解……”

赵志珍直言不讳：“我看吴胖子有鬼！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是把矛头指向杨代总长！”

叶群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说：“杨代总长和余政委都是林的老部下，是林总信得过的。吴法宪搞的一些事，我们的确一无所知，回去让杨代总长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据林办秘书及叶群的内勤揭发，前脚送走余立金和赵志珍，后脚又召来吴法宪，叶群马上换了一副嘴脸对吴法宪说：“胖子，杨成武指使赵志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他们这是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跟当年罗瑞卿一样。我们支持你，你放心！”

这期间，我一直未能上班，虽然对吴法宪的作为感到异常，也深知林、叶对我很不满，但我的文件一直照送，几个值班秘书在家里协助我继续处理事情，并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得那么突然，迅速……

3月20日，我家又出一件事。我的父亲已经84岁，住在楼下。那天他嘟哝一声“我头痛”，接着便倒下了，再没抢救过来。医生要求我卧床养病，丧事主要靠赵志珍。

林彪、叶群得到消息很快，当天，林立果就带着林办一个秘书来家悼念，说是代表林彪、叶群，送了花圈，还送来一箱哈密瓜，问候我的病情。临走，又邀请我的儿子杨冬生去看坦克表演，杨冬生说爷爷刚去世，没有去。

虽然吴法宪的表现令人生疑，但林立果的表现又确实迷惑了一下人。我下楼看了看父亲的遗容，鞠了三个躬。

21日，总参李天佑夫妇，王新亭夫妇送花圈来，总参各部也派了代表，老人房间里摆满了花圈。

22日，父亲遗体火化，赵志珍带孩子们去，我遵医嘱，没有去，在家里接待了前来请示工作的温玉成。我还叫他到河南去看看“山”，是为了战备，在平原上搞的一些人造山，又嘱咐他交接工作不要忙，慢慢来。他表示同意。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要发生大事。

就在这天晚8点，吴法宪突然来了，走进门侧的秘书办公室，边坐边说：“我来看一看。”

我的秘书小张问：“首长有什么事吗？”

吴法宪鬼头鬼脑，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说：“没什么事。我去开会，顺便来看一看。”

张秘书见他神色蹊跷，就说：“首长不在楼下，在楼上躺着呢，你见不见？”

吴法宪“噢”一声，站起身，边朝外走边说：“我不见了。我现在开会去，开会回来再向首长汇报。”

事后我才明白，他是奉了叶群之命先来探查情况的。

同一时间，我的女儿杨易正在京西宾馆写东西，碰见了邱会作。邱会作笑眯眯地问她：“身体怎么样啊？”“今天晚上还回家吗？”“住在哪里啊？”我女儿毫无戒心地都告诉了他。

晚11点多，林办的张秘书和于秘书来了，在客厅，就坐在小权你坐的那个位置（杨成武手指笔者所坐处），说：“我们想看看首长。林副主席很关心首长身体，不知现在怎么样？”

我的秘书说：“这么晚了我们首长已经吃了药，睡觉了。”

张秘书和于秘书说：“我们是代表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来看望首长。”

我的秘书说：“已经休息了，再打搅起来不好。”

张秘书和于秘书说：“我们一定得见一面，不然回去我们怎么向林副统帅交待？”

我的秘书无奈，只好引他们俩上楼，来到我的卧室。我已经吃过安眠药，迷迷糊糊听他俩说：“林副主席很关心首长身体，希望首长好好休息，早日恢复

健康。”我躺在那里起来，说几句感谢的话，就见他们两人告辞走了。

半夜一点多，余立金的一个秘书突然来电话，问我的秘书：“刚才吴法宪来把余政委铐走了。杨总长知道这件事吗？”我的秘书很吃惊，说：“不知道啊！”余立金的秘书变声调：“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了？”

我的秘书慌忙跑上楼，敲我卧室的房门，赵志珍起来开门：“出什么事了？”秘书急声道：“吴法宪铐走了余政委！”

赵志珍吃了一惊，转身回到床边。我也听见这声喊，也感到意外和吃惊。片刻沉默，赵志珍建议：“只有给总理打电话，问问出了什么事？”

电话就在床头，我抓起红机子，没声音；抓起长途台，也没声音，还有一部“一号台”，仍然没声音。电话全部卡断了！

多少年后才得知，吴法宪命令江文卡断杨成武的电话，江文不执行，说总参谋长的电话谁敢卡？三次命令都未执行，林彪便亲自打去电话。江文一听林彪的口令，吓一跳，这才卡断了我的电话。

就在我打不通电话之际，卫戍区的部队已经开来，把我原来的警卫部队紧急集合，不许开灯，几分钟便全部拉到景山去了，院子里全部换成了“八三一部队”，带队的是狄副团长。邱会作、李作鹏、王新亭随即赶到，进到楼下大厅里。

整个楼里乱成一片。我的秘书大声报告：“赵主任，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来了！”

赵志珍披件衣服匆匆赶下楼，一下楼就被抓起来，再没能与我见面。狄团长率兵挨个敲门，敲开一个门抓一个，连公务员也关起来了。

我的女儿杨冬荣出门晚，就听她妈妈在楼下喊：“荣荣，你别下来，快到你爸爸那屋去！”

我卧病多日，身边没有衣服。荣荣跑进我屋里，我只穿着衬衣衬裤。邱会作和李作鹏前后脚也闯进我房间，立在床前，身后的警卫员马上走前几步，守在我身侧。

邱会作向我冷冷宣布：“林副主席召集开会，请你去一下。”

我问：“深更半夜开什么会？”

李作鹏看一眼邱会作，没吱声。

邱会作说：“我们也不清楚开什么会，林副主席只是叫我们来请你。”

“搞什么名堂？”我习惯地抓起电话机，当然还是没声音。我将电话一摔：“开会还用你们来请我？我自己不会去？电话也卡了，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李作鹏始终躲着我的目光不吱声，邱会作连连催促：“我们也不清楚，到会场就知道了。”

我的衣服一时找不到，他们就将警卫战士的一件大衣披我身上，邱会作在前，李作鹏在后，夹着我下楼。目光所及，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耳朵里一片喊声，是孩子们惊慌地喊“爸爸！爸爸！”

在楼梯口，我说：“我父亲才死，我母亲有病，我要看看母亲。”

邱会作挡住去母亲房间的路，催促道：“快走快

走，她不在房间了。”

“邱会作！”我吼了一声：“共产党员要有党性，没有党性，做人要有人性，要有良心！”

运动刚起来不久，邱会作由于生活作风糜烂，受到群众批斗。他曾跪在我家地毯上求救，我当时帮过他。所以，我吼他做人要有人性，要有良心，他不敢凶，只挡在前面说：“别看了，快走吧。”

我照直往前走，他就退，到了母亲房门，见到全是兵，母亲已不在房间里。我被邱会作和李作鹏夹持着走到楼下，听到客厅里孩子们哭喊成一片，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客厅，便向客厅走去。

“不许进！”狄副团长喊一声，拉我没拉住，又横挡到我面前。我怒火难耐，警卫团是归我和汪东兴双重领导，现在竟敢这样凶，便一膀子将狄团长撞到了旁边，闯入客厅的门。

我见到母亲躺在客厅的那张乒乓球桌上，四周围孩子们哭喊成一片。但是我过不去，他们也过不来，几排士兵冷峻地横在我们之间。

母亲扬着手哭喊：“我的儿子从来是紧跟毛主席的，他不反毛主席，从来没反毛主席啊！我们全家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啊……”

我大声说：“妈妈，孩子们，你们放心，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事情总会闹清楚的。你们多保重，我走了！”

我转身大步朝外走去，身后传来孩子们的哭喊：“爸爸，注意身体啊！”“爸爸，我们相信你！我们等着你回来啊！……”

门外停着一辆吉姆车。李作鹏先上，然后是我，然后是邱会作。李作鹏的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车一直朝西开去。

我警惕地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到人民大会堂不是这条路。”

李作鹏小声说：“这边人少，好走。”

汽车走新街口、护国寺、西四，兜个圈子才开到人民大会堂的北门。我看到周恩来和谢富治等在那里。

“总理！”我叫了一声，百感交集，再说不出什么。

周恩来小声说：“你的事情，我才知道。是林副统帅检举的。”

我又愤道：“这不是整人吗？我的家全抄了。”

周恩来无法多讲，只留下一句：“你先休息一下吧。”

周恩来和谢富治走了，剩下我站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之间。李作鹏态度比邱会作好，抓我的时候始终无话，这时才小声问：“你吃点夜餐吧？”

我说：“不吃。”

“那就休息吧。”他俩把我引进西大厅一个房间。服务员迎住我说：“你就在这里休息吧。”

我有病在身，便躺下来。睡不着，脑子乱，情绪起伏。我找服务员：“你给我点安眠药。”

只吃一片我便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已是早8点。早饭是稀粥、面包、鸡蛋、咸菜。正在病中，吃过我又睡下。午饭后又接

睡着，也没人来跟我谈话，门口有警卫，进房间的只有服务员，过去常来人民大会堂，与服务员都认识，但也没什么话好讲。一天迷迷糊糊，晚饭后又上床休息。

大约晚10点左右，邱会作进来了，冷冷一句：“你去参加一个会，在福建厅。”

“等会儿我就去。”我下床穿衣，去一趟卫生间，出来见邱会作就等在门口，跟着我一道来到福建厅。

福建厅里转圈摆着沙发，我进厅，发现已经坐满人。北面的西头空了一个沙发，我从右边缺口处走进去，到左边那张沙发上坐下。这一圈沙发间都隔有茶几，我的目光从缺口右边缓缓扫一圈，记得依次坐着谢富治、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叶群、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温玉成、李天佑、王新亭、曾思玉、郑维山、汪东兴、李作鹏。我就挨着李作鹏。

会议由林彪主持。当时我义愤填膺，从进会场，神色态度都硬，所以林彪的目光与我稍触即离，再没敢多看我一眼。他第一个发言，讲了我三条“罪状”：第一，说我搞“华北山头”，“晋察冀山头”。我想，这条成立也打不倒我，所以不屑地撇撇嘴。第二，说我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还想排挤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与我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三，搞“大树特树”，有个人野心，要把王飞、何汝珍、周宇驰等人打成反革命。

林彪开讲，我就开始记录，李作鹏无声地帮我拿纸。林彪讲完，周恩来简单讲了几句，主要是叶群和

江青发言多。叶群是有准备的，栽脏污陷，指鹿为马；江青说不到点子上，基本就是骂街，说我整了她的黑材料。其实，所谓“黑材料”是有关她三十年代的一些报刊、信件，我根本没看过，是周恩来交给我、汪东兴、谢富治三人在颐年堂烧毁的。这个情况周恩来知道，但是在会上，他讲了违心的话。江青说“黑材料”时，周总理插话说：“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还说了“誓死保卫江青”。

1974年我被解放出来，7月31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

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于毛主席……”

我用力点点头，这一点我心里也有数。因为23日晚在人大会议福建厅的小会上，林彪、叶群、江青等人发言之后，我曾举手报告，要求发言反驳，江青就抢着宣布一声：“散会！”我只好转望住周总理，问：“总理，我怎么办？”

周恩来先对我说：“你的事我前两天才知道。”接着他对大家说：“刚才主席来电话：不许揪斗杨成武。他身体不好，有病治病，有错误可以检讨，但任何人

不许揪斗。”

多少年后，我才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交待中得知，他们这两个政治集团，原准备把我在南巡走过的一路进行游斗，还要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声讨我的武装游行，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我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七年，没为我成立任何专案组，也没一个人来找我外调过任何一件事，甚至没让我写过一个字，讲过一件事。比较其他被关押的人，唯一多的就是变换关押地点，没完没了地换，我明白，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哪一派政治力量都不敢轻易触这个敏感点，也不希望我所知道的事情流传出去……

这场劫难我家里死了三个亲人。我的母亲，赵志珍的哥哥和我们的大女儿杨易。

就在我获得自由，参加“八·一”招待会之后，得到的这个消息。

“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我怔愣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1. 不许火化，保留遗体；2. 要化妆；3. 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

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缓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毛主席也作了检讨，他曾三次讲到杨余傅事件搞错了，他说：当时我听了片面之词，偏听偏信了。一个人一辈子有几次偏听偏信就要犯大错误。我要向杨余傅作自我批评。后面这句话他还特意用英语重复一遍。接着还补充：罗瑞卿的事听了片面之词，贺龙的事也听了片面之词……”周恩来压低些声音：“这次你回来不容易，是毛主席救了你。康生、陈伯达他们给主席和我写了封信，建议组织个小型军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成武，我和毛主席根本没理他俩的报告，这个报告一直压在我们这里。如果没有毛主席，今天可能没有你了。”

听的总理的话，我非常受感动。他是讲过错话，违心的话，但他敢于承认，敢于检讨，确实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风度……

公元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晚九点三十分，人民大会堂里掌声雷动，“红海洋”潮起潮落，数千名团以上部队军官手持“红宝书”迎接中央首长入场。顺序走上主席台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当时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陈毅、叶剑英等当年叱咤战场的老元帅却坐在了这次军队干部大会的台下。

“同志们，现在开会。”林彪尖厉高亢地宣布。“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杨成武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

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最近在主席那里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办法！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军官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突发的政治变动和意外事件，没有太大的震动，只是机械地响应着台上，喊出“拥护”或“打倒”的口号。

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发言，将时间拖至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终于出场接见了全体与会成员。他的深沉庄严与林彪的形谦内喜形成鲜明对照。

几天后，聂荣臻元帅见到毛泽东，说：“主席，你给我批了10个字：你安心修养，没什么事情。我看了。林彪他们说我是杨成武的后台，我去看了林彪，他打倒杨成武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毛泽东从鼻子里哼一声：“什么后台，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我，毛泽东；第二个才轮到你，聂荣臻。”

厚道的聂荣臻苦涩地点点头。那么，这一场“打倒杨余傅”的闹剧是顾全大局的政治妥协还是权衡利弊之后的政治交易？党内这场斗争最终能够共存在某个双方认可的妥协点上吗？有道是：谗言暗害，鸾凤一宵分。又值天翻地覆，据江淮藩镇纷纭。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良缘难再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却赖苏翁柳老，解救殷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谁吊忠魂？桃花扇、斋坛揉碎，我与指迷津……